

封存50年

罗曼·罗兰的
《莫斯科日记》

重见天日



莫斯科日记

夏伯铭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莫斯科日记

[法]罗曼·罗兰著 夏伯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唐燕能
封面装帧 杨德鸿

莫斯科日记

[法]罗曼·罗兰 著
夏伯铭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南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56 1/32 印张6.5 插页2 字数143,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8年3月第5次印刷
印数30,001-35,000

ISBN7-208-02141-4/K·463
定价10.00元

译者前记

1935年6月,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应高尔基邀请,和妻子玛丽亚一起访问苏联。他们于6月17日从瑞士日内瓦附近的隐居地维勒讷沃出发,6月23日到达莫斯科,7月21日离开莫斯科返回瑞士,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

这是罗曼·罗兰漫长的一生中唯一一次对苏联的访问。在这次访问中,斯大林两次会见了他:一次是在克里姆林宫专门接见他,回答他的问题;另一次是在莫斯科近郊的高尔基家中共进晚餐。此外,罗兰还与布哈林、亚戈达等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有过多次私下接触。他还接待了来自苏联各地和各界的许多代表团,参观了莫斯科的一些名胜古迹。

在莫斯科访问期间和返回瑞士维勒讷沃后不久,罗曼·罗兰在给许多朋友和熟人的信中,都谈到访问莫斯科的印象。6月26日,他从莫斯科写信给妹妹马德莱娜:“人们这样接待我,是和我的身分完全不相称的,有时使我觉得有点吃不消,但也是十分动人的。昨晚在大剧院,他们指定给我的座位是以前沙皇专用的包厢。这个包厢平时给外交使团使用,这次让外交使团坐到别处去了。人们没完没了地向我欢呼,不论在剧院外,还是在剧院内,在剧院入口处,接着在第三场中间休息时的片刻;在剧院外面,在台阶上下,在广场上,一群热情的男女向我欢呼。谁

还能说莫斯科的群众是军队编制的！因为他们热情洋溢的表现是与上级的指示恰恰背道而驰的，上级指示是要让我安静。群众的热情使我十分感动。在纷乱中，我努力与一些人握手，可我得有十万只手才够用。你可以想象，你的年老哥哥站在大包厢内，高举双臂，笨拙地时而向左边、时而向右边挥手致意。但他没有太慌张。他像看戏一样，注视周围的一切，注视他自己。”

7月9日，罗曼·罗兰从莫斯科告诉评论家克里斯蒂安·塞内沙尔：“经济情况看来很好。最近一年来生活大大改善了。这个现有400万居民的巨大城市，就像是健康、热烈、井然有序的生活瀑布。在这个健壮活泼、保养得很好的人群中，我们自己倒成了来自饥饿地区的外来人。”

7月12日，罗曼·罗兰从莫斯科写信给法国诗人和剧作家马塞尔·马蒂内：“我进行了一些有趣的谈话。我在近处看到了战斗仍在继续的真正战场，我在这儿比在法国更能理解这种战斗。”在另一封罗曼·罗兰给前妻克洛蒂尔德·布雷亚尔—科尔托的信中，我们读到：“总的说来……我形成并保留了充满难以想象的活力、信心和欢乐的印象。在25至30岁的人们身上感觉到的那种欢乐尤其吸引人，他们已是在革命时期长大成人的。”

8月5日，已返回瑞士的罗曼·罗兰在给志同道合的朋友让—里夏尔·布洛克的信中承认：“至于情况的复杂性，它完全出乎想象，而且，最好是口述，而不是写在纸上。在这个非凡的苏联，生活着20多个民族，并且已生活了多少个世纪！”同一天，在给奥地利作家斯特凡·茨韦格的信中，罗曼·罗兰谈到了此次访苏的主要印象：“毫无疑问，革命在劳动人民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千千万万的人知道，革命——这是他们的事业，他们的一切都归功于革命。”

从上述信件片断中,我们不难看出罗曼·罗兰对访问苏联的基本印象。但是,要了解他这次访问苏联时每天活动的详情,要了解他对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对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对高尔基和苏联其他作家的褒和贬、爱和憎的详情,最好是读他的日记,而一生都勤于写日记的罗曼·罗兰,在访问莫斯科期间当然也不例外,他在日记中写下每天的活动和感想。1935年8月,在返回瑞士后不久,罗曼·罗兰对日记做了修改和补充,亲自打印,装订成册,成为一部独立的作品,题为《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1935年6月~7月》。为方便起见,我们易名为《莫斯科日记》。

在《莫斯科日记》中,罗曼·罗兰虽然对斯大林的某些做法、尤其是个人崇拜的做法感到不解和不满,但对斯大林的态度基本上是肯定的。在离开莫斯科时,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告别信,并同意将这封信刊登在《真理报》上。

但是,在莫斯科之行一年后,斯大林发动了引起全世界愤怒的清洗反对派的运动,罗曼·罗兰对斯大林的态度随之发生了急剧的改变。1936年8月底,他在日记中写道:“莫斯科对托洛茨基分子的黑暗审判甚至使苏联最好的朋友也感到不安。在作出死刑判决几小时后就处决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和其他人(8月25日),这使我感到心灰意冷。可以对阴谋的主要组织者不怀有敬意,也可以相信对他们的控诉——可你仍会感到不安。1794年,在处决丹东后的第二天,国民公会的最优秀成员们也有过类似的不安。8月25日,在处决当天的晚上,从莫斯科的法语广播中传来疯狂而恶毒的谩骂,这种谩骂使我感到极端的厌恶。就是这种既侮辱被处决者,也侮辱为他们鸣不平的法国和比利时社会党人的官方声音,却对路易十四、即斯大

林大唱赞歌，称他为‘苏联各族人民的太阳’，这是多么不文明的反差！难道斯大林及其近臣完全丧失了理智？在这种时刻，优秀领导人的职责是走到一边，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应该谈论的不是因威胁斯大林的生命而进行报复，而是社会安全。恐怕在这件事上，愤怒和傲慢的本能已战胜了政治理智。不过，现在我对许多东西的了解比去年更清楚了。”

罗曼·罗兰还在另一则日记中说：“我维护的不是斯大林，而是苏联，无论谁是她的首脑。我谴责对个别人的盲目崇拜，无论是对斯大林，对希特勒，还是对墨索里尼。”

莫斯科之行是罗曼·罗兰生平极其重要的一页，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他非常勇敢的一次政治活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使罗兰的敌人更加憎恨他，也使罗兰的朋友更加尊敬他。因此，《莫斯科日记》对了解罗曼·罗兰一生的思想演变，对了解他晚年的政治立场和世界观，无疑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可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世人却无缘见识《莫斯科日记》的庐山真面目。罗曼·罗兰的传记作者，无论是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写到罗曼·罗兰的这段无可回避的历史，都只能无奈地根据零散的、甚至是错误的资料进行推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在《莫斯科日记》原稿的标题页上，罗曼·罗兰写有以下题词：“未经我特别允许，在自1935年10月1日起的50年期限满期之前，不能发表这个本子——无论是全文，还是摘录。我本人不发表这个本子，也不允许出版任何片段。”

那么，为什么罗曼·罗兰不准在50年之内出版《莫斯科日记》呢？他本人没有说，后人当然也无从知道，只能猜测。而据译者推测，部分原因或许与高尔基有关。

罗曼·罗兰的莫斯科之行是应高尔基邀请，他在莫斯科的绝

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住在高尔基家中,这说明了他与高尔基的特殊友好关系。虽然他与高尔基以前从未见过面,但他从1916年起就开始与高尔基通信,与高尔基的友谊可谓源远流长。在《莫斯科日记》的结尾部分,罗曼·罗兰用较大篇幅分析了3个人的品格特性。这3人是斯大林、高尔基和亚戈达。他十分尖锐地写出了高尔基的个性弱点。因为是写日记,他当然得实话实说,不必有所顾忌。但牵涉到公开发表,他当然不能无所顾忌。他决不能伤害与高尔基的长达20年的友谊。在罗曼·罗兰后来悼念高尔基的文字中,充分表现出这种友谊的深度。

1936年,在罗曼·罗兰访问苏联后不到一年,高尔基就去世了。高尔基的死亡被罗曼·罗兰看作突然的和沉重的打击。他立即在日记中说出了自己的悲痛:“不,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对高尔基的依恋是多么深!只是在失去朋友之后,我才发觉了这种依恋之深。我们的相互依恋现在带上了悲剧色彩。我怀着强烈的痛苦感觉到,我的全部精神都寄托在明年进行新的会面的希望上。而且,我深信,高尔基同样盼望与我再次会面。1935年7月下旬,我们在莫斯科车站告别,这个时刻是我们彼此真正的亲密关系的开端。我们满以为这种亲密关系将长期继续。我学习俄语,为的是能与他单独交谈。我们有这么多的话可推心置腹地彼此倾诉!要知道,他非常孤独,亲爱的高尔基,他的内心充满忧愁和温情,而他不能向周围的人们诉说这些忧愁和温情。他本可以向我倾诉,而我也可以向他倾诉。可现在一切都完了,永远完了……我将何以自慰!对已故朋友的思绪时常涌上我的心头——而且不会消褪。”

1937年3月,罗兰写了一篇纪念高尔基的短文:

“我很难写马克西姆·高尔基，因为他作为朋友对我来说是珍贵的，而他的死所引起的悲痛仍然非常强烈。从那时起流逝的时光并未减弱这种痛苦，相反，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损失是多么无可补救。与我个人的依恋无关，我今天更清楚地明白，他占据的是多么重要的地位——现在，在没有他时，没有人能代替他。

也有另外一些作家，他们能像托尔斯泰那样，把自己的圣徒思想向全世界传播，或者像伏尔泰那样，率领微笑的智慧大军向不祥的旧世界发起猛攻。但是，任何时候都不会有任何人能像高尔基那样，实现不论何时震撼大地的最强大的革命与全世界文化时代之间的联系。在苏联，他似乎成了文学、科学和艺术的最高主管。他与从列宁到斯大林的革命领袖的密切的个人联系，他对他们以及对苏联各民族的无可争辩的影响，不仅是由于他的既表现在戏剧作品和中长篇小说中，也表现在报刊文章和书信中的多方面的天才，而且是由于他的作为反对形形色色反动分子的偏见、舞弊和罪行的坚强叛逆者的英勇的一生，由于他强有力地和不无危险地参与推翻可恶的旧制度，由于他的高傲而率直的性格，他的作为自由信天翁的独立性——所有这一切赋予他特殊的权力，他胸襟宽阔地为了知识分子的利益，为了被革命大大激发了的人的精神的进步而利用这种权力。

在莫斯科近郊，在桦树林边，在草地和树林的辽阔景色一览无遗的莫斯科河旁，有他的带圆柱的漂亮住宅。这幢贵族宅第是国家领导人出于爱戴硬塞给他的，他只是迫不得已才同意在里面客居，因为直至最后一天，他对尘世的享受始终不感兴趣，总是惆怅地回想起自己过去的无忧无虑的和饥肠辘辘的漂泊岁月。在这幢房子里，我每天见到他坐在长餐桌的头上，餐桌上摆

着可供 60 人使用的餐具，餐桌旁是一片既有秩序又自由的景象；我看到，他如何毫不拘束地与暂时把操心事放在一边、回忆往昔的考验的名声显赫的同志们——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交谈。也是在那儿，我看到，他如何接待来自庞大的苏联的或近或远的城市的工人代表团和知识分子代表团，如何宽容和认真地与所有的人交流思想，在这些人中，既有学者、艺术家和做实际工作的人，有时也有重要的军事机构或国家机构的首长，他们来自远方，为的是就良心或公务必要性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与他进行商讨……我看到，他如何倾听，思索，沉浸在自己的茫无边际的回忆之中。在他的记忆中，不论何时见到或听到的任何东西都永远不会消失，总是能栩栩如生地再现……他的承受着岁月和疾病的重负的强壮身躯，他的有时被爆发的笑声或愤怒打破的温厚的宁静心态，他的自由而直率的发言，他的调皮的幽默，他的蓝色眼睛的专注的目光，这种目光有时陷入沉思，注视着他从记忆的地窖中选取的故事形象，有时射向朋友的眼睛，温和地审视这双眼睛……

20 年来我与他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我们还进行长期通信，标志生活转折点的激烈危机，我们伟大时代的象征性戏剧的进程，都在我们的通信中得到反映。他的存在的深刻意义在于变化，并非没有痛苦的、但却是从不停顿的变化，从极度自主的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转变成与集体融为一体、不停地沿着进步之路前进的最高形式的人道主义。他在最豁达的、富有成效的精神状态中解决了这种冲突。他把昨天还庸庸碌碌地生活在不文明之中的人民群众与过去对人民无动于衷、为等级特殊地位而终日奔波的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多亏了他，知识分子才经受住了自己的“8 月 4 日之夜”：他们放弃自己的特权，加入人民

的队伍,不是为了被人民群众所吞没,而是为了在人民的队伍中汲取新的力量,汲取他们传送给其他人的欢乐。”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缘故,这篇罗曼·罗兰悼念高尔基的文章直到作者死后的1948年才得以问世,在中国恐怕也是首次与读者见面。这篇与莫斯科之行直接有关的文章,可被看作是《莫斯科日记》的尾声。

为方便读者深入理解《莫斯科日记》的内容,以上简单介绍了一些与《莫斯科日记》直接有关的资料。此外,鉴于许多读者虽然读过罗曼·罗兰的名著《约翰·克利斯朵夫》,但对罗曼·罗兰的生平却不甚了了,译者广泛收集国内外资料,编写成《罗曼·罗兰小传》一文,供读者参考。《莫斯科日记》篇幅不算大,但内容极丰富,极具史料价值,如不对所涉及的某些人物和事件进行注释,读者对某些内容恐怕就难于理解。有鉴于此,译者做了一些注释。为便于编排,译者注释(在正文中以〔1〕〔2〕为标记)按先后顺序在正文之后单列,而作者原注(以*为标记)则列在当页下面。我们现在提及已解体的苏联时,往往称之为“前苏联”,鉴于历史上只有一个苏联,而且《莫斯科日记》中涉及的绝大多数人物早在苏联尚未解体之前就已死亡,故译者在注释中仍称之为苏联。

被作者本人尘封50年的《莫斯科日记》,终于在作者逝世50余年后与中国读者见面了,这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高兴之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金永华和唐燕能等同志,他们为保证此书的质量付出了辛勤的劳动。但愿此书能得到读者朋友们的欢迎。

1995年8月20日

目 录

译者前记	1
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1935年6月~7月)	罗曼·罗兰 1
附 记	109
注 释	138
罗曼·罗兰小传	夏伯铭 181

我和妻子的苏联之行

(1935年6月~7月)

罗曼·罗兰

6月17日 星期一

2点3刻动身去苏黎世。天气宜人,有点阴,不热。我们俩乘坐的是二等硬席包房。苏黎世的“阿比·罗亚利”旅馆宁静舒适。它位于车站对面,但在广场斜对面,单独一幢房屋,远离尘嚣。房间宽敞,床铺整洁。乐观、健谈的总侍役讲述他如何在战争前夜前往南美,而在蒙特勒遇到的一对名叫舍斯克斯的有钱人夫妇(泰里泰至科山的缆车线建造者)堪称最节省钱的楷模。他们为了不买由他们自己建造的缆车的票,竟徒步登上科山。瑞士人的精神是贫乏的。出生在这儿的瑞士人许多年后返回故土时,虽然具有健壮的身体和良好的性格特征,他们的与众不同之处是缺乏勇敢精神和宽宏态度。

6月18日 星期二

4点20分动身去维也纳,途经布克和蒂罗尔。卧铺车厢。下着蒙蒙细雨,天气阴晦。朦胧而宽阔的瓦勒湖使人想起有关尼伯龙根人的史诗^[1]。从穿越奥地利边界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自己处在崇拜者和朋友中间。海关官员费尔德基尔赫在出示他从托马斯·曼^[2]那儿得到的签名后,请求我也签名留念。卧铺车厢的查票员外号叫“文德雷尔”,是出生于蒂罗尔的奥地利人,已加入意大利国籍,是移居外国者,对我们说了许多真心诚意的恭维话。夜里下着雨。清晨,在到达维也纳之前,天空一直

是阴暗的,但当列车到达维也纳时(9点左右),太阳露了脸。

6月19日 星期三

在维也纳休息。古老的大城市,有雄伟的纪念碑和漂亮的商店。商店仍保存着雅致的情调,但空荡荡的。街上的人们穿得很简朴。忧虑而消瘦的脸。维也纳沉浸在忧郁的气氛中。玛莎⁽³⁾发现,维也纳的居民就象五六年前危机时期的莫斯科人。但在维也纳人的脸上,是绝望的表情。(当我们在归途中重新经过维也纳时,这种印象稍微缓和了一点。)“大都会”大饭店位于海利根施塔特电车线附近的河岸街——多瑙河街上。一到那儿,就要求我们接受采访。一个记者几乎哭了出来,就像来自歌剧院的“歌手”。我们以沉默对待好奇心。当问我们去哪儿时,我们回答:“去华沙。”白天我没有走出房间。服务员那故作尊严而又忧心忡忡的模样就像破了产的资本家。

6月20日 星期四

早晨9点动身,经由博古明和卡托维兹前往华沙。我们单独坐在一等小包房内。中欧辽阔的多瑙河平原越是往北越是变得凄凉和贫困,只有捷克斯洛伐克不大的丘陵地带才使单调的景色有所改观。海关(在进出奥地利时)严格清点现金。一出奥地利国界,法语就变得没有人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两个年轻国家的固执的自尊心借助语言在它们之间树起了一道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们穿得不雅致,但不穷,外表使人想起小资产者。到处都有丰富的水果和饮料。但一路上都有停工的工

厂,越是接近波兰,停工的工厂就越多;一度是富裕工业区的卡托维兹烟囱林立,但现在已不再冒烟。土地是贫瘠的,多沼泽的,失去了植被。没有一条好的公路。一天内没有见到一辆汽车,只看见一两辆马车。好不容易才见到的设有标志牌的道路很快就消失在耕作粗糙的田野中。很少看到树林,树木都被齐根锯掉了。不时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个顶上竖着白色碑石的古怪小丘,看上去像是蚁冢,又像是坟墩。车厢内几乎所有旅客都因为毕苏斯基元帅⁽⁴⁾的去世而在袖子上套着黑纱……夜里到达华沙(晚上11点),下着雨,又脏又乱:车站正在维修。阿罗谢夫⁽⁵⁾和苏联大使达夫强⁽⁶⁾在站台上迎接我们。下榻于车站对面的“波洛尼亚”旅馆;波兰人经理对俄国人(苏联国际旅行社)的愤恨很快就暴露了出来。但服务员和普通人很乐意说俄语。

(后来有人告诉我们,“波洛尼亚”旅馆是法西斯分子的指挥部。但在归途中,在另一家名叫“欧洲人”的大旅馆内,人们开玩笑说,这儿是反间谍组织的指挥部。哪一家更好些?当然是后者,因为那儿的人们努力显得更有礼貌。)

6月21日 星期五

今天休息,一整天都在华沙度过。早晨阿罗谢夫来访。午饭后达夫强来访,与我们一起喝了茶。他有一张漂亮的东方人的脸,但脸上表情冷淡。他谈到波兰的经济崩溃,波兰把全部财力都耗费在军事需要上。他提供自己的汽车,让我们在城内各处游玩。绿树成荫的漂亮大街,宏伟壮丽的纪念碑(肖邦、密茨凯维奇⁽⁷⁾等人),年代久远的贵族别墅,横跨宽阔的维斯瓦河的巨大铁路桥梁。老市场广场的油漆房屋与法兰克福和纽伦堡的

一样,但色彩更柔和,风格更多样。使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古老的犹太人区,在那儿遇见了与众不同的人们。一些留着络腮胡子、身穿长长的常礼服的老头在彼此进行争论。人们都缩着脖子,拱着背(连年轻人也这样),长着突出而无神的大眼睛,神态既自尊又自卑。一个神经质的年轻犹太女人差点撞上汽车,她用目光狠狠盯着汽车,但不向旁边走一步,让汽车过去。在旅馆,我收到由纪德^[8]、马尔罗^[9]和让-米夏尔·布洛克^[10]签署的电报,他们请求我向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11]致电祝贺,我照办了。

6月22日 星期六

上午9点动身赴莫斯科。阿罗谢夫陪同我们,乘坐的是卧铺车厢。马塞尔·加香^[12]夫妇俩也在这次列车上。他们来找我们闲聊。经过一再请求,阿罗谢夫终于使玛莎同意,我们在莫斯科时住在他那儿,而不是下榻在原先计划的“萨伏依”旅馆。(我更喜欢住在这家旅馆,但阿罗谢夫——正如后来变得清楚的——把这件事变成了他自己的私事。)他决定亲自照顾我们,并借助于我获得苏联政府和社会舆论的好感。只是在几天后我们才明白这一点。我们怎么会知道,由于经常失策,他的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的地位已摇摇欲坠到了何种程度,而希望利用我们又成了一次失策。我们费了很大力气,才阻止他上维也纳、甚至几乎上瑞士迎接我们。他尽力效劳,巴结讨好,如此热烈地进行劝说,以致最终我们表示同意,尽管高尔基欢迎我们住在莫斯科他自己的家中。阿罗谢夫对我们的同意作了非常奇怪的回答:“谢谢你们没有斥骂!”他赶紧打电话通知家人,让他们收拾住房迎

接我们到达。

我们于傍晚 5 点到达苏联边境。阿罗谢夫沉浸在回忆之中，他回忆起国内战争的战斗、布琼尼^[13]以及离华沙 15 公里的最后一次失败。这次失败是由于一个托洛茨基分子指挥官的过错，他决定调动部队进入德国领土，但与自己的部队一起被俘。他说得如此精彩，以致我们不知不觉地错过了上面写有“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口号的著名木头拱门。但是，我们清楚地看见了两块分别印有波兰和苏联国徽的界标，以及高高耸立在梯子之上的瞭望台。

在边境车站，一节专用车厢、一名医生和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14]正等着我们，医生是克里姆林宫医院院长莱温^[15]博士。克留奇科夫带来了自己的导师和朋友的信。高尔基不久前患了重病，患的是严重支气管炎。莱温医生说，他的肺部和肠道的状况大致与我相似。我刚踏上苏联领土，就处处感受到负责接待我的人民委员会^[16]的慈父般照顾。莱温医生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立即对我进行了检查，研究了 my 瑞士医生黑默利博士的建议，并把这些建议重抄了下来。一个来自某大型疗养院的女护士将照料我们。我们一起在我们的沙龙车厢内吃了晚饭，接着回到各自的包房。夜里，在明斯克车站，一个白俄罗斯代表团直接来到列车前，阿罗谢夫愿意代替我向该代表团致意*。

* 莱温医生告诉我，他是与帕斯捷尔纳克^[17]一起从莫斯科动身的，帕斯捷尔纳克被派遣出席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作家会议，而使他感到非常痛心的是，他不能在涅戈列洛姆（在边境车站）耽搁几小时，以便与我会面。会议已进入最后的日子，他不能延误！我们的列车在途中相遇——我们就这样擦肩而过。

6月23日 星期日

桦树林。倾斜的草黄色屋顶。在接近莫斯科的地方，在一望无际的大地上，分布着一幢幢小别墅。在接近莫斯科车站时，我们见到一个露出屁股的白胡子裸体主义者老头。

上午11点(瑞士时间9点)，我们到达莫斯科车站。几名苏联作家的代表走进我们的车厢：特列季亚科夫^[18](剧本《怒吼吧，中国!》的作者)、列昂诺夫^[19]、季纳莫夫^[20]等人，同来的还有玛莎的儿子^[21]。特列季亚科夫是一个秃顶的高个青年，他的热诚目光使我感到亲切。从走向汽车的头几步起，四下里就响起了照相机的咔嚓声。(它们将伴随我们，直到我们离开莫斯科的那一刻。)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以便隐瞒我们的到达时间和不引来人群，人们还是在车站出口处列队鼓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汽车穿越整座城市，我们到了河那一边的政府大厦旁边，几乎就在克里姆林宫对面，在那儿的十层楼上，阿罗谢夫住所中的人们正等着我们。在很快就变得热起来的屋顶下面，是3个十分宽敞的房间；很小的厨房和浴室所处的位置很不方便，而且彼此妨碍。住所是宽敞的，但对一个苏联上层官员的家庭来说，并不太大。热情的接待带有一点浪漫而无序的大学生色彩，但遗忘了一些基本的日常用品。不过，他给我们派来了服务人员：女护士、克里姆林宫的厨师和其他人——他们与其说是提供服务，倒不如说是妨碍我们，因为当他们不呆在厨房时，他们就在走廊里挤来挤去。午饭后休息，但与《真理报》和《消息报》记者的十分短暂的会见打断了休息。我认识了玛莎的女友、小剧院^[22]院长阿马格洛别利^[23]的妻子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她欣然同意，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担任我的秘书。夜里，当我们

熄了灯躺下睡觉时,一些意外情况迫使我们迅速离开了阿罗谢夫的住所,迁往“萨伏依”旅馆。曾为我们在该旅馆的二楼预订了一个宽敞的套间(内有6个大房间,因为我的妹妹打算前来,而玛莎希望她的儿子愿意在我们这儿作客。)我们只为自己留下3个房间,事先检查了它们不是向阳的,绝对舒适,采取了一切可能的预防措施。关心备至的女护士照料我的饮食起居。水果从克里姆林宫带来。年轻的女秘书是亚美尼亚人,她守着门口。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坐在电话机旁。利季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一个开朗的高个金发女郎,丰满的脸颊,朴实而端庄,笑起来发出轻轻的咕哒声,一开始显得毫不引人注目。然而,你对她了解得越是深入,就越是感到惊奇。她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工作人员,工作积极,聪明能干。她比任何人都更善于找出以我的名义写的信件所需的语气——刚好是收信人所期待的语气。而且,她十分善于在电话上回绝纠缠不休的人们的要求,同时不使他们生气。而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似乎不费什么特别的力气。对感谢和赞叹的回答仍是那种轻轻的、从嗓子里挤出的笑声。“萨伏依”旅馆的照料细心,饮食精美。但电车沉重的隆隆声使旅馆墙壁发生震动,电车一直行驶到深夜2点,一清早又开始运行。旅馆内的舞会进行到半夜过后。但我的窗户朝着大街。精力充沛、衣着单薄的人群在街上大步行走——穿的全都是白色短袖上衣,粗布裙子,光着头,没有一点穿戴雅致的迹象。但强壮,健康,外表看来营养充足。

6月24日 星期一

克留奇科夫带来了高尔基写给玛莎的信——写得非常热

情^[24]。他离开时带走了我们的口信：我们同意在快到周末时去高尔基的郊外住所。从到达莫斯科的一开始起，我们就发现了因为我们而竞争的各种派别的冲突。阿罗谢夫只是到了早晨才得知我们的夜间逃亡，感到很难过，而现在又努力诱使我们住到他那儿去。午后4点，在博物馆工作人员和阿罗谢夫的陪同下参观克里姆林宫。吹着温暖的阵风，博物馆内却是一片冰冷。所以在历史和艺术的瑰宝旁匆匆而过，使陪同人员感到不满。不过，这很少使我感到不安。随后前往机场，乘坐“真理”号飞机升到空中，这是一架在坠毁的巨型飞机“马克西姆·高尔基”号^[25]之后建造的最大的飞机（机上约有30个座位）回来时非常疲劳。在参观莫斯科的名胜之前，连一天的休息也没有给我，而这种错误已不止一次发生。每隔5天我需要绝对的安静，这有利于我保持良好的体形。可是，在莫斯科，怎么为自己安排完全独处的日子？

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有关我们到达的文章。最热情的文章出自布哈林^[26]和季纳莫夫的笔下。

6月25日 星期二

上午，阿罗谢夫带我们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观摩影片《夏伯阳》，该片在莫斯科获得很大成功。有几个富有感染力的场景，尤其是白军的“心理攻势”——依我看，这是在戏剧作品中，共产党人第一次使白军的英勇主义获得应有的地位。我想，维克托·雨果^[27]仍会对《九三年》感到满意。但我更喜欢在蒙特勒看过的一些苏联旧影片，比如《亚洲风暴》^[28]，这部影片特别注意音乐、特殊气氛的营造和景色。不过，我很理解那些战斗的参加者

对《夏伯阳》的热爱。这是他们的《伊利昂记》^[29]。坐在旁边的阿罗谢夫用自己的战时回忆评论影片中的干部。他说，“心理攻势”在夏伯阳之前就已出名；1915年，德国军队在佛兰德就利用过它。如果我没有弄错，国内战争期间在波兰战线也利用过它。

午饭后休息。

晚上去大剧院^[30]。列宁格勒芭蕾舞团前来上演阿萨菲耶夫^[31]根据普希金的长诗改编的新芭蕾舞剧《巴赫奇萨赖喷泉》。演剧季节的最后一次演出。整个莫斯科上流社会都出席了，各种传说都在谈论年轻的明星乌兰诺娃^[32]。人们担保，她将成为新的安娜·巴甫洛娃^[33]。为我安排了不可思议的接待。把我安排在沙皇的包厢，为此强使外交使团人员让出包厢。在广场，在大厅人口处，在第三幕后的幕间休息时，人们都鼓掌欢呼。在门口广场上，庞大的人群一面鼓掌，一面一字一顿地呼喊：“我们的朋友罗曼·罗兰”。我随意握了几个人的手，可是，倘若要与所有的人握手，我需要上千只手。在包厢内，我从座位上笨拙地向聚集的人们致敬，举起双手并向各个方向转动身子。在幕间休息期间，许多戏剧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走到我面前表示问候。艺术剧院的著名院长涅米罗维奇—丹琴柯^[34]激动地一再说：“您在这儿！罗曼·罗兰在莫斯科！”马克西姆·李维诺夫^[35]这一次对我要比我们在维勒讷沃会面时更信任。美国大使蒲立德^[36]同样很友好。（虽然我什么也没有问，但李维诺夫说蒲立德是“坏朋友”，或者“这不是朋友”。）蒲立德则不厌其烦地重申他的看法，说苏联的局势令人失望，苏维埃的生存不会超过三四年。（或许，我没有丝毫不差地转述他的话，但我能担保确切地转述了他所说的意思。）李维诺夫对总的国际形势和军事威胁也很悲观。蒲立德自称是《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老朋友，他说了这部小

说对他和他那一代的人、对全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演出时，阿罗谢夫向玛莎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他打算夜间在一个军官朋友的帮助下，把我们偷偷送往离莫斯科几公里的一幢别墅。他企图强使我们相信，别墅是由斯大林提供的，而我们的拒绝会使斯大林生气。后来我们确信，事情并非如此：负责照顾我们的人民委员会准备将一幢舒适安静的别墅交给我们使用，但当然只是在如果我们不喜欢住旅馆或者住在高尔基那儿的情况下；人民委员会强迫我们搬迁，就会处于荒谬可笑的境地。阿罗谢夫是在努力设法按自己的意愿扭转一切。他知道，只要我们一到高尔基那儿，就脱离了他的照管，所以想在此之前带走我们。我们断然拒绝了。我附带发现了多少倾轧和派系斗争！

演出并不使人特别感兴趣。音乐写得很好，但风格兼收并蓄。伪古典主义的音乐。芭蕾舞完全不是独创的。但服装很好，最后一幕中的尚武狂放的舞蹈也很好。但与《伊戈尔公》⁽³⁷⁾以及1910年佳吉列夫⁽³⁸⁾的芭蕾舞剧相比，里面没有任何新东西。乌兰诺娃对舞蹈的感觉很灵敏。已有很久不看歌剧和芭蕾舞剧了，难于忍受这种体裁的不合情理的矫揉造作。我想起了娜塔莎·托尔斯泰，她或许正是在这所古老的剧院中参加自己的第一次演出的。

6月26日 星期三

早晨莱温医生来访。接着是阿罗谢夫。与别墅有关的新的围攻。与高尔基竞争。围绕我展开了小小的幕后争斗。

下午拜访玛莎的家人。叔叔尼古拉留着长而茂密的白胡

子,住在一间下屋内(他称之为石棺)。那是老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灰泥已经脱落,走廊狭窄而弯曲。全家挤在几个小房间内。不过,这不妨碍有机会时把路过这儿的朋友或客人安置在屋角的沙发上。墙上挂着家里人的照片。桌上放着茶炊。旧时代过来的上了年纪的女士们要求十分饶舌的尼古拉叔叔忍住不开口。他顺从地满足了她们的要求,但女士们自己却无休止地唠叨了起来。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玛莎的婆婆)不知怎么使我觉得与科西马·瓦格纳^[39]和冯·布伦塔诺夫人有相似之处。我们顺着摇晃的楼梯登上鸽笼看望我妻子前夫的儿子谢尔盖和他的妻子丹娘。他们的房间就位于晒得极热的油毡纸屋顶底下,从窗口可看见高高的树冠。在所有在场的人中,谢尔盖引起我最大的好感。我喜欢他那双漂亮的、真诚而忧郁的眼睛。他处在考试正紧张的时候。今天他顺利地通过了第二次考查。

在归途中,我们在红场停留了一下,散了一会步。瓦西里升天大堂^[40]使我完全感到失望。多么陈腐而粗劣的制作!色彩黯淡。没有附属房屋。它已失去了活力。不可思议的是,列宁墓后面的克里姆林宫红墙却改漆成了白色。莫斯科正在成为平庸的欧洲城市之一。我没有感觉到它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莫斯科新建房屋的平庸无味使我感到惊讶。较之莫斯科新增的建筑,街上的人群看上去要更有莫斯科特色得多。

晚上在阿马格洛别利领导的小剧院,从舞台前部上面的包厢观看奥斯特洛夫斯基^[41]的喜剧(《代人受过》)中的一幕。虽然我躲躲藏藏,观众仍认出了我,向我鼓掌。阿马格洛别利登上舞台,站在幕前,向我致了欢迎词。演出生动而有趣。演员都很出色。这部喜剧完全可以在巴黎上演。幕间休息时,一边吃晚饭,一边谈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富裕的女市侩》。

回来时又遇到阿罗谢夫：继续别墅的故事。我们的勇敢的女护士认真对待自己的职责，不让他走进房间：“我不放您进去。”“您不知道我是谁？”阿罗谢夫喘着气问。“知道。如果愿意，您可以枪毙我，但我不放你进去。”

他怒气冲冲地走了。但他是不会原谅的……

夜里感到非常疲劳，咳嗽。

6月27日 星期四

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前来提供咨询。他被认为是心脏方面的大专家。他在检查后说：“如果我是您的瑞士医生，我就不会允许您作这次旅行。您的瑞士医生了解您，但不了解我们的条件。”神经衰弱。禁止我进行任何会见，并奉劝我尽快离开莫斯科。甚至高尔基的郊外住宅在他看来也不完全是合适的休息地点。如果在那儿不能确保我的安静，他建议我前往斯大林准备提供给我的别墅。事实上，是阿罗谢夫带来了普列特尼奥夫，并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努力利用他。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没有旁人时，普列特尼奥夫向我说了实话，但非常谨慎。他试探我的立场，我在他身上觉察到了隐蔽的反对派立场。（后来有人告诉我，他进了监狱，但尊敬他和需要他的高尔基把他从那儿解救了出来。我不能验证这一事实。）普列特尼奥夫医生把当代的重要现象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类似现象作比较，并说，他想活到40岁以上，而不是现在就死去。残酷的时代（我保持沉默），于是他匆匆补充说，“不管怎样作出了选择。”“10年前还能对什么事情表示怀疑。但不是现在。面对的是法西斯主义！”

下午5点，出席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招待会。聚集了50名

最著名的人物：布哈林，看上去很年轻，面带笑容，生气勃勃，真切热诚，矮小的身材和举止有点使我想起从前时候的邓南遮^[42]；施米特教授^[43]，“切柳斯金号”^[44]事件的参加者，温厚的大高个，沃坦^[45]这个角色的合适的候选人（根据布哈林的说法）；布勃诺夫^[46]，教育人民委员；克里斯季^[47]，当他和卢那察尔斯基^[48]一起到沃韦附近的圣莱日耶看望我时，我就与他认识了，他现在是一家大型俄罗斯绘画馆的馆长；特列季亚科夫，季纳莫夫，斯塔索娃^[49]，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50]，雕塑家梅尔库罗夫^[51]，还有被耀眼得像6个太阳一样的镁光灯所照亮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博物馆馆长、图书馆馆长等。在餐桌旁，我坐在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夫人^[52]之间（不知为什么），离施米特不远，在斯塔索娃对面。丰盛的葡萄酒、香槟酒、冰激凌和水果。阿罗谢夫作为主人以及文学艺术的庇护人发言，在发言中竟把我比作太阳！不幸的太阳！我已不记得作了什么答词*。在送上清淡的冷盘之后，普罗科菲耶夫演奏钢琴，一个13岁的年轻小提琴手作了表演，他似乎姓戈尔德施泰因**，乐器在他手中发出美妙的声音，他的泰然自若令人赞叹。在阿罗谢夫致词后，3名地下铁道建设工程局的代表宣读了欢迎词，并赠送给我两册工人诗人的诗集。但我没有看到阿罗谢夫让他们坐在宴会桌旁。他们比卢那察尔斯基夫人更适合于坐在我的右边。与平等思想相反，这儿并不非常看重阶级和职业：能够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听普罗科菲耶夫、肖邦和韩德尔^[53]的是谁？

* 只记得说到了托尔斯泰以及我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他，而女翻译甚至连托尔斯泰的名字也没有提到，也丝毫不提我对托尔斯泰的深切的感激之情。

** 布夏·戈尔德施泰因。不久前他曾华沙举行的国际小提琴比赛中获奖。他的照片刊登在1935年第6期的《苏联建设》杂志上。

在回来的路上,经过《战争与和平》中罗斯托夫夫妇的不大的别墅。

晚上,晚饭后立即躺下睡觉,而玛莎去小剧院。大约8点半,我们的勇敢的女护士来了:“我应该告别了。他们让我回去。”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断定她家中、她的家人出了什么事,而她不作任何解释。“可您至少得等到我妻子回来,是不是?她没有在告别时拥抱您,是会感到伤心的。”“不,不,”她说,“我不能等。汽车已在下边。我应该立即就走。”于是她走了。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她。只是后来我才明白,这是阿罗谢夫的报复。

但愿他没有伤害她,而只是让她离开了我们。她是共产党员,所以能够保护自己。我们对莱温医生说了所发生的事,他安慰我们并许诺,我们立刻就能在高尔基那儿见到她。但我们再也没有见到她。为此我写道:“把过大的权力交给个别人是不明智的。当一个人的权力完全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权力时,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争吵和角逐,就会开始你死我活的斗争。”

不过,阿罗谢夫是一个不坏的人,但目光狭小,性格暴躁。一头野猪。在莫斯科,几乎所有听我说到他的人都鄙视地回答:“蠢货。”他不是蠢货。但他出于强烈的自尊心而做出的无法挽回的不知深浅的行为往往变成危险的错误。由于这个原因,他丢掉了大使的职位。恐怕同样由于这个原因,他将失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的职位。

6月28日 星期五

下午预定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整个上午我都在思考,

将对他说什么。

4点阿罗谢夫来接我们，接玛莎和我。经过长长的走廊和无数里面坐着秘书的房间，我们——一共3人——被带进斯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位于面向克里姆林宫院子的大楼上层，大楼旁边安放着一门从拿破仑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在他从俄罗斯撤退时缴获的大炮）。

谈话于4点10分开始，于5点50分结束。要不是我怕滥用斯大林的耐心，谈话本可以继续延长。谈话期间，吹来的阵风使窗子发出砰砰的碰击声。

斯大林不像自己在画像上的形象。无论怎么想象，他既不是高个子，也不是矮胖子。相对说来身材矮小，而且很瘦。他的粗硬的黑头发已开始发白。最近一两年来，他大概变老了。但他的目光依然率直而刚毅，他的笑容依然令人不解。这种笑容可能时而亲切，时而深沉，时而淡漠，时而温厚，时而坚定，时而嘲弄，时而显得愿意快乐一阵。在所有情况下，他都能保持完全的自制力。他说话时不提高嗓音，音色不知怎么带有鼻音，同时尖而刺耳（人们告诉我，这是格鲁吉亚口音），说话时作很大的停顿，以便来得及考虑一切。他的听要比说做得更好，他在听时为自己记下我的谈话的要点，用红蓝铅笔在纸上写下潦草的字迹。（可惜的是，我没有向他索要这张纸。）

我们在一张大桌子旁坐下：他坐在我们之间，我在他的右边，阿罗谢夫在他的左边，玛莎在我的旁边。阿罗谢夫想要参加谈话，声称将充当翻译（斯大林与其他所有人民委员一样，不会说、也不懂法语），但他的法语远不是完美无缺的，玛莎则尽可能地纠正他。

在最初的问候后（对我来说是十分引以为荣的问候），斯大

林把首先说话的权利赋予我，我照办了。他没有打断我的说话，听了 20 分钟。

我的谈话如下：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感谢，感谢您接见我。也许您已猜到，您的名字和您个人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意识到正是您处在新世界的这个我们为之自豪和寄予希望的伟大国家的领导岗位上，这会给在西方的我们增添什么样的力量和信心。我幸福地握了您的手，并想说，在您的国家，对我表示的关注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您邀请我在您的别墅休息。”

（对我上面所述的事情，斯大林指出，别墅不是他的，他没有任何别墅，而邀请出自人民委员会，即出自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他，他们把莫斯科近郊的国家别墅之一提供给我使用，来到莫斯科的客人都在那些别墅中休息。）

我继续说：

“现在，如果您允许，我想和您谈谈，无论是作为苏联的老朋友和同路人，还是作为西方关注你们的国家的代表，作为青年和同情你们的法国人的代理人。

“您知道，苏联在西方很多人的眼里是什么。他们朦胧地想象你们的国家，但你们的国家体现着他们的希望和理想，形形色色的、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希望和理想。在震惊西方的深刻的经济和道德危机的形势下，他们正在期待苏联为他们指出道路的方向，确立主要的目标，澄清他们的疑惑。

“当然，很难满足这种期待。苏联有其自己的任务——建设和国防方面的巨大工作，而国家应该全身心地投入这项工作，因为苏联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为自己的事业做出榜样。你们的国家正在开辟道路，证明自己忠于所选择的方向。但苏联

仍然不能推卸当代世界形势所赋予的责任，一种帮助其他信任你们的国家的‘帝国的’义务。光说说贝多芬的著名格言‘人啊，自己救自己吧！’是不够的，必须提供帮助，充当谋士。

“为了胜任这项任务，必须考虑每个国家的禀性和意识形态的特点——现在我将只说法国。不了解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或者无动于衷地对待这种意识形态，可能引起——而且有时正在引起——严重误解。

“不必期望法国舆论界、甚至是同情你们的舆论界具有苏联公民所如此习以为常的思维辩证法。根据其禀性，法国人是头脑简单的好说教者和空谈家，而不是实践家。如果想使他信服，别忘了这一点。法国人民的大多数习惯于议论。必须耐心地对他们说明所做事情的原因。

“如果允许，我想指出，在苏联，很少关心向外国朋友解释某些行为的原因。当然，在这些行为中存在自己的逻辑，公正的和不可改变的逻辑。但是，政治家们似乎对揭示这种逻辑不感兴趣。依我看，这是严重的错误，结果可能出现——而且正在出现——对某些行为的不正确的或者显然是错误的解释，这种解释正在使西方许多同情者感到疑惑。而且，正是因为我本人最近在法国成了这种疑惑的见证人，我应该向您报告这一点。

“您回答我说，持同情态度的知识分子的作用也在于说明这些原因。我们不能胜任这样的任务。首先是因为我们信息不通：我们没有用于说服和说明的必要资料。

“我觉得，应该在西方建立法苏思想相互谅解中心，有点类似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但政治目标更明确。由于没有这么做，不理解正在日积月累，而且，在苏联的派遣机构中，包括大使馆，没有一个因为需要克服这种不理解而感到不安。也许这些人认

为,怀疑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自行消失。但怀疑没有消失。怀疑正在加深。为了消除怀疑,应该一出现不理解就采取行动。我希望您注意,对法国舆论必须采取与对待苏联舆论不同的方法。

“以下是几个例子。

“苏联政府按照法院的判决和决定,或者按照不同于公认的司法实践的特别法律作出某些决议,这是苏联政府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这些判决往往引起很大反响,判决的对象成为普遍注意的对象: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国外舆论对他们显示出高于正常的兴趣。在这种情况下,最好避免意见分歧。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您坚决地制止反基洛夫^[54]阴谋的所有参与者,这是百倍地正确的。但是,在粉碎阴谋者时,请在欧洲舆论和世界舆论面前,公开提出对他们的不容置辩的、证明被判决者有罪的公诉!

“作家维克托·塞尔日^[55]被流放到奥伦堡3年。这是一件次要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在两年的时间里,谁都不去阻止,以致这件事在欧洲被夸大到吓人的程度?为什么不明白,对这件事的言过其实的或者虚假的解释会导致何种不满?为什么不是从一开始起就在法国舆论界面前说明塞尔日有罪的理由,或者证明有关他的遭遇的传闻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听任伤口化脓,既然能立即把刺拔出?我把这个例子作为典型现象。我本人与塞尔日不认识。我只是他的一些朋友的朋友。我保持完全的客观态度。但我坚决认为,在一个经历过卡拉斯案件^[56]和德雷福斯事件^[57]的国家中,允许一个被放逐者进入公众注意的中心并成为要求恢复公正的对象,这是非常危险的。

“还有一件与上面所说的不一样的事:不久前,在你们国家

颁布了关于惩处自 12 岁起的儿童的法律。法律的条文不很清楚,但甚至已知的条文也给人难受的印象。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儿童面临死刑的威胁。我能够理解你们的动机,你们希望使那些以前不能被追究责任的人,尤其是使那些把儿童作为犯罪帮凶的人感到害怕。但并非所有的人都理解这一点。人们担心,法律已经生效,而儿童可能成为城市当局滥用法律的牺牲品,城市当局会随心所欲地处置他们的生命。这可能引起广泛的抗议浪潮。必须在抗议浪潮没有兴起时预先防止。别忘了意识形态对西方人感情的影响!对事件的情绪性评价对我们来说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评价即使对意向坚定的政府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但对软弱和不坚定的政府却有强大影响,而这样的政府为数不少。

“现在开始谈当今最重要的问题,谈战争与和平以及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在法国,早已应该研究这个问题。许多前年我就已提醒巴比塞^[58]以及自己在《人道报》中的朋友,让他们注意防止起因于不考虑当代现实的反战运动的危险(我想指出,在说这个问题时,我所持的是客观的观点,也就是说,所持的与其说是自己的观点,不如说是他们的观点,因为很久以来我就是国际冲突中运用武力的拥护者)。我觉得,他们看不到各种战争形式之间的区别,这是一个严重错误。因为战争可能爆发,他们必须公开确定在某种形势下将不得不采取的立场。如果我的理解无误,苏联根据自己的理想,需要和平,也向往和平。但你们的立场不能被看成是和平主义的。必须区分手段与真实目的。我们的诞生于 1932 年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反战大会的运动不能做到的正是这一点。正是现在,公众迷失了方向:不仅是和平主义者,还有苏联在法国的持社会主义观点、同情共产

党人的朋友。公众对苏联与法国帝国主义民主政府建立政治密切关系和军事联盟的事实感到困惑莫解⁽⁵⁹⁾。这引起人心的慌乱。必须阐明辩证法和革命策略的重大问题。而且,最好是尽可能真诚和坦率地这么做。”

到这儿我中止了说话,虽然尚未说完事先打算说的话。我对斯大林说:“我想对您说的主要就是这些。请原谅,我说了那么久。”

斯大林回答说,他很愉快地听取了 my 发言。随后他也开始发言。

他说:“您是否允许我回答你的所有问题?”

接着,他看着自己的红蓝两色的潦草字迹和线条,开始说话,但不是按照提出问题时的次序,而是根据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的思路。也许,我没有十分准确地转述斯大林的答复的次序,我是根据记忆写的。至于斯大林的议论的准确次序,则它保存在所附的官方记录中。

完全而绝对的朴实,坦率,诚实。他并不把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他说:“也许,我们错了。”看来,始终准备重新考虑自己的看法:如有必要,通过经验使问题变得更明确,让问题接受经验的检验。

他试图为自己的行为辩白。关于在基洛夫被谋杀后匆匆处决上百人,他说,这么做超出了法制和道德的范围,也许,甚至是个政治错误,但“我们受到感情的支配”。这上百人“没有直接参与谋杀基洛夫”,但仍然是德国、波兰、立陶宛(或者拉脱维亚?)的秘密奸细。必须惩处,杀鸡吓猴。而且,“我们决定不给这些凶手(其中许多人傲慢地吹嘘自己的杀人愿望)在诉讼过程中出现在公众面前的机会,他们可能把出庭当作讲坛……”

接着,他补充说:“我们很不愿意判罪,处决。这是肮脏的事情。最好处身于政治之外,使自己的双手保持纯洁。但是,如果我们想解放被奴役的人们,我们就没有权利留在政治之外。既然同意从事政治,你所做的一切就已经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只是为了国家;国家要求我们变得残酷无情。”

斯大林说:“我们不得不不仅考虑苏联的外国朋友的意见,而且考虑我们本国同志的意见,外国朋友指责我们残忍,国内同志则指责我们过于姑息。我们把死刑事件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暗杀基洛夫的同谋者,那些知道阴谋、纵容阴谋、希望这次谋杀、但没有积极参与谋杀的人,诸如季诺维也夫^[60]和加米涅夫^[61],我们认为有可能不判处死刑。而我们的苏联同志对此感到气愤。”

关于惩处未成年罪犯的法律,他说:“是的!这在西方不可能解释。”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周围的资本主义地区的敌人不知疲倦。他们到处渗透,把自己的奸细派入家庭和教堂藏身,把仇恨传播给妇女和儿童。事实本身作了说明:不久前我们得知,几个出身于贵族家庭的年轻妇女得以顺利地钻入党的领导人周围,为的是毒死他们。”(斯大林没有更明确地说明,所说的是谁,但我不久前得知,这个故事涉及的是他本人。一个图书馆馆员,一个没有引起怀疑的妇女,在企图毒死他时被抓住——这是由于人民委员叶努基泽^[62]的粗心大意而发生的。)
“敌人怂恿这些妇女犯罪,而这些妇女想象自己是夏洛特·科黛^[63]。儿童的情况更糟糕。到处出现15人左右的地下少年匪帮;他们联合起来,用刀子作武器,为的是杀死‘先进分子’——优秀的男孩和女孩(而且不是出于政治原因,纯粹是因为这些‘先进分子’是好学

生)。教唆他们的是领取我们敌人的报酬的成年人。他们杀人，强奸少女，迫使她们成为妓女，以及诸如此类的各种事情。就在不久前我们才得知这种情况：什么时候杀死了某个少女，突然暴露了两三年前的事实。政治上应办的事情耗费了我们过多的精力，”斯大林继续说，“我们关心的是集体农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够……当我们知道时，这使我们感到震惊。怎么办？要彻底铲除这些匪徒，我们需要两三年时间。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但为此必须使人畏惧。我们应该通过这项镇压性的法律，以死刑威吓自 12 岁起的儿童罪犯，尤其是他们的教唆者。事实上我们没有运用这项法律。但愿将来也不会运用它。当然，我们不能公开承认这一点：将会失去必需的效果，恫吓的效果。不过，已下达了不公开的命令，只是严厉追究怂恿儿童犯罪的成年人。对他们我们将毫不留情……”

（听着妇女和儿童的骇人听闻的罪行，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在西方所遗忘了那个事实：布尔什维克仍面临与残忍的、野蛮的、陈旧的俄罗斯的长期斗争。）

至于苏联总的政策问题，斯大林否认对其他国家有什么发号施令的可能。他说：“我们完全意识到不同国家的特点和情况的差别。我们没有力量控制它们。这么做会导致一系列不可避免的错误。我们，俄国布尔什维克，曾是德国社会党人的学生。如果我们在战时和战后仿效我们的老师，那会发生什么？必须让每个国家的党独立作出决定。”

关于战争和政治联盟问题，斯大林说：“必须指出，存在两种义务：国家的义务和党的义务。苏维埃国家应该努力与共和制的法国结盟；如果这种联盟得以实现，这应该建立在真诚的基础之上。双方都应该武装起来，并准备相互帮助。否则谁需要这

种联盟？随着法西斯主义的上台，欧洲社会力量的分布发生了变化。法西斯主义——这是一切自由、一切前进可能性的终结。它迫使共产党人在目前仍有某种自由和行动可能性的时候，暂时与西方的‘自由派’资产阶级联合……但是，如果法西斯主义得不到这种力量，我们就会让它们全都见鬼去！”

“法国共产党，”斯大林继续说，“不应该因此而停止对资本主义的国内斗争。如果希特勒分子得以挑起战争，共产党人将奔赴前线，并且将向希特勒分子开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回来时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意愿。至于工厂和仓库中的无休止的暗中破坏，则决不允许这么做！共产主义理论从来不把这种行为当作武器。十月共产主义革命没有毁坏一个工厂；它占有了工厂。”

斯大林笑着说：“托洛茨基先生装作似乎忘记了党章的一条，这一条文说：共产主义国家可以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家结盟……他忘记了这一点……不过，这一条文已被取消。没有任何必要把它写入章程，”他继续说，“当形势需要这么做时，我们将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条文，这就够了。”

接着他问，我是否对他的答复感到满意，我是否想再提什么问题。

我答道，“还想谈谈另一些题目，更愉快的和令人高兴的题目：例如，有关新人道主义的问题使我很感兴趣，是您，斯大林同志，宣布了新人道主义。在您不久前的发言中，有一段听起来非常好的话，就是‘世间一切资源中，最可宝贵和最决定性的是人’——新人和他所创造的新文化。没有什么东西能像伟大的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新道路那样，如此迅速地使全世界的意识倾向革命——无产阶级人道主义乃是全世界意识力量的综合。

马克思和恩格斯遗产的哲学部分的特点是革新和创造的性质，直到最近*，这个部分在西方才最低限度地为人所知，而正是这个部分，才能对像我们这样具有高度文化的人民产生最强大的影响。”

斯大林作了回答。他感到满意的是，我引用了他不久前的发言以及有关尊重人的话。他开玩笑地再次问我：“这么说您喜欢这种说法？……可我们的许多同志反对。300年来已习惯于挨打，于是说：‘为什么尊重我们？用不着尊重我们！’”

斯大林回到有关新人道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问题上，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说了一些非常好的、亲切的、令人信服的话，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在于帮助人挣脱必然性的束缚并获得自由。充分的个性——这是主要目的。而且，他建议我读一下《反杜林论》。

谈话本可以继续下去，要不是我做了一个轻微动作，表示想站起来，因为我不好意思这么长久地留住他。斯大林站了起来。我对他表示感谢。斯大林不喜欢被人夸奖或感谢。关于这一点他嘲讽地说，表示感谢看来就像是料不到他会这么做。他建议我们再次见面。“在高尔基那儿如何？”“很高兴。”

克里姆林宫的摄影师被叫了来，他替我们拍了四五张照片。告别。

谈话持续了1小时40分钟。阿罗谢夫受托记录谈话，并为我们制作副本。”

* 我在这儿想提及的是不久之前法国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方面以及马克思主义与科学进步的关系的出版物。

** 由斯大林和我审读过的正式谈话文本见注释[65]。

6月28日 星期五

晚上,回到“萨伏依”旅馆,我遇到两个男孩——安东尼奥·葛兰西^[64]的儿子,9岁和11岁。他们前来感谢我为他们的父亲所做的事。(我曾写过一篇引起热烈议论的文章^[66],借助这篇文章,为这位长期在狱中受折磨、病入膏肓的共产党人议员从墨索里尼那儿争取到一定的自由。)孩子们是由他们的姨母带来的。他们的母亲在丈夫被捕后,也患了严重的神经性疾病。

6月29日 星期六

从早晨起参观莫洛佐夫博物馆(现代西方绘画馆^[67])。重新见到了年轻时使我赞叹不已的画作:莫奈、雷诺阿、塞尚、高庚。还有当代的——毕加索、马蒂斯和其他人。应我的要求,找到了乌特里罗^[68]的唯一一幅画。

途中,就在旁边,是托尔斯泰的住宅^[69]。住宅很简朴,但别具一格,令人喜爱,带有不大的庭院和花园——资产阶级的外省法国住宅。

与尼娜·涅姆琴科^[70]共进午餐(她是广播电台文学编辑部主任,曾给我写过一封有关《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非常美好的信,《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在国内战争中陪伴她的朋友)。她特地从克里木赶来会面。她,一个顿涅茨矿工的女儿,是很幸运的:在童年时学习的实用艺术学校里,她遇到一个很好的老师,他对她很关心,向她介绍从罗丹开始的现代文化。接着发生了

* 原文如此——译者注。

革命。当然，远离政治的她也上了前线。而就在前线，在邓尼金⁽⁷¹⁾部队逼攻下退却时，她读了《约翰·克利斯朵夫》（《反抗》）。念完了大学。接着成了中央广播电台文学编辑部主任，常在《真理报》发表文章。后来，在晚上，玛莎的女友、教师米利齐娜说，这些不久前开始从事文化工作的工人子女全都是富有才能，满怀激情，从来不问自己，他们是为了谁和为了什么工作；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把一切归功于革命。革命事业——这是他们的事业。

5点，克留奇科夫来接我们，并把我们送到了高尔基那儿——位于小尼基塔街6号的他的莫斯科住宅。高尔基在门口等我们。

如果斯大林不是你所期待看到的那种模样，则高尔基就像你所想象的那种样子。身材很高，比我还高，大而不好看的慈祥的脸，扁平的大鼻子，浓密的浅色胡子和眉毛已经发白，剪成小平头的白发，粗大的手和脚，瘦瘦的，穿着宽松的衬衫，低沉的男中音，淡蓝色的眼睛，眼睛深处隐藏着很多的善意和忧郁。当他拥抱我并用力握手时，我注意到，他比我高出整整一个脑袋。

我们4人一起喝茶。克留奇科夫不得不每分钟都跳起来，去接安在住宅内的三四部电话。（高尔基所住的房子很大，但不属于他——房子是由富商里亚布申斯基⁽⁷²⁾建造的，虽然富丽堂皇，但粗俗不堪，招致高尔基的反感。）

无论是高尔基，还是克留奇科夫，都不会说一句法语。高尔基虽说在意大利住了很久，但总共只懂几个意大利词汇。玛莎充当翻译。高尔基有严重的支气管咳嗽，但他每天抽一盒烟。他知道，这对他有害，并许诺过两年戒烟。

我们谈了各种题目——既谈了昨天与斯大林讨论的事情，

也谈了继续存在的古老的、野蛮的俄罗斯。高尔基认为,应该将创伤拿出来示众。他说到叶努基泽,叶努基泽放松警惕性到如此程度,以致让凶手钻到了斯大林身边。高尔基批评了许多东西,包括如何煽起工人的虚荣心,授予他们英雄的称号,悬挂他们的画像以及诸如此类。“仔细地认真地完成自己职责的工人凭什么是英雄?”他问道。他不止一次公开反对类似的言过其词。他觉得,与以往一些同志的友谊正在削弱,并且这样的同志太多。接着,当我说到因为走自己的路而失去了几乎所有的朋友时,他忧郁地附和说:“我也一样。但又有什么办法?”^[73] 他把自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儿童身上,寄托在美好的新思维上。他想让我结识一下位于博尔舍夫的未成年罪犯公社及其改造原则。他说到在苏联人们对我的态度,这我是知道的。去年,在国际作家会议^[74]上,他曾说,法国作家,即使不是我的朋友,也以尊敬和感激的态度对待我所做的事。他希望我能在苏联、在妙不可言的克里木生活一个时期,并试图说服我与他一起沿着伏尔加河旅行几天^[75]。他说到俄国农民的变化,过去对他们是很严厉的。可以看出,他很疲劳。显然,不久前所患的支气管炎对他来说是严重的考验,并耗尽了他的精力。

晚上,在小剧院观看列昂诺夫的现代剧《斯库塔列夫斯基》的演出。可是,当我们在预定时间到达时,大厅内仍在进行新闻系学生和教师的代表大会,使演出的开始时间推迟了一个多小时——俄国人没有时间感,而且他们喜欢空谈。我立即被认了出来,响起了掌声,向我投掷鲜花。(这种场面在演出中间又重复了一次——令人厌烦透顶!)无论剧本还是演员都是二流的。表演做作、虚假:某种来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自然的狂怒。

坐在列昂诺夫的包厢内。一个健壮、愉快的小伙子,看上去

比自己的年龄年轻(他 36 岁),而且,似乎与自己的作品毫无共同之处,给我看了厚厚一本有关“俄国浴池”的手写册子(题词收集本),并希望我也在上面写点什么!我拒绝了!

6 月 30 日 星期日

劳动青年(工厂、工场、工会的青年)的盛大体育节日。

天气非常好,略微有点云彩。天空呈现浅蓝色,飞快地掠过片片白云。时而太阳灼人,时而吹来清新的风。12 点半,阿罗谢夫来接我们,我们驱车穿过克里姆林宫,来到挤满人群的红场:应该在这儿开始庆祝游行和表演,将有 12 万 7 千名男女和儿童参加游行和表演。在列宁墓台座旁的人行道边上,为我们准备了两把椅子。为了走到椅子那儿,不得不顺着人群走,他们用鼓掌对我表示欢迎。(这个场面被摄入了新闻纪录片。使我当时没有显出怪诞模样的唯一原因是,我并没有立即意识到,掌声是专门对我发出的。所以,我不慌不忙地走着,没有对掌声作出反应。在影片中,我的一只手似乎有某种轻微的习惯性动作,好像在说:“是的,是的,你们很客气……”就像在维也纳举行纪念贝多芬的活动期间^[76],当我在最豪华的饭店受到接待时,我对波拿巴公爵夫人的问题不假思索地随口回答说,“饭店不错”……)

我们坐了下来。斯大林和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们很快就到了,他们登上了列宁墓。斯大林发现了我,把我们叫到他跟前。我们登上陵墓,但拒绝了第一排的位置,坐在左面的栏杆旁。认识了所有的领导人:上了年纪的主席加里宁留着花白小胡子,戴着便帽;笑嘻嘻的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看上去比

自己的年龄年轻许多；季米特洛夫^[77]比我所想象的更谦逊和简朴，他说，在德国经受神经震荡后，仍感到疲劳；著名将军布琼尼的实际身材要比自己所有肖像中的矮小，就像一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对我特别客气，似乎在证明同样善于读书；《无神论者》^[78]的领导人罗斯拉夫斯基^[79]使我想起波尔·贝尔^[80]时代法国的反教会特权主义者；布哈林，洛佐夫斯基^[81]以及其他的人。稍后发现了加香，激动而真诚，热情洋溢地说了一些老生常谈的话。在略微低于我们的观礼台下方，是大使们的看台：蒲立德，阿尔方，不像其他人那样快活的日本大使。（可是，在我逗留苏联期间，法国大使阿尔方总是对我十分不友好。而这并不令人奇怪：在世界大战后，在我访问过的许多国家，情况都是这样；法国大使们害怕损害自己的名誉；我依旧被认为是自己国家的“超乎混战之上”的坏公民，他们装作不认识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像现在，就在他们的鼻子底下，我被作为官方客人接待，他们就觉得自己受到侮辱，于是更迁怒于我。这并不说明他们聪明……但倘若他们是聪明的，难道他们能当上大使？）

庆祝活动以《国际歌》开始，随后苏联体育协会主席发言。接着，在3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是盛大的庆祝游行。半裸露的男子、妇女和儿童显得抑制不住地高兴，他们排着整齐的密集队伍，怀着一样的激情，以一致的节奏行进。妇女的队形更是无可指摘，行走时有更坚定的目的性。每支队伍、每个纵队（由某个街区的居民或工厂派遣的代表组或，或者按职业特点组成）都有自己的颜色、自己的旗帜和标语牌；有时觉得，移动着的是花的田野。这是真正的人民庆祝集会之一，它能使柏辽兹^[82]忍不住心跳，而我从少年时代起就梦想这种庆祝集会。有时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列队行进的是抬着凯撒^[83]及其尉官们^[84]的画像的

古罗马军团士兵。这时,行进的人群看上去就像凯旋而归的罗马人队伍——行进的是拿着战利品的军队。在不牢固的平台上,他们不仅手持劳动或斗争的工具,而且摆出生动的造型:半裸露的男子和妇女时而摆出铁饼运动员的姿势,时而摆出标枪运动员的姿势以及其他不断变化的浮雕般的姿势。所有这些生动的造型都是某种高雅风格与杂技序幕会演^[85]的非凡混合物:攀登悬崖的登山运动员,(认真)厮杀的战士,打篮球或踢足球的运动员,进行灵活的叠罗汉和完成冒险的跳跃的技巧运动员。而且,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狂热的人海之上进行的,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在陵墓前,在站着国家领导人的观礼台上,所有人的脸都朝着他们的方向,人们一字一顿地高声呼喊(这喊声是多么狂热,尤其是妇女的喊声),并发出快活的笑声。气球在天空漂浮,有人放出了鸽子。飞机在广场上空画出字母和符号。突然,类似史前怪物的新型超高速飞机(达每小时 500 公里)像巨大的黑熊蜂一样向我们俯冲下来。骑自行车者、士兵和来自“狄纳莫”^[86]工厂的分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分队)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后一边。

晚上 5 点,极其疲乏和冻僵了的我从陵墓上走下来。玛莎很不乐意地跟在我后面。我已经到了下面。伏罗希洛夫从上而对我喊道:“别走!再呆一会!马上就开始最有趣的东西!”我不得不留下来,又在陵墓上而坐了一个小时。旁边,在砖石砌的栏杆上,坐着李维诺夫,他不时地摇晃着身子,竟意外地向后穿过座位摔倒在地上。他虽然又矮又胖,却很敏捷地站了起来。一首接一首地演奏舞蹈乐曲,每首乐曲都带有向斯大林致敬的、雅克-达尔克罗兹^[87]风格的引子。这些东西很少使我感兴趣,我偷偷地溜走了。可是,在出去时,就像在进来时一样,人们用鼓

掌向我表示欢迎。

在出发去郊外的高尔基那儿之前，我们在“萨伏依”旅馆休息了一小时。试图回想起这一天的事情。几乎不可能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印象极其零散。我无法在两个斯大林之间找到共同点——前天在克里姆林宫与我交谈的斯大林，以及象罗马皇帝一样花了6个小时欣赏自己的封神仪式的斯大林。一排又一排巨大的斯大林肖像在人们的头顶浮动。飞机在空中画出领袖姓名的第一个字母。人数很多的群众角色在皇帝包厢前唱起颂扬斯大林的赞歌。人们在行进时，目不转睛地看着举起一只弯着胳膊的手站在那儿的他。斯大林似乎感到腼腆、拘束、不好意思见人，但同时又在展示自己。莎士比亚如能描绘汇集在一个人身上的这两个凯撒，两个斯大林，他会获得多大的满足！

我忘了另一个看不见的凯撒——列宁的影子……他的遗体就长眠在我们脚下。但我没有机会看看他（我不能说，这使我难过！）：遗体现在不让人瞻仰——遗体已开始腐败……可是，在陵墓内部——啊，真是命运的戏弄——在地下室，竟开设了小吃部！（我们在那儿见到指挥官埃德曼^[88]，后来我们将在高尔基那儿遇见他。）

快到6点30分时，莱温医生来接我们，带我们去郊外的高尔基那儿。再见，“萨伏依”旅馆！旅馆职员，无论职位高低，谁都不愿接受我们的任何酬劳。这种做法使他们非常生气，他们讨厌这种做法。许多为我们服务过的人在告别时说了令人感动的话。感谢在莫斯科不是一个空洞的词汇。

别墅位于50公里外。一小时车程。最初45分钟我们顺着好路朝斯摩棱斯克方向前进（就是拿破仑走过的那条路——对他的回忆尚未磨灭）。最后15分钟走的是坏路（在我们从那儿

经过的那段时期,正在修路):唯一风景美丽的一段路是穿过一片壮观的桦树林的路。一幢很大的两层楼房子,帝国风格(这儿的人们说是叶卡捷琳娜二世时代的风格),红褐色,带有白色圆柱。高尔基先于我们到达,盛情地在门口迎接我们。我们被安置在二楼右侧带有很大的前厅和凉廊的4个宽敞房间内。在构造类似的左侧,住着“年老而非常安静的作家”——高尔基善意而疲惫地笑了一笑,这样说他自己。在两侧中间是狭长而宽敞的餐厅(一楼的类似餐厅用作隆重场合和接待时的客厅)。从我的窗口可以看到一直延伸到地平线外的草地(草地后面是莫斯科河,但我看不见它),草地周围是树林。万籁俱寂。

我们坐在大厅内的长餐桌旁吃晚饭:我坐在高尔基对面,由于高尔基的年轻儿媳妇不在场,玛莎坐在我们之间的餐桌首座。高尔基的右边是克留奇科夫和另外两个人——亲友中的什么人。我的左边是克留奇科夫的年轻妻子,高尔基的两个小孙女达里娅和马尔法,家庭女教师,善良、丰满和乐观愉快的奥林皮阿达^[89],女护士以及别的什么人。每次用餐家里人所坐的位置都有变化,除了我们在桌子边上的位置。除了玛莎,谁都不会说法语。高尔基总是说笑话,玛莎则把他的俏皮话翻译给我听。他说得很慢,嗓音低沉,有时他的眼睛流露出调皮的神情,但很少微笑。笼罩着十分朴实和自由的气氛。有人从餐桌旁站起来走出去,也有人坐下来。“你们自己越是不客气,就越是使我们不感到拘束。”高尔基逗弄自己的孙女,称她们中的一个是无政府主义者;她们彼此吐了一下舌头。他说,有一次,当他的儿子还是小孩子时,他和儿子一起钻到桌子下面,打碎了他们不喜欢的碗碟。我说:“您自己教了他无政府主义思想。”他耸了耸肩,似乎表示同意,并承认自己的过错。“可是,您拥有某种比他们

的尊敬更重要的东西，”我说。他嘲弄地答道：“是的，他们的爱，我借助敲打后脑勺获得了他们的爱。”

晚饭后我们听了几张夏里亚宾⁽⁹⁰⁾的唱片。高尔基埋怨说，留声机使美好的俄罗斯民歌走了样。

7月1日 星期一

我在自己房内吃早饭，只是在1点半吃午饭时才见到高尔基（我们在7点半吃晚饭，4点半喝茶）。

莱温医生对我作完检查，发现支气管有点发炎（昨天露天庆祝活动的结果），开出的处方是注射胺甲苯膦酸钠和拔火罐。晚上，由奥林皮阿达拔火罐。（她常常给高尔基拔火罐，有时早晚各40个，罐子的停留时间超过15分钟：他的皮肤很厚）。

在屋子前的花园内散了一会步。法国样式的大花园：平坦的草坪，照料得很仔细的花坛。这个花园显然不合高尔基的口味，或许他不觉得自己是这儿的主人。这幢别墅不是他的财产。正如后来我所知道的，别墅不是他所选择的，而是作为官邸得到的。林荫小道被撒上了黄沙，就像在我们蒙布隆那样。充满天芥菜的强烈气味。左右两边是树木的屏障——桦树、云杉、椴树。在花园尽头，有一座10级的木梯笔直通向莫斯科河。河流不宽，弯弯曲曲，时而在左面、时而在右面分出支流，有许多浅沙滩。在河对面高高的沙岸上，无数燕子正在筑巢：它们的巢孔使人想起蜂房。可以看见很大一片野生的河滩草地，长满高高的青草。我想象，托尔斯泰会怎样穿着长筒靴子在草地上行走。再远处是半圆形的树林。从树林通向花园左方的小道在吊桥处汇合，吊桥跨过一道狭长而很深的、消失在密林中的沟壑。沿着

高高的沙土岸脊，另有一条路通向河上一个不大的凉亭。地平线几乎与天空融成一片。回到屋内，遇见一群猫。14只各种毛色的猫像主人一样生活在屋内。白色的鸡雏像国王一样高傲地在花园的林荫小道上来回觅食，它们是未来的牺牲品（吃饭时每个人都能得到一块鸡肉）。

根据俄罗斯习惯，餐桌上有丰富的鲜菜和水果，还有黄瓜、蘑菇、鱼子、腌菜、熏鱼。每个人拿着盘子从自己的位置上站起来，用餐叉从供大家吃的一大堆菜中取出一部分。送上来红汤（红甜菜汤）和一道道油腻的、加了很浓的调味汁的菜，有榛鸡和别的许多东西。尝试为我制定单独的营养菜单，但并不特别成功。高加索酒和矿泉水。大家什么都尝一点（许多东西没有吃完）。

7月2日 星期二

我的妻子与前夫生的儿子谢尔盖刚顺利地通过大学里的考试，与年轻的妻子丹娘一起来我们这儿作客。他们占据了我们的这套住宅的一部分，将留在这儿直到我们动身回去。（他们只是几个月前才结的婚。谢尔盖18岁，丹娘21或22岁。谢尔盖从童年时起就爱她。我们得知这件事时木已成舟。电报中说：“今天结婚。望你们赞同。”丹娘是个讨人喜欢的姑娘，个子高高的，身段柔软而匀称，但脸部神情呆板，有点像年轻的英国女人。按职业她是“灵巧的芭蕾舞女演员”。应验了费加罗的话：“这儿需要数学家。但获得位置的是跳舞者。”这一次是芭蕾舞女演员嫁给了数学系学生……）

与高尔基交谈。他总是说笑话，不断地开玩笑。我记下了

我们的几次谈话,但有点凌乱,是按我记住的次序记下的。

他有关俄国作家的议论使人感到不快。

托尔斯泰:高尔基强调在他的极大的天生才能与平庸的智慧之间的经常的对立。托尔斯泰也知道,就智力来说他是很平凡的,但不想承认这一点,固执地用自己的鉴别力加以掩盖。高尔基举了几个证实这一点的例子。我只记住了一个:一个著名音乐家不知怎么与托尔斯泰谈论贝多芬——托尔斯泰对贝多芬并不心悦诚服。音乐家不与他争论,走进隔壁房间,在钢琴后坐下,开始演奏《热情》奏鸣曲。过了一会他中断演奏,正好看到托尔斯泰伸开手臂躺在沙发上流泪。但托尔斯泰不愿承认为什么流泪。他只是反复说:“是的,我是傻瓜!……”他徒然地鼓吹对生命的尊重,而在心灵深处,托尔斯泰终究是个猎人。看到野兽,他不会不有所动作,似乎准备对它开枪。高尔基观察过这一点。他认为,托尔斯泰的女儿亚历山德拉(已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与其说是凶恶,不如说是愚蠢;而另一个女儿塔季扬娜与其说是愚蠢,不如说是凶恶。但在高尔基看来,最大的过错在切尔特科夫^[91]身上,他称切尔特科夫是个狡诈的人,是依附于托尔斯泰的微不足道的人,托尔斯泰凌驾于他之上,实际上,他只是为托尔斯泰而活,没有托尔斯泰,他就什么都不是。

柯罗连科^[92]:说来令人忧郁,虽然高尔基有点不好意思地表示道歉,但他不知何故忘记了应感激柯罗连科的一切,只记住了刺伤他的唯一一件事。当他第三或第四次向柯罗连科借钱时,柯罗连科背对着他把钱递给他。(这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或许,柯罗连科也不想侮辱他。出于自尊心,高尔基至今不原谅柯罗连科的这件事。)他说,柯罗连科对普遍公正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致他无法看到和理解个别人的需要。他是无限忠

于公共幸福思想并抗议一切不公正的作家的优秀楷模,但以道德说教的语气,并不深入了解事情的真实细节。最终他把四分之三的创作献给了自己的社会使命,许多作品没有写完。高尔基赞扬了他的作品的某些非常好的片段。

高尔基极度赞赏哈代。他所喜欢的3部作品是《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和《德伯家的苔丝》,而且更喜欢哈代的小说。

他回忆起刚到莫斯科时的情景,回忆起最初的洋相。在作家会议上,大家对他表示赞许,而他在回答别人为他举杯祝贺时说:“为河中无鱼,虾米成大鱼干杯。为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干杯。”大家的反应冷若冰霜。朋友中有人为了减轻一点他的尴尬,附和地说:“喂!可是,不能忘了柯罗连科!”“我的事业受到损失,”高尔基说。至今他把那个时期的屈辱埋藏在心里。在街上,一个年轻妇女不知怎么对他说:“喂,乡下佬,给个火!”他问道:“为什么您认为我是乡下佬?”“因为你的脸傻里傻气的。”

离他的郊外住宅不远,有前亚美尼亚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地产。战前他资助亚美尼亚的爱国主义团体,后来感到厌烦。但人家让他明白,如果他中止资助,他将为此付出代价。他又支付了一年钱,接着认为,对他来说离开梯弗里斯^[93]更安全,于是在莫斯科近郊买了地产,用厚厚的带雉堞高墙把地产围了起来,并四处布置了盲目地忠于他的切尔克斯人卫队。来到这儿,他在屋子里呆了不到两分钟,就不省人事地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托尔斯泰式的故事。有人说这是谋杀。高尔基认识他,又高又肥,看不见脖子,据说这是中风。

从5点到7点,有时到8点,给我们放映电影。这是我的要求,但我的胃口的满足要比俄国人迅速得多,他们总是感到东西

太少。

应我们的要求,第一部影片是《战舰“波将金号”》,此前我没有看过这部影片。当晚还放映了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改编的《母亲》。在这两部作品中(就像在《夏伯阳》中一样),掺入了残忍,换句话说,掺入了仇恨,而这在任何情况下都表现为血腥的和令人不安的场面。使我感到不自在的是,高尔基带着9岁和11岁的两个孙女,好在她们什么也不懂(但真是这样?),嘻嘻哈哈地发笑,并感到无聊。

第二天我们看了《快乐儿童》和《羊脂球》。后一部影片不错,这是很大的成功,虽然它有点硬塞进作者的意图,比莫泊桑的作品更有倾向性。可是,第一部影片经不起任何评论,超美国式的,难以忍受的故作丑态和低级庸俗的歌唱的大杂烩。它证明了苏联电影的可悲趋势。我没有掩饰自己的憎恶。克留奇科夫以及前来拜访的阿韦尔巴赫* (或许)也有同感。但我没有把握,高尔基是否也有同感。他认为,观众看到的悲剧影片太多,而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需要更多的快乐。我也需要快

* 我所说的阿韦尔巴赫是来喝茶的。这是一位年轻的文学家,已在莫斯科出了名。他曾主持《岗哨》杂志,通过它实施对整个文学界的锋利而危险的思想审判权。他显示出毫不妥协的政治纯洁主义,作为国家政治保安局首脑亚戈达^[95]的妻弟,他看来是不可触动的。但上面认为他的过于生硬的批评和过分的纯洁主义是有害的。日内他将被派往乌拉尔,担任一家大工厂(制造机器的机器工厂)的党务工作者。他不仅没有提出抗议,他表示同意,而且十分出色地适应了新角色,甚至装出似乎蔑视过去的样子。他热情地讲述这件事,如今人们把他看作党的最优秀组织者之一。高尔基说,这样的事例不是唯一的。一些有功绩的基层党组织负责干部出身于青年联合组织,现在可以在苏联各地找到这种干部,他们管理着外省(作为党代表)。没有人认为自己的被放逐是沉重的差役,大家都认为这是荣誉。阿韦尔巴赫性格开朗,精力充沛。人们说,他很聪明。他将成为首长^[96]。

乐。但别让我们欣赏美国人的快乐、他们的爱情和他们的爵士乐!

第三次给我们放映的是有关苏联和波兰边界的犹太人影片《边界》，富有独创见解和表达力；另一部影片《傀儡》具有近似阿里斯托芬⁽⁹⁴⁾的戏剧的象征意义，目的在于反对西方议会制和法西斯主义，铁匠铺大王战胜了西方议会制和法西斯主义。主题思想预先就知道了，有一些不错的镜头，但愚蠢的东西很多，也是美国式的。印象是，这儿的人们有那么久时间失去了酒吧和舞厅的戏谑，所以现在用一切理由以及不用理由就沉缅于这种戏谑。

7月3日 星期三

上午乘汽车兜风，围绕戈尔基（我们所住的地方这样称呼：“戈尔基”在俄语中是“小丘”的意思）走了80公里。沙土路弯弯曲曲，时而向上，时而向下；广阔的平原，接连不断的上坡路和下坡路，小丘，有时相当陡峭。（道路右边的一个小丘是拿破仑堆筑起来的，用于观察莫斯科河边的会战进程。）在混杂的树林——桦树、橡树、云杉——中前进，路过或多或少整修过的草地。蓝色和黄色的木屋，都是平房，有3个窗户，其中一些屋子雕刻有花纹。当家庭扩大或者分割时，给屋子添造附属建筑，或者像切馅饼一样划出一部分。木屋周围长满青草，或者位于树林中，住户多半不愿意费心清理场地。有几个集体农庄从事养鸟、养蜂业和园艺业。田野上看不到家畜。大概家畜都集中在集体农庄内。居民点由简易住房组成，为莫斯科建造新的自来水管道的工人就住在这些简易房内。在这个地区，禁止在莫斯科河里

洗澡。远处就是莫斯科。我们在林边停留了几分钟，采摘鲜花。

以下是由这次兜风引出的一些看法：

在毗邻莫斯科的四郊，散布着一些在地图上没有标明的别墅（也包括高尔基的独家住宅），里面住着领导人及其客人，或者就是受到特别关照的作家。遇到宽阔的铺有卵石或柏油的道路，你问：“它们通向哪儿？”回答总是：“通向别墅。”道路沿线站着警察，他们也从树林中暗地里进行观察（谢尔盖在那儿遇见过他们）。在地平线上，可清楚地看到一幢位于树林中的雪白的漂亮疗养院。你问，它供谁使用？回答：“政府的上层成员。”你问，石油大王祖巴洛夫的坚固的巨大庄园派了什么用途？回答：“那儿也是高层社会的别墅和休息区。”我们在路上遇到鲍里斯·皮利尼亚克⁽⁹⁷⁾的汽车，他与其他作家一样，在莫斯科近郊也有别墅——许多作家与皮利尼亚克一样，现在都拥有汽车。但我们也在路上遇到了向我们投来忧郁目光的男子，一个老年妇女向我们显示了一下拳头。（也许，我的理解有点不对。但我按事情的进程记下自己的印象。或许这些印象然后将得到纠正。）

高尔基经常去意大利，并长期住在那儿。但是，看来他不大了解那不勒斯地区以外的意大利，而且终究没有学会说意大利语。他讲述了许多有关索伦托和卡普里岛的人们的有趣故事。他对墨索里尼很冷淡，认为他只是一个吹牛大王。他承认墨索里尼所做的部分事情是合理的，包括排除蓬蒂沼地的水。看来，苏联驻意大利大使与这位领袖的关系很好。

在索伦托，高尔基住在一个非常古怪的人——德卡普寥洛公爵——的别墅里。这位公爵只做一件事：每月为自己定制新衣，而为了在柜子中腾出地方存放新衣，他用独轮手推车把家庭档案扔进了大海。据说，在一次招待会上——他邀请了当地所

有上流社会人士出席这次招待会——在等候他很久之后，他穿着连衫裤工作服出现，跳起来挂在枝形吊灯架上，摇晃了两下，就消失不见了。他的女儿告诉高尔基，女人如果希望有人爱她，在月经期就不应该洗澡——她的气味会吸引男人。

应高尔基的请求，我对他讲了有关邓南遮的情况。在邓南遮的所有作品中，他特别列出《死的胜利》（其中描述了游行队列）。他还赞叹地向我问起卡尔杜齐^[98]的情况，对没有能与他认识感到遗憾（他说到卡尔杜齐的颂歌《撒旦颂》）。

他叙述了因贪婪而闻名的空军元帅巴尔多的讽刺性故事（他积聚了2300万里拉）：巴尔多与自己的飞行中队在南美一个共和国降落后，在官方招待会上，他和总统决定用法语表达想法，但他俩对法语的掌握都不够好。所以，总统对客人说，很高兴欢迎“意大利最大的窃贼”^[99]，对此巴尔多谦虚地答道，在意大利，像他这样优秀的窃贼有很多。另一次，从罗马尼亚进行官方旅行后回来，他对墨索里尼夸耀接待之豪华和用具之奢侈——餐叉和勺子都是纯金做的。墨索里尼要求说：“拿出来看看！”还有一个有关巴尔干国家的趣闻。在罗马尼亚的一次外交宴会上，英国大使不知怎么不得不确认，他口袋中的表丢了。他悄悄地对招待会主人、国务（委员会）主席说明了这件事，主席问他：“坐在您旁边的是谁？”“保加利亚部长。”“好得很。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们将把表还给您。”过了几天果然把表给他送来了。惊奇的英国人问：“你们怎么能迫使他归还表？”“哦，”主席答道，“他没有发现这件事。”

高尔基对保加利亚人比对罗马尼亚人更尊重，列举了一些保加利亚作家的作品。但他甚至没有提到伊斯特拉蒂^[100]的创作。后来他反感地谈到伊斯特拉蒂的为人。他们不知怎么在莫

斯科见过面，而高尔基对他感到厌恶。我认为，伊斯特拉蒂同样对他抱有反感。但我在苏联逗留期间，回避了这种谈话。伊斯特拉蒂不久前死了，所以我难于听取有关他的严厉议论，虽然——唉！——他的轻率行为为这种议论提供了根据。

快到吃晚饭时，明茨^[101]来访，他是《国内战争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秘书，他为这套丛书写了许多有关英国和法国武装干涉的章节。

给我们放映了有关最近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纪录影片，影片补充了我对6月30日壮观的庆祝游行的印象。热情洋溢的代表团和人群没有任何装模作样的地方。国家领导人把在他们面前走过的游行队伍的热情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这一点上同样没有任何装模作样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喜欢他们为自己安排的美好场面，并怀着兴趣、惊讶和好奇观赏这种场面，好像对什么都感到新奇的大孩子（例如，伏罗希洛夫让斯大林看天上的飞机，好像以前他们谁都没有见过飞机，斯大林则像孩子那样笑了起来）。除了对6月30日庆祝活动的印象，现在又增加了对五一节军事检阅、坦克、飞机的印象，以及对忧郁的外交使团（尤其是日本大使）的忧虑脸色的印象。

7月4日 星期四

上午，在花园内，用电影胶片为我和高尔基两人摄了影。要求我们在麦克风前讲几句话。高尔基坚决拒绝了（他善于这么做，同时保持非常平静的语气，几乎从不提高嗓门）。接着，尼娜·涅姆琴科与自己的几个同志一起来了，其中有谢西利亚·拉比诺维奇，要求我为他们的广播剧《哥拉·布勒尼翁》^[102]对苏联

听众致祝词,还要求我说几句自己对在苏联逗留的印象。(玛莎应我的要求草拟了祝词和谈话稿。)摄影师和录音工作者像苏联的蚊子。

与年轻、快活和乐呵呵的布哈林*共进早餐;他与高尔基互相拳击(但高尔基很快请求手下留情,抱怨布哈林的手太厉害)。就像我们初次见面时那样,布哈林向我夸耀中部亚洲:他对中亚着了迷。午饭后,下午4点,单独与布哈林交谈,起初在花园内的长凳上,接着在莫斯科河上的凉亭内。我向他提了一个使我不安的问题:“我见到了贵国领导人和你们的劳动大军。但我想知道,苏联内部敌人的力量如何?我有一种印象:你们经常处于战争状态。”“不,”他说,“战争状态只是在敌人的力量相当大时才出现。实际上敌人的人数并不多,只不过是一些零散的团体。但他们的仇恨程度和他们所利用的手段仍使他们成为危险的人。”他指的只是反对派分子和托洛茨基分子。可是,我还想到了旧的野蛮的俄罗斯,想到了昔日生活的残余。布哈林谴责错误的托洛茨基主义意识形态。我问他,在这种冲突中,有没有个人偏见和争论激烈时的丧失理智。对此布哈林回答我说,我应该明白,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性格的对立其实始终是由意识形态的对立预先决定的:丹东^[104]、吉伦特派^[105]、“疯人派”^[106]等。(我倒想说,意识形态的对立是由性格的对立预先决定的。)但对他这样有坚强信念的知识分子来说,思想先于一切行动,并决定行动。“托洛茨基断言,”他说,“没有其他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帮助,社会主义革命就不能生存。相反,事实证

* 布哈林是唯一能流利地讲法语的领导人。拉狄克^[103]也能讲法语,但口音很重。

明,在一个国家获胜的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其他国家革命无产阶级的后卫。”我说到法苏军事协定在西方人心中引起的慌乱。布哈林说,必须善于理解字里行间的意义,而且,共产国际并未放弃选定的方向。一旦战争发生,它会下达相应的指示。但现在不能大声谈论这一点。列宁制定了明确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在国内战争年代,俄国寻求与法、英接近,反对德国。列宁认为,革命无产阶级始终有权利利用自己的一个敌人反对另一个敌人。“那时,”布哈林说,“我不明白这一点,我是幼稚的(后来他再次重复这个词)。现在明白了。”根据布哈林的理解,政策应该紧密地与具体情况联系在一起,并且不脱离事实。应该经常随机应变,看风使舵。一切都是相对的和活动的。因此,决定革命发展的规律也就是革命逐步地、分阶段地发展的规律。发生了十月革命,发生了国内战争,后来是富农阶级,后来是建设计划。只是再后来,才到了无产阶级人道主义阶段。在以前时期,没有、也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地位。布哈林还谈到了个性问题(虽然我对他说,我对这个问题已不感兴趣,我也弄清楚了基于误解的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对立)。布哈林证明,不能抽象地讨论个性,应该以事实——对待工人、对待农民的态度——为基础。如果你花几年时间研究他们,你就会清楚地看到他们的个性的惊人的(预先取决于事实的)发展。农民以前没有任何见识,由于机器的出现,不得不接受技术教育;他们还必须弄清集体农庄内部、集体农庄之间、各种或近或远的集团之间的关系。工厂今天已变成真正生气勃勃的大学……

与布哈林和高尔基一起喝茶。布哈林临走时吻了高尔基的额头(他刚刚开玩笑地用双手搂住高尔基的脖子,搂得他叫了起来)。我们大家一起照了相。

(我对布哈林向我表示的好感感到非常惊奇和感动。这不单单是知识分子的友好天性。这是从初次见面时起就不由自主地产生的热爱和依恋的情感。在他的大量文章中,充满这种情感。但在他的话语和他的眼睛中,我更清楚地感觉到这种情感。布哈林本来就有一颗炽热的心,他因特别年轻的心灵而非常冲动,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时间改变不了他心灵的年轻。谁能想到,这个个子不高、爱开玩笑、灵活机智和异常活跃的人,苏联两张最大报纸之一的领导人和台柱子,脑力活动和实践活动的擅长者,其实是数学家和科学哲学家?)

晚上,在高尔基的餐桌旁,与党中央的4名成员共进晚餐——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是个身材高大的男人,长着扁平的、死一般苍白的脸和高额头,他的外表是病态的,忧心忡忡的。卡冈诺维奇身材更高大壮实,他的外表非常冷淡,使得人们疏远他。他一刻也不转移注意力,异常紧张地默默注视着一切。伏罗希洛夫身材矮小,一张绯红色的脸,一双眯起的、笑嘻嘻的眼睛。他总是在动,就像一个爱开玩笑逗乐的小伙子,对这种人来说,什么东西都能成为快活的理由,而且,这种人无忧无虑。斯大林有心情开玩笑,也说着逗乐的话,他的农民式的幽默有点粗鲁。他不停地说着这样那样的笑话,发出由衷的笑声。伏罗希洛夫接过球又扔回去,一边哈哈大笑。高尔基同样作出响应,不过没有那么大声,而且,他也发起进攻。

在高尔基的客人中,有他所保护的工程师伊格纳季耶夫伯爵⁽¹⁰⁷⁾。他发明了自动刃磨、永不变钝的双面刮脸刀片(一家带有他的名字的工厂现在正在生产这种刀片),目前他正在研究依靠水流阻力工作的新的船用螺旋桨系统。斯大林与他的同志们

一样,对他开挖苦的玩笑,但听取了他的陈述。临近结束时,斯大林对有点气恼的发明家说,他对他的解释很感兴趣,但想要逗弄一下他,因为他“太一本正经”。所说的小船停泊在离花园数百米的莫斯科河下游,伊格纳季耶夫对斯大林说,为了检验自己的试验,他已擅自下令筑堤挡住河水的流动。他在明白自己对政府成员们所作声明的全部重要性后,立即补充说:“当然,为此将把我送进监狱,但我来得及检验……”

餐桌上摆满了美味食物:既有冷盘,也有各种火腿,还有鱼——腌制的,熏制的,冻凝的。热菜有虾烧鲟鱼肉、奶油榛鸡以及诸如此类。高尔基定了调子。他一杯接一杯地喝伏特加酒,并因此受到惩罚——咳嗽强烈发作。咳嗽迫使他从餐桌旁站起来,走出去几分钟。在场的人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阻止他破坏医生的禁令,连爱戴他和负责照料他的克留奇科夫也是如此。(我应该补充说明,平常高尔基总是忌酒的,吃东西也少得惊人,甚至吃得太少,但这并不使莱温医生感到担心——高尔基无疑具有更适应吃得不够、而不是吃得太多的人的体质)。斯大林吃得很多,喝得也很多,但他能适可而止。在次数合理的干杯之后(根据俄罗斯风俗,我们依次为在场的每个人的健康干杯:从我开始,接着为斯大林的健康,接着为我妻子的健康,接着为莫洛托夫、伏罗希格夫、卡冈诺维奇、克留奇科夫的健康……你们瞧,完全在合理的范围之内),斯大林突然停了下来,拒绝喝饮料和接受请吃的东西。由于为我们服务的姑娘继续坚持,斯大林用玩笑使她着了慌,接着,又半侧着身子面对她,提议为她的健康干杯,使她不能不脸红耳赤,拿着盘子偷偷躲了起来。斯大林满足地不时抽一阵木制短烟斗。他带着有点粗鲁的温情开高尔基的玩笑。问他:“这儿谁是秘书,高尔基还是克留奇科夫?”或者

问：“这所房子里有没有秩序？”高尔基耸了耸肩作为回答，似乎不知道答案，接着问克留奇科夫：“有没有秩序？”

晚饭前，4个人一起长久地对阿罗谢夫以及我们从他家逃亡的事进行嘲弄。虽然他们自己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们仍向我们详细打听。我们不希望以任何方式伤害我们的主人，说，由于闷热才离开他的住处（就在房顶下面）。但斯大林狡诈地坚持问：“怎么，除了炎热，没有任何别的原因？”玛莎不好意思地答道：“阿罗谢夫对我们非常关心。”斯大林对他说：“您是外交家，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高尔基提示说：“是臭虫？”玛莎点了点头。伏罗希洛夫拍了一下大腿。5个人全都憋不住扑哧一笑。我们试图替我们的主人解围：“当然，他不知道。”“知道，知道！”斯大林说。“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暗自说，‘或许他们不会察觉。’他自己是厚皮。”又是一阵笑声。“可是，这事怎么会被人知道的？”玛莎说。“只有我们俩知道这件事，我们没有对其他任何人说过；除了我们，还有两个妇女（女护士和家庭女工），但她们答应不对任何人说。”高尔基提示说：“还有第五个人——斯大林同志。”

斯大林说：“在从前时候，当主人等待客人时，他们在隔夜让一个养得胖胖的年轻姑娘躺在床上——为的是让臭虫吃个够，使它们不去打搅客人。”

莫洛托夫和我谈论艺术作品的出口。为获得外汇，曾在国外出售艺术作品。现在已没有这种对外汇的需要，出口已暂停。不过，没有出售任何重要作品。接着，莫洛托夫平静地补充了这样一句极好的话（稍后卡冈诺维奇重复了这句话）：“其实，它们存放在英国或者美国，这有什么区别？反正它们迟早将公有化，也就是说，将永远是我们的。”

在餐桌上,同志们祝贺卡冈诺维奇(他是我的邻座,对面坐着斯大林和高尔基)卓有成效地领导地铁建设工作。应我的请求,他对我解释说,在那儿,妇女从事与男子一样的工作。我说,从她们在6月30日庆祝游行时乐观愉快的外表来看,这么做没有损害她们的健康。卡冈诺维奇回答我的话说,起初不想接受她们,但她们用坚决的请求使他改变了主意,所以现在在那儿工作,但与男子一天6小时不同,一天工作4小时。

谈话转到举债数十亿卢布建造“马克西姆·高尔基号”类型的巨型新飞机——甚至这个数目也很快被居民的缴款打破了。政府不得不暂停接受已认购公债者的缴款。

还谈到了新宪法。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通过了有关新宪法的决议,新宪法目前正在制订之中。斯大林希望它将成为值得雕塑家动刀的纪念碑。

晚餐结束后,4位领导人集中在明茨为他们提供的国内战争地图周围。明茨也出席了招待会。他们热烈地进行争论,讨论不同的战斗地点。他们曾在这些战斗中起过自己的作用。

与高尔基一样,这几位领导人没有一个会说法语(我已提到过这一点)。看来,他们也不会说在苏联境外运用的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我与卡冈诺维奇谈起这一点,他对世界语的态度并不十分赞同。在他看来,世界语在苏联根本不流行。对此我深感遗憾;至于我本人,为了注意谈话进程,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而由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这个晚上在我看来非常令人疲劳和枯燥无味。

斯大林和高尔基一起提到了人民音乐发展薄弱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我有许多想法。高尔基是过于悲观了。他似乎认为,无产者尚不可能想出任何有意思的东西,所以贪婪地模仿摩登

艺术家。我答应为苏联报纸写一篇有关人民音乐的文章。

7月5日 星期五

上午11点,利平一家^[108]前来看望我,我与这一家人信函往来已有很多年(我的地位卑微的“要人”)。他们一共11人:母亲,长着勃艮第人^[109]鼻子的儿子,今天早晨特地从克里木回来的女儿;其余的都是朋友,其中有一个年轻妇女,她曾作为生物学家参加“切柳斯金号”考察队,一个大学生士兵(在一段时间内,继续在军队服役两个月,外加每月服役数小时),还有大学生——有学生物的,有学化学的,有学地质的,有学物理的。利平家的人从事水生生物学,已经传染上疟疾。他们全都乐观愉快,精力充沛,彼此之间非常和睦:他们每周集中在一起,跳舞,唱歌,写诗。年龄最大的22岁。他们不漂亮,但可爱,是幸福的劳动青年的榜样。妈妈在精神上同样年轻。我们在花园深处莫斯科河上的小凉亭内交谈。重型联合收割机正在割河对岸草地上长得很高的草。一群白嘴鸦唧唧喳喳地跟在收割机后面。我问,他们是否来过这儿,利平妈妈回答我说,没有。我知道,他们都是游玩的强烈爱好者,而这个地方就在莫斯科的大门口,因此我得出结论:众所周知,这儿是禁区。

接着,我被叫到高尔基那儿,接待帕列赫^[110]细密画大师代表团。他们在土耳其斯坦和亚美尼亚作了一个半月的旅行后回来,从那儿带来了极好的画册,这些图画都是在研究手稿和建筑样式的基础上画的(我在这些图画中认出了一些对帕列赫细密画的构图来说很有特色的图案,包括马的形象)。他们之中有3或4人是当之无愧的大师,劳动组合的主席,还有几个人十分年

轻。他们送给我一册非常漂亮、插图画得极其出色的《伊戈尔远征记》^[111]（这是他们第一次尝试创作彩色插图图书）。我更喜欢他们的漆器作品。送给玛莎的是一个上了漆的匣子。帕列赫是弗拉基米尔附近一个村镇。在那儿他们有 70 或 80 名大师，每人都有其自己的作坊。1922 至 1923 年，他们的风格发生了变化。妇女在他们中间工作已有好几年。他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博物馆，还有一个藏书不很丰富的艺术图书馆。可以看出，是职业的自尊和团结精神将他们联合在一起。他们请求高尔基劝说他们最优秀的画家科林^[112]戒酒。高尔基开玩笑说，他做这件事将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自己也喝酒。老头们都笑了起来。可是，帕列赫的青年外表看来非常严肃。他们使人想起古代佛兰德^[113]的工匠。他们之中有一个面容瘦削、神情疲惫的人，几年前他曾寄给我一个具有 15 世纪美术家风格的刻有题词的小漆匣。

下午，午饭后，我开始感到恶心，胃痛。不得不在自己房内度过白天剩余的时光。极大的疲劳向我袭来，而且，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纠缠不休地劝说我与高尔基一起完成沿伏尔加河的旅行，令人厌烦透顶。我只想休息。

季米特洛夫来吃晚饭。我不能下楼去餐厅。但晚饭后，他与妻子和高尔基一起上楼来看我。他长得象演员西尔文（法兰西剧院^[114]的演员），有一张宽阔的脸，一头浓密的长头发。但是，在举止上丝毫没有演员的意味。他说话小声，若有所思，风度谦恭，没有丝毫虚荣的痕迹。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他免不了在德国监狱中遭受许多折磨。我的干预使他摆脱了手铐^[115]，但在此之前的 5 个月时间里，利用一整套能挤压和敲击他的腕骨的螺丝和有许多螺纹的拉杆，他的双手被交叉铐在一

起——根本不能睡觉。照他的说法,最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是得知,不仅托尔格勒,而且还有其他两名年轻保加利亚同志⁽¹¹⁶⁾,都存在性格上的弱点,他们被他的辩护勇气所吓倒,恳求他变得更圆通一点。他确信,在诉讼期间,德国舆论对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戈林感到丢脸。甚至有人说:“如果季米特洛夫和戈倍尔一起领导我们,情况会更好。”但尽管如此,如果没有使政府和法官们感到害怕的欧洲舆论的压力,即使在作出无罪判决之后,要摆脱他们无论如何还得花很大力气。季米特洛夫过高评价了我的干预。

他向我提了使他感到不安的两个问题:曾拯救了他、并且迄今为止对迫害台尔曼⁽¹¹⁷⁾起到妨碍作用的世界舆论正在减弱,令人觉得社会舆论已失去对斗争的兴趣。要使社会舆论对不断增强的法西斯主义浪潮始终保持警惕,应该怎么办?我相当详细地回答了他的这个问题,通过玛莎的翻译(因为季米特洛夫同样不会说法语),对他解释说,斗争领域的各方面都不断地对世界舆论提出要求,世界舆论的疲惫是非常自然的:它的注意力正在分散和转移。从我的观点来看,应该制订统一的斗争战略计划,集中最大力量反对主要敌人。总之,今日法西斯主义的中心是希特勒的德国。如果它被推翻,所有其他的法西斯主义政权将随之垮台。

至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那只有等待它在阿比西尼亚⁽¹¹⁸⁾冒险中自我消灭。在这方面,我从高尔基那儿得知,不久之前布伊·皮科普向我复述的墨索里尼的话,是由扎诺蒂-比安科⁽¹¹⁹⁾转述的:说墨索里尼对自己的一生感到不满意,他的活动成果不等他死去就会消失,只有胜利战争才能确保他实现他所梦想的万古流芳。可是,这种自白(太难以置信)在两年前就可能作

出。我还向季米特洛夫和高尔基解释说,法国和苏联军事同盟的缔结造成社会各界人士人心的慌乱,并引起和平主义者的气愤——这些和平主义者不顾希特勒德国在国内制造的暴行,鼓吹与它建立密切关系。形势很复杂——这是显而易见的。在第二个问题上,我是更大的乐观主义者。说的是使西方知识分子参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的途径。这自然是在爆发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的条件下发生的,对终于出现在法语译本中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了解虽说是迟到了的,但对这项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法国青年不仅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而且将知道,官方的导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系统的、带有阶级性质的扼杀。

下午,玛莎与高尔基进行了有趣的交谈。上午,我收到一封信,是某个不幸的小伙子写来的,他是富农的儿子。由于他的出身,所有大学和工厂的大门都对他关上了。对这种制度的不能容忍必然会使许多无辜的人们感到绝望并死去。玛莎对这种残忍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高尔基感到为难和窘迫。他试图证明把社会出身可疑的人们接纳进集体队伍所具有的危险性。他问:如果需要作出选择,牺牲什么会更好一些?少数还是多数?玛莎说:“假定是少数!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权利对想在德国人口中灭绝犹太人少数的希特勒感到愤怒?”她证明,根据其父母的地位来评价儿童——这种尝试本身是多么虚幻和荒谬。她说,她认识一些共产党员的子女,他们利用自己的出身——实际上,他们是作为共产主义的敌人从自己的出身中捞取好处的。评判每个人应该根据他本人是什么人,而不是根据他父母是什么人。此外,为什么不考虑母亲,而不仅仅是父亲?玛莎以自己为例。她还说,我娶她为妻是为了使她的儿子有机会上大学,如果我不这么做,她的儿子就进不了大学门。这公正

吗,合理吗?她提醒高尔基别忘了他自己的文章,包括那篇他勇敢地站出来为米尔斯基公爵^[120]辩护的文章。玛莎给我翻译过这些文章。高尔基的眼睛中流露出痛苦和恐慌的神色。他不知道,他该说什么。屋内的女人们(家庭女教师,女护士)悄悄地对玛莎的话表示赞同。她们对她说,她说得完全正确,高尔基在内心深处也是这么想的,但他下不了这么说并采取相应行动的决心。在他的别墅内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也是根据那些理由想赶走花园看守人,但高尔基作了干预,他得以保住了看守人。可是,玛莎坚持认为,只是在个别场合采取行动是不够的,必须改变事情的整个制度。高尔基试图敷衍过去,提到了正在制订中的、许诺更大自由的新宪法。但这只是自我安慰的借口。

7月6日 星期六

夜里的部分时间在发热中过去,整个身子软弱无力。莱温医生诊断是轻度流行性感冒。我的继子谢尔盖也感冒了。前来吃早饭的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莱温医生一起对我做了检查。他说,这不是流行性感冒,而是疲劳过度(他是对的,这的确是轻度发烧,但导致发烧的是最近几周的过度劳累)。普列特尼奥夫一边对我的腹腔进行触诊,一边说,只有瑞士的空气才能使我避免切除手术。他完全赞同黑默利医生的意见,并劝说我尽快返回瑞士。普列特尼奥夫对我说:“好在今天的报纸写到了您的疲劳过度。这使我能说出同样的意思。”——这时我开始明白,苏联医生的不得不小心翼翼已到了何种程度。已形成的状况迫使我最终把一天都用于休息,本来连英明的黑默利也规定我每5天为自己安排一次休息,而我已有3周没有执行这种劝告了。一

整天在沙发上或者在床上度过。

利用这段时间,叙述一下生活在这幢房屋里的人们。笼罩在高尔基家中的气氛有点散发出过去时代俄罗斯的气息。一些不声不响的人物在餐桌旁就座——有的来,有的走。中间坐着孩子和保姆。旁边是客人。餐桌头上坐着的是山鲁佐德⁽¹²¹⁾本人——高尔基。担任保姆兼女护士的是一个名叫奥林皮阿达的胖女人,年纪已很大,总是笑嘻嘻的,她在给我打针时,讲述了所有这些不声不响的人物的故事,他们就像是果戈理或屠格涅夫的旧小说中走出来的。拉基茨基⁽¹²²⁾是一个有才能的画家,但早已什么也不画。15年前他对高尔基作为期15天的拜访,从此与高尔基形影不离。无论高尔基去哪儿,他处处都跟在后面。高尔基很宽容,并说:“他是个有趣的人。”这个有趣的人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健康,假想的病痛使他不得安宁,日趋衰弱。无论家中有什么药,高尔基患什么病,或者来了什么客人,他都要求也给他治治。他会在走廊里拦住奥林皮阿达:“你拿的是什么?药?行行好吧!也给我一点!”高尔基的眼睛流眼泪,眼科医师给他开了滴剂和敷布。高尔基不遵守医嘱。拉基茨基就替他完成医生的处方。他一得知我有专门伙食,就立即声称,他也要专门伙食。他就这样对待所有客人,客人们不得不自行限制特别的建议。他羡慕他们。他会用阿朗⁽¹²³⁾先生的所有灌肠器为自己灌肠。他断言,他的腹部有某种病痛。医生什么也没有发现。他继续说有病。奥林皮阿达对他说:“既然这使您如此不安,让他们给您把肚子切开。”给他切开了肚子,什么也没有找到。高尔基说:“应该每天割下他的一小块肉,以便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的注意力。”但是,谁都不会认为他的存在是多余的,或者认为他的为期15天的拜访过于冗长。客人们来来往往,各人

忙各人的事情。这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任何怨言。

我收到了用电报发来的问候,来自“扎波利亚里的白岛的过冬者”,还有来自位于阿尔切夫斯克的伏罗希洛夫军工厂的工人们。给他们发了回电。从苏联各个角落寄来大量信件。许多令人感动的信件出自最普通的人们。有人告诉我:成百上千的人每天围住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接待室,希望能见到我并说上几句。

7月7日 星期日

虽然体温已恢复正常,今天我仍将留在自己房内,因为自我感觉尚不够好,况且天气清凉,因为飓风于星期五和星期六席卷欧洲。又是雨,又是风。

下午,我们的朋友加尔托赫兄妹从列宁格勒来访。我已等了他们整整一周。但是,要买到从列宁格勒到莫斯科的车票,需要提前预订,提前几天。有时不得不等待五六个昼夜。

善良的“保姆”^[124]高兴得浑身发光。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的哥哥奥斯卡尔·加尔托赫^[125],虽然最近两年来他的身体使他的姐妹感到不安,出乎意料的是,他看上去远比我健康。他的健康突然有了明显改善。起作用的是神经系统的状况:最近几个月来他的官方地位已大大得到巩固;威胁列宁格勒的恐怖气氛(在暗杀基洛夫之后)已烟消云散;监察委员会邀请被放逐的人们返回该市。但好几个月是在可怕的神紧张状态中过去的。没有人被捕。但随时会有立即迁往遥远地方的命令,既无生存手段,也无交通工具。当我们去年在维勒讷沃见到“保姆”时,这也引起了她的忧虑和愤慨。她像是吓破了胆的动物。她说,每

天都有某个熟悉的家庭消失(她夸大了这一点)。我的出版者布洛克^[126] (“时代”出版社的)于2月被捕,被流放到中亚一个小村庄,在那儿他应该教授图画课。除了他的贵族出身,没有任何流放的借口(他是军官的儿子)。他非常悲伤,期望我能干预(我也这么做了)。但今天“保姆”看上去较为心平气和信任他人。从我们最近一次见面以来,她变得年轻了。

今天原定与一个人数众多的作家代表团交谈,他们希望会见并问候我。由于我的小病,一切都推迟到7月9日。但一群来自列宁格勒的作家很难等下去或者再来一次,所以,在与高尔基共进晚餐后,我邀请他们来我这儿呆上半小时。我在他们之中见到了康斯坦丁·费定^[127],几年前他到维勒讷沃拜访过我。其他人有:苏联最著名的儿童作家马尔夏克^[128];他的弟弟、被广泛阅读的通俗读物作者伊利英^[129];诗人普罗科菲耶夫^[130],一个外表看来粗鲁的、没有教养的人;面带伏尔泰式笑容的特尼扬诺夫^[131],他是所有人中最文雅的——在他的小说中,笼罩着普希金和百科全书派^[132]时代的气氛。高尔基与他们一同上来。谈话是十分友好的。除了费定和能说几句法语的马尔夏克兄弟俩,再也没有人懂法语。玛莎进行翻译。马尔夏克向我描述了打算开办的儿童大学以及社会培养小诗人和小画家的方法。费定说到一个不大的作家团体,他们与木偶剧团一起住在一幢洛可可式^[133]别墅内,为该剧团写剧本。谈话转到斯特凡·茨韦格^[134],他们对他的评价不很高,在提到他的名字时,高尔基讥讽地笑了起来。他们认为,他的作品处于业余爱好的边缘,并指责他在自己的传记作品中,利用前辈的著作而不提及他们的名字。但这些年轻人甚至不能理解,茨韦格在战争初期受到维尔哈伦^[135]的态度刺激时的精神状态^[136]。个人的精神痛苦,

个人的意识问题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不存在的。临走时，马尔夏克和他的弟弟把我的手握得如此之紧，似乎想挤碎它。他们说，这次会见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大事。

离开我的房间后，普罗科菲耶夫向高尔基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根据玛莎的说法，大家都异常高兴。这太好了！来自极北地带的粗野农民从大地最深处汲取了丰富多彩的形象。他是天才，在他身上，有某种来自帕斯捷尔纳克的东西，但同时也存在强大的农村力量。高尔基表示赞赏。普罗科菲耶夫对玛莎说，我的战斗文章集《保卫新世界》⁽¹³⁷⁾使他非常激动：他和妻子每天夜里都读它，并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一想到有幸与我的书籍的作者交谈，他就不能平静。玛莎和费定谈论发生在出版者布洛克身上的事情，谈到了他的被捕。而且，所有的人都感到忧伤，因为大家都喜欢布洛克，并已经采取了一些保护他的步骤。他们痛苦和气愤地谈到基洛夫被谋杀后，在列宁格勒肆虐一时的“行政强制迁出”。一开始来的是莫斯科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它的行动是有节制的。接着，它被明斯克的国家政治保安局取代了，后者显示出对地方和人的一无所知，粗暴和放肆地采取行动：旧的嫌疑者名单被找了出来，并立即开始了放肆的强制迁移。布洛克被放逐到乌兹别克的无人过问的角落，被放逐到农村，在那儿他无事可干，没有人需要他。他在绝望中恳求，让某个类似撒马尔罕的城市作为放逐地点，在那儿他能有所用处。作家们保护他的申诉不久前已被监察委员会驳回，但作家们已被要求再尝试一次。还提到了商人及其他被推翻阶级子女的问题，他们的出身使他们挺不起身。费定和他的同志们与玛莎一样，艰难地经受了这种不公正，他们希望纠正这种不公正。很高兴得知，苏联知识界的共产主义杰出人物关心现有制度的人道

化问题。

“保姆”谈到与“行政强制迁出”有关的情况：“哪怕是建造一些集中营，简易住房，让有嫌疑的人住在那儿，等待更全面地审查他们的案件。”但就让他们呆在露天，没有生活设施。而且，许许多多儿童死于亚洲的沙暴（也许，这是言过其实）。这种强制迁移有部分经过几个月又被取消，但已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亡（也许，这是言过其词，死亡人数更少一些，但这种措施的残忍是无法辩解的）。

俄罗斯习俗：半夜过后，在作家们离开以后，在下着雨的寒冷夜晚，伊格纳季耶夫（两天前患过腰肌痛）、克留奇科夫和客人们前往莫斯科河洗澡，夜里3点左右才回来。

7月8日 星期一

“保姆”将留到明天晚上。天气变冷了。在我们那儿，到9月底才有这种天气。这儿最有特点的是变幻莫测的天空。

与高尔基共进早餐。他说，俄国农民在电话和电灯面前显示出迷信的恐惧。当他们在农村中添置留声机时，老头们请求机械师：“喂，让他出来！”“他是谁？”“魔鬼！”“可这里没有任何魔鬼！”“他在那儿，在里面。”机灵的机械师放上录有宗教赞歌的唱片。既然为上帝唱颂歌，这就不可能是魔鬼。一个老头默默地站了起来，走回家，请求妻子：“替我准备死时穿的衬衣！”他躺在床上，不再动弹，8天后死了。当第一辆电车在下诺夫哥罗德（高尔基的家乡）开动时，一个男子对自己画了十字，喊道：“喂，压死我吧！”接着，他扑向轮子下面。自然，电车停了下来。人群得出结论，十字战胜了魔鬼。一个贵族出身（公爵）的僧侣因为

自己的宗教团体而被判处终身监禁在冰冷的地下室。在第22年,他被恩准在囚室内放置一台取暖用的炉子。他差点没有发疯,成了拜火教徒。走出监狱,他看到了房屋里面的电灯。他喊道:“你们怎么敢把它关在那里面?立即放它出来!……”

下午5点,一个由20或30名苏联音乐家组成的代表团前来问候我。其中有:Ю.沙波林^[138],涅高兹^[139]教授,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А.Б.戈登魏泽尔^[140],托尔斯泰的老朋友、音乐学家伊凡诺夫-博列茨基^[141],优秀土库曼歌曲集的作者А.扎塔耶维奇^[142],作曲家Д.Б.卡巴列夫斯基^[143]、С.Е.法因贝格^[144]、В.А.别雷^[145]、А.М.韦普里克^[146]、汉斯·艾斯勒^[147]、F.萨博^[148]、В.С.舍赫特^[149]、В.Я.谢巴林^[150]、В.Н.柯切托夫^[151]、А.С.奥戈列韦茨^[152]、А.И.恰恰图良^[153]、Л.К.克尼佩尔^[154]、М.Л.斯塔罗卡多姆斯基^[155]等人。拜访由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组织(由副主席С.И.波希顿诺夫组织)。与他们同来的有伟大的建筑师、玛莎的老朋友В.А.韦斯宁^[156]及其妻子、妹妹。他给我看了自己的已建成或已设计完成的主要建筑的照片。依我看,最出色的是计划在红场上(列宁墓对面)建造的劳动宫,它的微小的不足之处是,可能破坏整个克里姆林宫给人的印象^[157]!与他们一起来的还有雕塑家Б.Д.科罗廖夫^[158]和В.Г.布拉金。科罗廖夫在会见时画了几幅速写,布拉金不久前完成了根据我的《哥拉·布勒尼翁》改变的、由卡巴列夫斯基作曲的(相当古怪的)歌剧剧本。涅高兹非常精湛地演奏了萧斯塔科维奇的几首序曲和梅特纳^[159]的《悲伤进行曲》。卡巴列夫斯基和别雷一起演奏了卡巴列夫斯基的最新的交响曲的第二部分。舍赫特演奏了自己的《土库曼组曲》的第二部分和自己的歌剧《1905年》的片段。柯切托夫演奏了由他创作的芭蕾舞剧《蒂

尔·乌伦施皮格尔》的两个片段。法因贝格演奏了自己的奏鸣曲的柔板。韦普里克演奏了关于科托夫斯基^[160]的歌曲。别雷演奏了《青年女游击队员玛鲁茜·邦达连科之歌》。克尼佩尔演奏了歌曲《田野啊,田野》。没有特别独创的东西。少数几首曲子有时是迷人的,带有古典文化的风格。但许多曲子更接近昨日法国和德国文化的风格,而不是俄罗斯风格,更不是今日的俄罗斯风格。那些利用俄罗斯或亚洲民间题材的人,在这么做时缺乏能革新或丰富这些题材的想象力。诚然,在年轻一代中,有两位出众的作曲家:一个——萧斯塔科维奇——没有来(涅高兹演奏的他的序曲是我在这儿听到的最优秀的作品——这是无调性的肖邦与理夏德·施特劳斯的混合物),第二个——沙波林——什么也没有带来,而且原来是一个蹩脚的演奏者。我很想认识创作钢琴曲的优秀作曲家尼古拉·梅特纳,人们怀着敬意对我谈起他,而他以古典风格创作的《悲伤进行曲》在涅高兹的演奏中听起来极为出色。他没有成为移民,据说目前住在离巴黎不远的地方,或者住在英国。戈登魏泽尔说,托尔斯泰曾使人相信,对他来说灵感的源泉似乎是肖邦。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给我送来一大包现代音乐唱片。

为了休息,在自己房内吃晚饭。但是,晚饭后下楼去看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改编的影片《大雷雨》。出色的类型演员。不过,在为我放映的那些影片中,除了极少的瞬间,显然没有一部包含根本有别于西方电影作品的东西。直到今天为止,给我留下新鲜印象的只有影片《亚洲风暴》。

在《大雷雨》中,复现了旧俄罗斯的令人窒息的气氛。我以为,这种影片同样是为宣传服务的,能消除对过去的一切惋惜。

7月9日 星期二

清凉而阴晦的天气，太阳有时露一下脸。快到喝茶时，来了远东红军骑兵的军长埃德曼。曾有两次传来他被打死的消息，一次是被日本人枪杀。看来，现在他也成了作家。很强壮有力、个子很高的年轻人，谈话时非常兴奋。也许，他在意大利与高尔基见过而，所以现在十分坦率地与他谈论墨索里尼。

晚上5点，90名作家——莫斯科的代表团搭乘三四辆汽车前来。特列季亚科夫把他们介绍给我。特列季亚科夫年轻，高个，秃顶，快活，非常讨人喜欢和文雅。来客中有：杰米扬·别德内^[161]，伊利亚·谢尔文斯基^[162]，泽林斯基^[163]，玛丽埃塔·沙吉尼扬^[164]，利季娅·谢芙琳娜^[165]，米尔斯基伯爵，卡西尔^[166]，阿尼西莫夫^[167]，巴甫连科^[168]，别济缅斯基^[169]，尼库林^[170]，利金^[171]，安托科尔斯基^[172]，斯克洛……科^[173]，曾作为水手在黑海上航行的诺维科夫—普里波伊^[174]，工厂工人诗人、红军诗人、亚美尼亚诗人恰连茨^[175]，许多著名剧作家，阿罗谢夫，德国剧院院长皮斯卡托尔^[176]，由我帮助他来到苏联的匈牙利作家斯特凡·普里亚塞尔·埃尔温·申科^[177]，美国共产党员评论家费希尔，意大利侨民共产党员的代表杰尔马内托^[178]，非常感谢我为他所做的小事的代表，乔治·萨杜尔^[179]，以及其他许多人。

要经得住这样的猛攻可不那么轻松。年轻、可爱、几乎全聋的玛丽埃塔·沙吉尼扬用法语向我宣读祝词，可我什么也没有听懂，我也没有把握，她自己是否明白什么（主要说的是时间、光阴飞驰、光阴冗长等）。乌克兰诗人用本民族语言发言，没完没了，我推测，他的发言是赞扬他的地区，并激怒了所有在场的人。许

多诗人朗诵了自己的作品——谢尔文斯基、安托科尔斯基等。我依次与每个人交谈，包括：与米尔斯基，我称赞地提到他的有关列宁的书，他对我说，要是现在，他不会写它，他已进步了；与利季娅·谢芙琳娜，她非常矮小，就像一只青蛙（但无论如何不能轻视她的很大才华）；与卡西尔，他像刀刃一样瘦削，怀着令人感动的热情对我说，明天他将满 30 岁，在他的一生中，有两个美好的日子——与 1905 年的革命同一天的他的生日，以及 30 岁前夜与我会见的日子。阿尼西莫夫目前正在写一本有关我的书，他重申了我已经听说过的事：出现在农民家中的不仅有《哥拉》和《约翰·克利斯朵夫》，而且还有《母与子》，农民甚至理解和喜爱（这种情形连他都感到惊奇）我的最后一部小说（我想，所说的是《母与子》的最后两卷），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

7 点左右，克留奇科夫得以打发走这一群人。他说，在我离开后，将受到普遍的憎恨。（我感到奇怪的是，像高尔基这样慷慨好客的主人，竟没有送上小吃，甚至连一杯水也不给自己的 90 名同行，他们为了与我见上一面，赶了 50 公里的路。这是长餐桌空空如也的唯一场合。至今我都在问自己，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

我已说过，高尔基吃得极少。难于理解，他吃这么一点怎么够。他说，向来是这样：甚至在年轻时，在伏尔加河上当装卸工而工人们强使他吃许多肉和面包时，他总是拒绝。现在，起重机取代了背上扛着两袋面粉、弓着腰奔跑的装卸工，而高尔基说，这毫无趣味。他惋惜流逝的时光，惋惜劳动时歌唱的美好歌曲。

有趣的故事通常总是源源不绝，可惜的是，通过翻译，我只能听懂一鳞半爪。在下诺夫哥罗德，一个富裕的女市侩，是个长着棕红色头发的漂亮女人，有一次听说，有个喝醉了酒的商人声

称,只要看到裸体的她,就支付3万卢布,于是约定与他会面,建议他从锁孔中看她。一个公爵(高尔基的熟人)有一次在午饭后出门几小时,但过了一年才回来。他承认,在闲逛时看到一个漂亮女人,便跟在她后面。由于她是土耳其大使的妻子,他便跟着她起初到了巴黎,接着到了伊斯坦布尔,在那儿她回到了自己的闺阁。他决定也往那儿钻,却被关进了监狱,如果不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能求助于本国的大使,他将死在狱中,谁也不会知道他出了什么事。在下诺夫哥罗德,有古老的集市和游艺会。商人们往往丧失理智。有个商人在夜间狂饮时送给一个美女一艘满载鱼干的船。第二天早上,他明白了自己的礼物送得不妥,向美女提议用3千卢布换回船。但是,美女已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要求得到3万5千卢布。在高尔基漂泊的时代,有个朋友是从感化营逃跑的士兵,一度曾在教堂内唱歌。他知道许多敬神的赞美歌,有时会不知不觉地唱起来,接着突然意外地停住,吐出一连串咒骂。有一次,他想挺直身子躺到青草地上,便脸朝下直挺挺地倒了下去。高尔基说,平生只有一次看到,一个人不是躬身倒下,而且立即像弹簧一样一跃跳了起来——他倒下时脸朝着一个蛇洞,洞内有一窝整整12条蛇……

7月10日 星期三

阴晦而冰凉的天气。3次灌洗。我与已故的路易八世展开了竞争。极度疲乏。一天的活动极其丰富多采。

早晨,画家基布里克^[180]出示了自己为《哥拉·布勒尼翁》的大型插图本所作的构图。从审美观点来看,这些构图是粗糙的,但很有趣,可以看出很大的才能。基布里克将在戈尔基停留一整

天,完成画像草稿(一个月前,这个年轻健壮的人发作腰肌痛和足痛风,引起下肢暂时瘫痪。现在他康复了,但担心再次躺倒)。与他同来的是国家出版社“文艺书籍出版社”社长纳科里亚科夫^[181]——一个长着结实的胖脸的西伯利亚人。他给我带来了我自己的图书出版帐目:我的出版物的利润是多少钱,扣除给莫斯科大学的多少钱(3万至4万卢布),现在我的名下存有多少钱,今年和以后将出版我的那些作品。计划的发行量非常大。当他得知我正在准备一册文学随笔时,他催促我说:在苏联,现在时兴的与其说是政治作品,不如说是文学作品(时代的标志)。在高尔基的餐桌上,与基布里克和纳科里亚科夫共进早餐。

4点30分,来了几个找高尔基和找我的代表团:大约40名共同进餐者在已准备好喝茶的长餐桌旁入座。一个是最勇敢的年轻女跳伞员的代表团。一个是妇女代表团——地铁建设工人。一个是共青团(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团。还有一小群来自亚美尼亚、路过莫斯科的少先队员——男孩和女孩。女跳伞员中有一个身材矮小的胖姑娘,她的举止带有几分稚气,身体敦实,但骨头纤细,应高尔基的要求,她十分自信地讲述了自己对跳伞的印象。起初在地面上训练。空气的稀薄度是逐渐增加的:在6千米高度,智力便遭到破坏,你会忘记如何书写字母。医生警告说:超过6千米的高度是有害的。但她们上升得更高,越来越高。从7千米以上的高度往下跳。“就像豌豆粒。”12个人一起跳。为了在必要时提供帮助,有一架飞机伴随她们,有人从飞机上喊:“你们活着吗?如果活着,挥一下手!”我们问:“就是说,跳伞时能够说话?”她答道:“跳伞时我们经常彼此交谈。”有时,在乳白色的雾中,白色的降落伞伞顶变得看不见,这时飞机就失去了她们。有时,她们掉入气流中,气流把她们带到遥远

的地方,她们就不可能完成跳伞。如果她们处在危险情况下,便从飞机上扔下一个跳伞员帮助她们。“就像所保证的那样,”她补充说。接着,她像傲气冲天的小母鸡那样夸口说,有一次,她们中的一个掉在森林里,从飞机上扔下一个男跳伞员救助她,但她不用他帮助就摆脱了困境,接着又把他救了。她指出发生这个故事的那个女跳伞员——一个漂亮姑娘,长着一双善良的、含笑的眼睛,她红了脸。强烈的阵风常把女跳伞员抛向地面,她可能撞击并受伤。她们中有一人曾折断双腿,躺了整整一年后才恢复跳伞。她也被指给我们。“我们不是职业跳伞员,”姑娘说。“比如,我在工厂工作。如果我们受到进攻,为了保卫国家,我们什么都干。”她说到这上千个在需要时从天而降的活炮弹的毁灭性力量。接着,她说到农村中的老人如何害怕她们。在图拉,一个农民老太看到她后喊道:“你是谁?是鬼吗?”“不,是人。”“是和我们一样的?喂,让我摸一下。”“老大娘,要摸就摸吧。”她走到跟前:“不,我害怕。你还会咬人。”又来了四五人,这时他们便一起摸她。“是的,真想不到,与我们一样。”

高尔基异常高兴。他希望她们把所说的东西都记下来。

接着,地铁建设工人中的一个瘦小妇女以同样勇敢的态度、话语和目光(她们所有的人看人的方式都非常好——一直盯住眼睛!)愉快而自豪地谈到沉重的工作,谈到在地下遇到的地下水,谈到勉强说服领导(不想接收她们参加工作的领导)的柔弱妇女们的危险和冷静。

她们看不起英美工程师,后者不相信她们能完成任务和操纵机器——她们不仅学会了操纵机器,而且学会了制造机器。她们说,她们在工作中受到经常在场的领导的支持,卡冈诺维奇日夜与她们一起在狭隘的通道里爬,用各种建议鼓励她们。与

女跳伞员的故事一样，这一切都以一段不可或缺的献给斯大林及其“伟大的同志们”的台词告终，而这绝不是有趣的，因为就像执行官方命令……

可是，由于说话人显得热情洋溢，十分陶醉，不能确定，在这种赞扬中，哪些出自天真的感情，而哪些出自命令。也许，对她们来说，这是她们自愿信奉的礼仪，因为这么做已习以为常，这么做是理所应当的。不过，别忘了鼓舞这些坚毅顽强的妇女与她们的同志——男人们一起竞争的感情！女地铁建设者们果断地认为，她们用自己的存在教育男人，教他们良好的举止，迫使男人注意她们的说话。我看到，共青团领导人中有几个皱着眉发出冷笑，眼珠生气地乱转。

还有几个妇女叙述了自己的感受。共青团员的首脑^[182]也作了简短发言，发言以对苏联的赞扬、对高尔基和我的祝贺的套话结束。应该指出，他们在谈论自己的工作 and 个人的成绩时，是非常谦虚的，往往过低评价自己。

作家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183]和妻子出于偶然也在场。他刚出席了巴黎的国际作家会议回来，讲述了这次会议。

最后，来自亚美尼亚的男女少先队员天真地叙述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缺点和改正缺点的努力。这一切以亚美尼亚歌舞告终，两三个身穿民族服装——彩色灯笼裤和红色短上衣——的小姑娘舞姿出众，优美而充满激情。自然，在这以后我们一起在花园中照了像。高尔基在回答少先队员们的问题时说，他很高兴看到自己周围有准备与敌人斗争的如此热情的青年。他说：“应该消灭敌人，因为他们是恶棍。”（这种粗鲁的举动使他失去了惯常的安然态度，他皱起眉头，并敲着拳头。）

晚上，晚饭以后（我在自己房内吃晚饭），我观看了几部纪录

影片：6月30日的庆祝游行，我在影片中看到，自己边走边与大家一起鼓掌欢呼；征服荒无人烟的亚洲和原始森林；塔吉克斯坦；由犹太移民改变面貌的比罗比詹⁽¹⁸⁴⁾。从收音机中听了根据我的《哥拉·布勒尼翁》改变的戏剧的开头几场，瓦季姆·科切托夫作的曲，演员非常出色。听不出自己在向苏联听众致敬时的声音。

接着，与昔日令人恐惧的国家政治保安局首脑亚戈达交谈，现在他是内务人民委员。谈话是认真的，涉及维克托·塞尔日、加尔托赫博士和“时代”出版社社长布洛克。加尔托赫的案件很快就终止了：他已彻底恢复名誉（他陷人杀死大量马匹的细菌学家案件，但很快就证明他没有参与，现在已恢复对他的全部信任）。至于布洛克，亚戈达看来赞同我的意见，并许诺在最短时间内把他安置到撒马尔罕。但是，当说到维克托·塞尔日（基巴利契奇）时，我听到了极度鄙视的看法：认为他是冒险家、流氓、撒谎者，对他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神圣的。可是，仍有各种各样的人为他说情，这些说情如此令人厌烦，以致他们看来已准备放他走，尽管一旦到了国外，他能够或者企图为苏联制造不快。对他的评价不太高，不会对此感到不安。应该相信谁？是相信使塞尔日成为伟大蒙难者的正直的雅克·梅尼尔⁽¹⁸⁵⁾和马德伦·马克斯⁽¹⁸⁶⁾？还是相信那些我在这儿与之交谈的、鄙视他的人？“可怕的”亚戈达有一张清秀的脸，看上去他很疲倦，但非常文雅，还算是年轻人，尽管十分稀少的头发已经发白（他使我想起莫鲁瓦⁽¹⁸⁷⁾，但更文雅）。深棕色的制服非常合他的身；他说话平和，总的说来整个人都是和善的化身。他对苏联法学缺乏报复思想感到气愤，并谈到他本人所显示的对囚犯卫生的关心。他还谈到莫斯科附近的集中营，那儿关押着20万(!)囚犯，但没

有一个病例记录在案。可是,看来他认为,从列宁格勒驱逐人是合乎情理的。他只是补充说,如果发现错误,被驱逐者就能返回原地:他并不重视人们在弄清详情时所经受的痛苦,以及比痛苦更甚的情感。当我问,为什么在审查时不把被驱逐者安置在列宁格勒附近时,他不表示赞同,说,他们不能拘捕被驱逐者,被驱逐者是自由的(即能够自由地生活在指定地点)——这被说成是很大的仁慈:将人驱逐,同时微妙地对保护他们的人的尊严表示关心。亚戈达说,与塞尔日属于同一类型的被驱逐者必定会有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设施的保障。在驱逐期满后(对塞尔日来说是3年),他们有权在苏联各地自由迁移,除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他们可以去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但不能在那儿生活。亚戈达答应给我一份有关塞尔日从被捕时起如何生活和从事什么的正式报告。他又重复说:“他是冒险家。”高尔基回忆起伊斯特拉蒂案件,回忆起由塞尔日授意、甚至由塞尔日以伊斯特拉蒂的名义写的书。亚戈达说,他对这个案件知道得一清二楚,但这个案件不是逮捕塞尔日的原因。当塞尔日第一次被拘捕时,他表示不承认托洛茨基党,并郑重宣布,不再与这个党有任何关系。但是,后来他因参与托洛茨基阴谋而被捕。

我再说一次:应该相信谁?亚戈达使人发生好感。不想怀疑他所肯定的东西。但当他宣布,苏联已取消书信检查,甚至白党的信件也能自由来往时(他委婉地叹息说,制度太自由),你就会对自己提出问题:他是真的不知道在他的部内发生的事情,还是认为我们是天真的、缺心眼的人*。就好像我们不知道,寄给

* 亚戈达的断言与有时说漏嘴的其他高级领导人的说法相矛盾。例如,不谨慎和易冲动的阿罗谢夫不知怎么对我说:“在苏联,所有信件都是公开的。”

我们和我们的朋友的信件暗中受到检查,收到时已被拆开,信封上粗暴而无耻地盖着“从信箱取出时已破损,信封粘得不牢!”的印记(我想,富歇^[188]的警察也会做得更周密一些:在把信纸放回信封内时,应该别把它们搞浑了,要知道,有一次我们就遇到了这样的错误……)。可是,即使你知道这一切,看着亚戈达正直而温和的眼睛,你也会因为自己的怀疑而感到罪过。

是否正在出现无产阶级贵族?有些人获得“知名的”封号,在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整个家庭都获得这种封号。例如,我收到北高加索亚速地区世界十月革命集体农庄“知名的舒利金家庭”的问候(无疑是顿河哥萨克)。

7月11日 星期四

白天在莫斯科度过。11点30分乘汽车出发(离莫斯科50公里)。在高尔基的市内住所吃早饭。我说,这所房子从前属于一个富有的商人。内部装饰古怪:粉红和淡黄色的大理石楼梯做成海洋巨浪形状,高高的浪尖上是充当灯架的金属章鱼^[189]!高尔基与这些装饰不很协调。很清楚,他为何憎恶它们。不过,在柜子的玻璃后面,陈列着他所收集的无数珍贵的象牙和石头的中国小雕像。

下午在商店。商店不能说是华丽的,样子非常单调,不过里面也出售令人感兴趣的农民艺术样品。

接着,我徒劳无益地试图会见法国大使阿尔方,但他既不在大使馆,也不在自己家中,或者至少他们对我说,他不在。也许,我们在路上错过了,因为他事先已得知我的拜访。可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这个笨蛋在生我的气。官方人士被我在没有他

们参与的情况下在莫斯科扮演的角色刺痛了……

然后参观“文化和休息”公园——而这是访问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不久前——7年前——开放的人民的布洛涅林苑^[190]位于莫斯科河岸的水泛草地上，这片草地曾把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及其宠臣奥尔洛夫的古老花园连在一起。辽阔的地域，非常美丽的花园、树林和小丘，花园内鲜花盛开。公园主任和公园主题思想的策划者是一个姓格兰的29岁年轻知识妇女，我享受特别优待，在她的陪同下乘汽车游览了这些地方。午饭后天气立即变坏了，下起了雨，道路泥泞。但4点时天空转晴了，透过薄薄的云层露出了太阳，天气变得非常好。在我们经过的路上，集合了許多人，向我们鼓掌欢迎。我走下汽车，准备参观儿童区（公园的园地之一，为了使我避免发言，格兰建议参观这个地方，因为这儿成人较少），这时，我差点被人群挤死，因为所有的人都想看我一眼，用手摸一下。一些好心肠的人试图保护我，在周围站成一排。大家喊着：“我们的朋友，我们最好的朋友罗曼·罗兰！”这儿有许多游乐设施，还有供酷爱飞机、汽车和机械构件的儿童使用的各种工场。这样孩子们就能开发自己的天赋，检验自己的能力。心理技术实验室^[191]帮助儿童们确定自己的能力，并监督他们在作出选择时不出差错。无论我们走进哪儿，在每个工场内，儿童和成人都喊叫着欢迎我们，拍着手，送给我们鲜花、画册以及他们制作的飞机和汽车的模型。一个小姑娘给我在脖子上系上带证章的少先队领巾：这意味着我成了光荣的少先队员。街上跳着舞，一个小型儿童乐队在演奏，唱着合唱。往前不多远，人们围住一群身穿化装衣服、正在表演假面喜剧的面具节目的人，这是昔日滑稽草台班子的节目；演奏着乐器（吉他，键盘手风琴），一头由人装扮的巨熊摇摆着两条腿正在大发

雷霆、他走到我们的汽车窗前对我表示欢迎。再往前走,在稍微靠边一点的地方,在叶卡捷琳娜花园(快活花园)的多树林的小丘上,座落着工程师区,工程师们到这儿来休息一整天。他们中的许多人就在这儿下象棋(在苏联人们酷爱象棋)。在公园内,划出了一整块区域供棋手使用。属于娱乐的还有公园人口处的跳伞塔。我看到,一些人不顾任何危险地第一次从不大的塔顶往下跳。露天剧场有两三千个座位,不久前那儿上演过《卡门》,剧中有三四十个骑着马的斗牛士。美丽的水库使人想起布洛涅林苑的湖泊。因此,这儿有各种娱乐的机会。而公园仍在不断发展。一年前来过这儿的人现在已不认得它了。不过,这也是今日莫斯科的特点。它处在不断的沸腾之中。房屋不断被拆除。房屋不断建起来。在我逗留的第九天,我发现,高尔基所居住的街道被彻底拆毁了:在我第一次到达高尔基家中的那一天,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儿将进行目前正在进行的工作。

将近7点时我回到了戈尔基。天气非常好。在长长的林荫道上,阳光透过树枝照射下来。

我独自吃晚饭。然后下楼一小时,观看影片《关于列宁的三支歌》⁽¹⁹²⁾:影片拍得不好,但包含有趣的、令人激动的历史文献。

7月12日 星期五

午饭前的半天在美丽的花园中度过。暴风雨已从两个方向逼近。强风使树林发出呼啸声,但在花园内你觉察不到这一点。刺鼻的天芥菜气味。在直通河中的木梯附近,我的继子谢尔盖在洗澡;他的年轻妻子丹娘在小船上荡桨。

在餐桌上,高尔基讲述了由于未登记的婚姻而在美国遭受的灾难。在纽约,散步后回到旅馆,他发现,他的东西被从房间里扔到一楼,他的妻子站在杂乱的外衣和内衣中间,手表被窃。所有旅馆的门都不对他们开放。在街上,他坐在自己的手提箱上,四周围着一大群记者。这些记者都是善良的青年人。他有时在这个人那儿过夜,有时在另一个人那儿过夜。就这样坚持了8个月。报界猛烈抨击他,要求政府驱逐他。最凶狠的叫嚷者之一在列举离开美国后对美国作出不好评价的外国人时,提到了狄更斯和其他人,并补充说:“而这一个比所有人还坏。他还没有离开这儿,就对我国作出了不好的评价!”后来,由于警方自己承认才知道,整个运动是应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要求才组织的。高尔基认识了马克·吐温,并自豪地讲述这件事。后来他得知(是猜到的),马克·吐温在家中不幸福,他受到妻子和女儿的恐吓,她们检查他写的一切东西。高尔基并不特别敬重地说到厄普顿·辛克莱^[193],高尔基所认识的德布兹^[194]对辛克莱的指责非常严厉。高尔基承认,战前曾听任自己被拉入臭名远扬的“国际同盟”(它的使命非常自命不凡,因为“同盟”以世界的道德指导者自居),创立“同盟”的是辛克莱、F·范·德章^[195]以及“你们的忠实仆人”——他表示悔过地捶着自己的胸口补充说。

他认识了马萨里克^[196],马萨里克曾到索伦托和卡普里岛拜访他,从他那儿拿了一些有关俄罗斯的书籍。高尔基对他的看法几乎与我一样:一个认为现成思想优于经验并无论如何也要使文学从属于现成思想的教授(例如,他对俄国作家的分类是错误的,特别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看法丝毫不符合事情的实际状况),不过,他是一个善良的、十分可敬的人。

高尔基保存着对南森^[197]的热烈而温情的回忆。在饥饿年

代,南森曾到皇村⁽¹⁹⁸⁾看望他(如果没有记错),当时他生着病,感到灰心丧气。南森是在严寒中到达的,虽然长途跋涉,却没有穿大衣。他把大衣给了女旅伴。高尔基肯定了我对南森的印象:“他是海盗。”

下午4点,鱼贯而来的汽车送来了150名来自博尔舍夫某个公社(或者两个改造公社)的男孩和女孩。这些都是“获得新生”的罪犯,主要是小偷。副社长是一个50岁左右、留着棕红色胡须的人,他宣布,他们将举行音乐会。他本人从前也是国际匪帮的成员,这个匪帮由撬窃保险箱的最危险罪犯组成。以一定的贿赂为代价,他怀着这种目的在欧洲各地活动。匪帮的11名成员被枪决了。他也被判处死刑,但某个苏联上层官员、亚戈达的朋友的说情救了他的命(在场的亚戈达亲自讲述了这个故事)。乐队领导人是前伪币制造者恰加达耶夫公爵。他们为我们举行音乐会。在第一排,在我的旁边,坐着高尔基和亚戈达。由巴拉莱卡琴、吉他和低音提琴组成的乐队令人陶醉。它以惊人地丰富的音响成功地演奏了一些简短的交响乐片断。乐手们相互配合得极好,渐强的段落和渐弱的乐节演奏得尤其出色。男声和女声合唱不那么好,嗓子有点尖锐刺耳。他们改编了一些完全不适合于合唱的曲子:例如,《塞维利亚理发匠》中的诽谤咏叹调!但舞蹈却是技艺高超的杰作。狂热的激情到最终达到真正狂暴的程度,每个加入圆圈跳舞的人都增添一分疯狂的剽悍劲头,用双手和双脚跳出特别的花样。一个以前的保险箱撬窃者也作了表演,他在跳急速旋转的舞姿时连气都喘不过来(我看到,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接着他用双手捂住胸口)。乌克兰和高加索的舞蹈。哑剧表演浅薄地模仿恋人的表白爱情,随后是芬兰舞蹈。观众们拍着手掌,用喊叫鼓励跳舞者。我听到亚戈

达在喊：“戈帕克舞！”（真正的舞蹈病，双手拨动巴拉莱卡琴，双脚敲着地板。经常响起狂热的震音。不能相信，这不会对演员和观众产生神经质的、几乎是歇斯底里的影响。）

这种场面使我产生十分矛盾的印象。这在法国似乎就是R·德弗莱尔^[199]式的轻歌剧演出：被囚禁的男女跳跃，歌唱，向警察首脑献殷勤，而后者喊叫：“乌拉！”（品行端正的资产者会对强制性的集市庆祝活动感到气愤。）可是，在这儿尺度不同。所有在场者的兴高采烈的热情劲头是显而易见的。

音乐会结束以后，他们仍为了自得其乐而长久地继续唱着歌。非常令人不耐烦。俄国人不懂得分寸感——“分寸第一”^[200]。他们总是不知足。接着，与曾是伪币制造者的乐队指挥交谈了一会，他读过我的书；小伙子和姑娘们的脑袋团团围着我（所有的人都是18至20岁），许多人都长着上绞刑架者的脸，但神情幸福，求知欲旺盛，用友好的目光看着我。

晚上，晚饭以后（我独自吃晚饭），亚戈达上楼来到我的房间，回答我的有关维克托·塞尔日案件的问题——白天我刚好收到雅克·梅尼尔有关这个问题的来信。他在沙发上我的旁边坐下，让我读一份白天收到的奥伦堡机关的来电。电报叙述了从1933年夏天塞尔日到达奥伦堡时起的所有情况。从电报中得出结论：塞尔日拒绝了向他建议在计划委员会的工作，而且似乎声称，不想为苏维埃国家工作。此后很快向他推荐教师工作，他似乎又拒绝了。这一年的五、六月份，他收到来自国外的一笔钱（一些法国朋友所募集），超过1200金法郎——数目之大足以使他往后能不再工作。现在他手头还有700多金法郎。亚戈达坚决否认，塞尔日的儿子由于自己的出身可能在学校中成为凌辱的对象。至于他在去年寄给我的法文小说手稿，亚戈达在莫

斯科进行的这方面的寻找毫无结果。也许,奥伦堡的机关扣留了手稿。亚戈达已下令把手稿从奥伦堡寄来,只要它保存在那儿。从他的话来看,他甚至将要求塞尔日重新把手稿寄给我。至于塞尔日本人,亚戈达则允诺,将在人民委员会讨论一下他的事,以便知道,是否打算将他驱逐出苏联。显然,一旦获得自由,他将在巴黎成为吸引反苏力量的中心,因为他是一个凶恶的、怀有深刻敌意的人。可是,也许3个月一过,在巴黎人们也会对他感到不耐烦;他必定会与所有的人争吵,而这在法国也将给他的威信带来打击。既然连托洛茨基都不能在国外获得影响,塞尔日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他的智力作用和文学作用被(不必要地)过高评价了。

接着,亚戈达开始叙述自己在改造罪犯领域的活动,他的眼睛发出火一般的光亮。令人纳闷的个性:温和的举止、声音、目光……如何解释这些内在的反差?不懂得怜悯的国家政治保安局的首脑,同时又充满仁慈和对神圣和平的忠诚……他从一小群流氓开始,不限制他们的自由,让他们住在自己那儿,并说:“你们自己领导自己吧!”当他们要求舒适时,说:“我们没有女慈善家太太,自己劳动吧!”他的成绩说明,他善于唤醒他们的自尊和自豪感。这推翻了所有迄今存在过的龙勃罗梭^[201]、弗洛伊德以及其他具有隔代遗传、习性等等观点的人们的罪犯理论。他们很快就开始为自己的公社自豪,并忌妒地保护它。现在他们在博尔舍夫有两三千人,很快他们将庆祝10周年。亚戈达根据这个模式建立了一系列别的公社,有3万或4万人。我问,习性难改者的百分比如何。根据亚戈达的说法,为数很少。如果在哪个人身上发生不良现象,所有其他人都会感到伤心。例如,不久前,有个姑娘离开了博尔舍夫,她是被释放的;此后不久,她

又在偷盗橱窗时被抓住。感到受侮辱的同志们申斥她。亚戈达说,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原因多半是来自周围人们的不信任,周围的人向他们表明,无论如何都记得他们的罪行——这时他们就丧失自尊,一切又从头开始。接着,亚戈达热情洋溢地预言,两三年后,流浪儿罪犯将在苏联消失。因为正是他们组成犯罪率的基础,亚戈达不切实际地相信,再过10年或者20年,犯罪现象将几乎完全在苏联消失。如果相信亚戈达,现在莫斯科已是犯罪率最低的世界最大城市之一(纽约的犯罪率最高)……

这样的幻想,这样的理想主义!在政治领导人身上发现这样的东西是令人奇怪的,从他的残酷无情的职业来看,他是最不会陷入J.J.卢梭式的易动感情的乐观主义的!这么说来,一个人总有一天能成为好人和善人,能成为这样的人只是由于坚定的努力!一下子就抛弃了习惯和天生的倾向!……我怕未来将辜负这位罪犯改造者的希望。白天尚未结束,亚戈达的失算就显露了出来。

不过,亚戈达并不因为这种努力而失去自己的价值和吸引力。只是他的如此广泛地感动刑事罪犯的固执劲头,为什么就不扩展到政治犯人身上?我再次提到造成那么多痛苦的“行政强制迁出”列宁格勒。我还再次提到将被流放者关押在监狱或集中营中的想法,这些监狱或集中营应至少配备符合章程的卫生设施。可是,亚戈达再次非常认真地回答:“我们无权对他们运用羞辱他们的处罚。”集中营是预定给刑事罪犯用的。例如,就像我已提到过的、莫斯科附近的有20万人的集中营。把他们集中在那儿是为了在大型工程(例如莫斯科—伏尔加运河)中加以利用。这是警察理想主义的又一种表现,这种理想主义注重的不是人们的肉体痛苦,而只是事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内涵!

亚戈达说：“最近 15 年来，我从来没有机会和许可与外国作家交谈。您是第一个。以前我的工作不允许这么做。因而我避开他们出席的会议和会见。”

接着，他再次重申，我的名字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我对苏联来说是什么样的人。

7 月 13 日 星期六

休息日。天空依旧阴晦。暴风雨后空气变得更清凉。我讨厌这不见太阳的夏天，阳光对我来说是如此有益和必不可少。

上午与玛莎的婆婆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库达舍娃进行个别长谈。她是一个聪明女人，非常善于控制自己并权衡自己的说话——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可资借鉴。她的承认补充了我已发现以及我自己已猜测到的事情。许多事情涉及苏联青年。苏联青年具有非常好的品质，但同时又是生硬的，甚至是残忍的——这是过早了解死亡和绝望的代价。年轻人知道他们的熟人中有人死了，但晚上照旧去电影院。他们已学会不露声色。而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过于高声说话。谁倾诉衷肠，谁就暴露了自己。

年轻人彼此不信任。一些事实与昨晚所说的有点矛盾。集中营预定不仅仅给刑事罪犯用。有独立见解的、不善于谨慎地保持沉默的人会消失不见。官方的看法被强加于人。还说了一些有关运动的话。然而，所有的人现在都赞同（或者这是我的交谈者的预防措施？）革命的基本思想；他们意识到，正在建设伟大的未来。这就是叶卡捷琳娜·瓦西里耶夫娜在与我告别时劝我记住的东西。

一起喝茶的有军事指挥员菲林^[202]，他领导建造运河的重大工程：在涅瓦河—白海运河^[203]之后是莫斯科—伏尔加运河^[204]。他就像以钢铁般毅力率领成千上万工人的古埃及伟大建设者，但同时又非常奇怪地关心道德再教育，这种关心无论如何不是假装的。他和亚戈达一样，也是卢梭式的理想主义独裁者，但与亚戈达相比，完全是另一种气质。刚毅的、尚年轻的人，西伯利亚人，内战时期的游击队员。他把良心的谴责推心置腹地告诉了高尔基，并就一个他所同情的匪徒征求高尔基的意见。尽管想方设法使这个匪徒改邪归正，但他总是旧习不改。这个人曾拥有党证，是因诈骗被捕的，而菲林让他担任办事员。就在不久前，他受托根据认捐名单收集建造飞机的捐款，却偷了收到的钱，并把钱花掉了，数目不大，100卢布左右。菲林感到气愤：“要是他偷盗很多钱，而不是自己的同志们如此费力地挣得的、从他们那儿收集来的少得可怜的一点钱，我倒是会原谅了他。”这不是他第一次旧病复发，但最近一次的经过最令人厌恶。菲林弄不明白，一个人，以前的共产党员，怎么会如此堕落。这一次菲林严厉地惩罚了他。过了一段时间，罪犯要求放他出去几天，探望患病的儿子。菲林尽管恼火，仍放了他，心想他不会再回来。可是，他回来了，而且走到菲林那儿声明：“指挥员同志，我想对您承认，党证是我偷来的，我从来不是共产党的成员，而是给自己制造了假文件。您对我很好，所以我应该对您说明这件事。现在随您怎么处置我！”可以判处他死刑，但菲林自然让他回到了原来的地方，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菲林知道他会重操旧业，并感到痛苦——怎么找到约束他的办法？高尔基建议说：“利用他对儿子的爱。”然后，谈话涉及两名已被判罪的女政治恐怖分子，“非常好的女人”，她们引起了菲林的注意（这

证明,不像亚戈达所担保的,在集中营内关押的仅仅是刑事犯!)。菲林称她们是“虚无主义者”。高尔基感到奇怪。菲林解释说:“我说‘虚无主义者’是因为她们毫不注重自己的衣着,穿得像男人一样。”他说,他信任她们。在基洛夫被谋杀后,他在罪犯面前作了一次充满威胁的演讲,说,从今以后他将特别注意具有可疑往事的人们。在他发完言后,两名“虚无主义者”走到他跟前,并说:“我们明白。您指的是我们。同志,请您把我们派往最困难的地区,派往回不来的地方。我们想结束怀疑,并证明我们的忠诚。”菲林谈到糟糕的天气,谈到最近几天的雨,不过,下雨并没有中断工作。他那儿没有人患病。囚犯之一,一个工程师,发现了防治痢疾的疫苗,而且,现在已能成功地运用这种疫苗。

晚上,芬兰人女歌唱家伊尔玛·亚温泽姆^[205]为我们演唱了许多由她收集的优秀民歌。她是民族学家,走遍了苏联的所有加盟共和国,从乌克兰走到中国。她有一张柔和而纯正的、能在声调和音色上非常好地“体现新形象”的嗓子,当她演唱时,她的嗓子能表现每个民族的风格特点(后来,读了印刷出版的这些歌曲,我就认不出它们了:它们失去了生气)。在这些丰富多采的曲调中,我特别欣赏16世纪自由奔放的鞑靼歌曲——它的悲剧式朗诵类似我们的《雷诺国王》^[206]——和亚美尼亚的夜莺般的爱情歌曲,亚美尼亚是苏联的音乐之国意大利。

高尔基的兴趣和爱好经常暴露出他是一个顽固不化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是这样的人,也将是这样的人,作为流浪者,他不会不喜欢流浪者们的充满冒险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歌曲。

7月14日 星期日

在洗脸时,我感到刺骨的腰肌痛。我们白天的全部计划都被破坏了(我们应该前往莫斯科,出席由年轻的苏联作曲家们为我举办的现代音乐交响音乐会。我还应该参加日祷,以便在返回瑞士后证实苏联的宗教自由)。好心的奥林皮阿达是这所屋子的神明的化身,她用“本格”香膏给我按摩,还给我照蓝光、用电热烘烤和拔火罐。整个白天我在房间里度过。

只是在晚上,晚饭以后,我才下楼来到大厅,迎接两位彼什科夫^[207]——高尔基的年轻儿媳妇和他的妻子。她们在欧洲作了长途旅行后回来,到过法国、英国、意大利(她们在威尼斯参观了提香^[208]的展览会)。毫无疑问,促成这次旅行的动力是希望使年轻女士忘却丧夫的悲伤(看来,这个目的达到了……幸运的年轻人^[209]……)。两位女士都极其文雅和客气;年轻的那位非常漂亮、愉快、纯朴和可爱;在年长的那位的笑容中隐藏着痛苦(有时这种痛苦是毫不掩饰的,很快我就知道了为什么)。

晚上,为我们放映了两部电影——《破烂的鞋》和《金色湖泊》。前一部影片的主要人物是儿童,他们异常自然地表演自己的角色,使人想起弗拉皮耶的《幼儿园》^[210],但这部影片的情节更具戏剧性(柏林和汉堡的罢工和起义);后一部影片有阿尔泰山非常美丽的景色、原始森林和动物群(熊、狐狸、鸟、蛇、天空和水),但影片情节非常幼稚(采金者、匪徒、凶恶的“萨满”^[211]),并使人想起丢弃讽刺挖苦、拼命增添甜言蜜语的梅恩·里德^[212]。影片结束时出现了原始森林火灾,3架飞机向原始森林投下灭火炸弹。

(我忘了记下来,几天前,我们看了一部有关苏联飞行员的

使人开心的电影和许多有关中亚的纪录影片。)

高尔基又感到自己很不好,咳嗽很厉害,躺下睡觉不早于深夜2点(他使得自己的女按摩师彻夜不能睡觉,用止血带给他按摩)。这时克留奇科夫终于得到解脱,与年轻妻子一起抽空开车去莫斯科访友。他们在早晨四五点钟左右回来并躺下睡觉。对西方劳动者来说,是不可能过这儿大家都过的这种夜生活的。

7月15日 星期一

腰肌痛使我不能外出。

下午喝完茶后,观看纪录影片和《彼得堡之夜》。后者有极好的镜头设计和壮观的景色,难以置信地浪漫的、不合情理的故事,无疑适合这里的口味。

吃晚饭时我的邻座是拉狄克,他扯着嗓门不停地说了又说,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但是,他的盘子却始终是空的(为什么不说说他的嘴)。这是党的非常糟糕的喉舌。他议论一切,一切都议论,说了很多很多。他是危险的。我听到他声称,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战争将是可怕的和普遍的,也许明天开始,也许明年开始,重要的是赢得两三年时间,以便“我们(苏联)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以便农民实现足够的丰衣足食,或者哪怕是确信现有制度能使他们丰衣足食,那时他们将发狂似地保卫这种制度。战争最初几个月的伤亡将占80%。而且,将对轰炸柏林和东京这样的城市感到可惜(或许,这是真诚的,但他总是一副似乎在开玩笑的模样),不久前他去那儿旅行时就想过这一点。当然(这时他回答我向布哈林提的问题,布哈林把问题告诉了他),“农民人口的足足一半不是布尔什维克的,这一点众所

周知。而且,尽管富农阶级已被消灭,富农精神仍活着。但如果把农民集中在经过清洗的党的坚强核心周围,他们将不错地进行战斗”。在杀害基洛夫之后,敌人给党的总参谋部造成了损失,为使这种情况不再能发生,已采取措施;国家机关有责任审查所有的人,进行清洗和流放。真见鬼!在这种情况下,必然会有许多错误和不公正,但与整体相比,一点儿错误又算得了什么!说到社会救济,这是无足轻重的。至于法国共产党的职责,它在于支持法国政府与希特勒德国进行斗争,好好战斗,然后,在胜利以后,再掉转武器反对自己的政府。如果托洛茨基继续在自己的报纸上批评法苏军事同盟,我们能够向他出示由他亲手书写的文件,这些文件证实,他在1918年参加了与内塞尔将军的谈判,谈判缔结反对德国的公约。此外,几年后(在1921或1922年),他推敲过联合德国反对怀有敌意的英国的问题。拉狄克因此回忆起,他和布哈林都曾是签署《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213]的反对者,他们来到克里姆林宫与列宁对骂。他们对列宁说:“您不敢签署这种条约,因为您不能向人民解释这种行为的原因。”列宁说:“为什么不敢?我将签署,并向人民说明一切。人民会理解的。人民不是像你们这样的笨蛋^[214]。”接着,列宁把他们赶出了门外。

拉狄克说了很多、太多有关托洛茨基和反对托洛茨基的话。产生一种印象:或许过去他与托洛茨基很接近。过分地划清界限。

拉狄克个子不高,有一张宽阔的脸,戴着眼镜,使他看上去像舒伯特,大胡子遮住了脖子(后来我在华沙犹太人区见到的许多犹太人都是这种模样),秃顶,周围长着蓬乱的、没有梳理的头发,他不停地以手示意,甚至在吃东西时也是这样。高尔基在听

他说话时偶尔插上片言只语；但只有拉狄克能够说话。

他是与妻子一起来的，不止一次援引她的正确见解，援引她的敏锐看法（对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非常不友好的敏锐看法）。

餐桌旁还坐着负责苏联全部农民报刊的乌里茨基（农民报刊有上百万读者）。他曾经对玛莎非常友好；他与高尔基一起帮助她获得瑞士签证。一开始拒绝给她签证。

从照片谈到了列宁，列宁看到墙上自己的形象，便勃然大怒：“这使我感到厌恶。到处我都见到自己的猪脑袋。”显然，斯大林没有感到这种憎恶。

7月16日 星期二

佩夫兹纳博士来做体格检查，他是消化器官疾病方面的专家，欧洲水平的巨擘。个子不高，黄皮肤，瘦瘦的身躯，非常不漂亮，非常细心、忧郁和善良。他是一个很大的悲观主义者，令人安心的话说得很少。根本不赞同我的瑞士医生们认为肠梗阻危险已排除的见解。不是说最近的将来就有这种危险，但必须经常注意这一点，并确定了一系列如此严格的处方，以致倘若我照这些处方行事，它们能使我的生活极大地复杂化（我将在苏黎世与黑默利医生商讨这件事）。用石英治疗，每两三天洗一次胃，甚至在必要时借助虹吸管清洗，每天按摩手脚，复杂的饮食，一段时间不吃盐，一段时间不吃糖，一天两杯各种各样的果汁，严格限制流质数量等。归根结底，对早已用坏的旧管子给了太多的注意。

下午，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和导演集体来

访,大约 20 人,包括《亚洲风暴》的作者普多夫金(可惜的是,爱森斯坦没有来,他不在苏联)。我所看过的大多数影片的导演都来了——《边界》、《破烂的鞋》(两位导演都是女性)、《胖女人》、《彼得堡之夜》、《欢乐小伙》等。男男女女,基本上都是年轻人,给我留下了比作家们更令人愉快的印象,因为他们坦率开朗,满怀精益求精的愿望。他们狂风暴雨般地向我提出一连串问题,我和高尔基一起回答了这些问题。友好而活跃的讨论;我们真诚地向他们说了我们所发现的缺点,他们以最聚精会神的方式听我们说,因为愿意考虑批评性意见并利用这些意见。我们讨论的主要是有声电影问题。我和普多夫金一起对无声电影已成为过去表示遗憾。应该保存无声电影,因为它所具有的引起联想的力量是有声电影永远也不可能具有的。不管怎样,有声电影尚未找到自己的语言:必须建立新的风格,精心琢磨的、充满活力的、富有诗意的和具有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摄影技术的风格。他们请求我写电影剧本。但我所考虑的那个剧本——有关巴黎公社——已在写作之中。还谈到他们想上演的我的《哥拉·布勒尼翁》,谈到必须(我坚持,而他们不同意)到勃艮第拍摄外景。

晚上,同进晚餐的有实验医学研究所^[215]的 3 名医生。该研究所是两年前从列宁格勒迁来的,并彻底改组了自己的工作。高尔基看来对研究所的脱胎换骨作出了贡献。研究所对不同领域——实验医学、生物学、生物化学、物理学——的主要题目进行研究,因此,一些问题同时从各个方面得到分析。研究所培养以前没有的具有广泛的综合性经验的医生。看来,他们确信,几年内在医学上将发生变革。不过,在这方面,也像在任何地方一样,存在真正的革新改造狂热。研究所最著名的医生斯佩兰斯

基吃晚饭时也在场(与所长费奥多罗夫一起),并进行了交谈:他从事已引起社会舆论注意的试验,包括疾病“封闭法”(例如,他断言,伤寒病持续两三天时间,结果出现伴随而来的疾病,但是,如果“封锁”起始疾病,随后的疾病就不会出现)。他认为神经中枢在疾病发展中起重要作用。斯佩兰斯基谈到了对在世界各地同时实现的发现进行协调的问题。我们的朋友加尔托赫博士也在该研究所工作,不过是在它的列宁格勒分所,分所的建立早于莫斯科本部,而且并没有为自己预定这样的目的。我觉得,他感到非常幸运,因为意识到能够专心致志于自己以前的研究,不必相信最新的试验。

晚饭时和晚饭后,我与邻座叶卡捷琳娜·И·佩什科娃女士交谈。她反对(但隐瞒这一点)周围的所有这些人。她在红十字会^[216]工作,是红十字会的领导人;用她的话来说,她不能再无所事事。她感到失去了一切希望。她非常敌视亚戈达,严厉地指责他。我用不多几句话对她说了维克托·塞尔日案件,包括失踪的手稿。她的见解与我从亚戈达那儿听到的相反。

另一方面,也有人对我说了许多有关亚戈达的好话:几年来他老了很多,也瘦了很多,他感到痛苦,他是非常善良的人,他的心脏有病。

我不偏不倚地记下对立的印象和议论。也许,每一方面都有实情。

高尔基非常善良,但漫不经心,内心深处依然倾向于漂泊的生活方式。我发现,在他的家里,继续在滥用服务人员的时间,而且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服务人员在所有客人都离去后才能上床睡觉,不早于夜里2点,而早晨7点就得起床。

在一次谈话中,高尔基顺便说到,格兰女士(“文化和休息”

公园的)曾向他申请 9400 万卢布用于自己的工作。接着,他补充说:“我没有 9400 万,我只有 400 万。”他是否在开玩笑?我没有想过。但可以有把握地说,他不是经济专家。

7月17日 星期三

白天在莫斯科。腰部仍在作痛,但我勇敢地乘车走了 100 公里路程。好天气终于稳定了下来。

一开始我们前往“国际工人救济会”电影制片厂(电影制片公司),在那儿为一部有关季米特洛夫的影片拍摄我的镜头。我坚决拒绝扮演角色或者表演什么。拍摄了我坐在桌旁谈话的镜头。他们利用机会展示彩色电影的首次重要尝试。情节:瓷器工厂的罢工,厂主为了获得保险赔款而纵火焚烧工厂,造成 42 人死亡(历史事实)。场景是用美丽的色粉画色调拍摄的,非常成功,但带有恩纳^[217]的瓷器装饰画的风格。我当然不认为,电影在增添声音和色彩后就能博得好评。

在高尔基的莫斯科住宅,费奥多尔·革拉特科夫^[218]和阿尼西莫夫拜访了我。革拉特科夫身材不高,50 岁左右,有一张平常的宽脸,头发蓬乱,看上去令人难以忍受地落后于新时代,创新试验的旋风以及在艺术上和谐地体现这些试验的困难已使他晕头转向。他因为自己的《水泥》而成为苏联小说道路的开拓者,但可以看出,现在他也感到透不过气来,并因此而痛苦。他说话时显得谦逊和尊严。阿尼西莫夫正在写一本有关我的作品的书,关于这本书他有许多问题。他讨人喜欢,健康而愉快,乐于交际。不对任何事情产生怀疑,也不使任何事情复杂化。

早饭后,我参观了莫斯科文化部门首长领导的工人小区。

他是一个身材很高的青年人，从前的顿巴斯矿工（来自戈尔洛夫卡），国内战争的参加者（出身于劳动人民、获得了最高职位的新人们所固有的智力的极好例子。据说，他是优秀的组织家）。我们所参观的小区建造在不久前被炸毁的旧修道院的位置上*（高尔基曾出面保护它的两个旧塔楼）。计划是宏伟的，但暂时只建成了由韦斯宁兄弟出色地设计的能容纳 1100 名观众的剧场^[219]。剧场有宽敞的入口、宽敞的休息室、三重舞台、旋转平台以及一切最现代的改进设施。我想有趣地指出一点：在苏联，总是从剧场开始，忽视图书馆。接着，我参观了一所儿童学校，它的唯一值得注意之处是，它建造在原来的垃圾场的位置上。看来，陪同我参观的人们认为，在西方没有如此光线充足、如此设备完善的学校！根据斯大林的新计划，已决定今年在莫斯科开设 70 所新学校，而明年开设 150 所。一下子上哪儿找比如说 150 名所需的地理教师？文化局长说，即使他收到 5000 份教师要求提供工作的申请，他也能保证所有的人都有工作。我对一些具体的资料感兴趣：教师每月的平均工资为 300 至 400 卢布。（陪同我的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副主席波希托诺夫说：“几乎与我们一样。”**）学校男女校长的工资为 500 至 600 卢布。每个工作日工作四五个小时。

可是，实际所得到的更多——由于必须补足假期的收入。是否接受外国人教师前来工作？原则上是接受的，但是，看来没有人对此感兴趣。他们还必须熟练地掌握俄语，此外，他们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相应的”。

* 顺便说说，在莫斯科，确实破坏了很多教堂和修道院。

** 这些资料原来是虚报的。

参观了特列嘉柯夫美术馆^[220]的旧圣像画厅(美术馆馆长是克里斯季,战时,在沃韦附近的圣莱日耶,我曾在卢那察尔斯基那儿见过他);麦绥莱勒^[221]曾十分赞赏地对我说过圣像画。令人惊奇的风格和流派的多样化,从12世纪直到15世纪(诺夫哥罗德派^[222]、弗拉基米尔派^[223]、特维尔派等)。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影响。几乎没有什么拜占庭严谨风格的痕迹。色彩感(对这个时代来说是出乎意外的),匀称感和表现力。从14世纪起的一些判决书是如此精致,可以把它们称为现代派作品。最精美的收藏品是15世纪初鲁布廖夫^[224]的独一无二的作品:天使般的《三圣像》,匀称柔和,拉斐尔式的尽善尽美。对其时代来说如此出乎意外的绘画奇迹,就像凡·爱克^[225]或者昆廷·马西斯^[226]的著名三联祭坛画。至于这个巨大博物馆的其余部分,我没有见到任何有趣的东西,除了陈列列宁雕像的大厅,雕像的作者观察过列宁的各种情感流露——列宁的各种情感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异常重要的思想源泉。

在非常美好的晴朗晚上,穿过草地和树林回家,7点半左右回到家。晚上,晚饭以后,与高尔基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

7月18日 星期四

(玛莎在莫斯科度过白天的部分时间。)

上午我看了两部影片。一部是《土地》,总体说来是平庸的,但有人、动物和乌克兰风光的非常美丽的镜头,是加了乌克兰语字幕的无声电影;另一部是关于莫斯科—伏尔加运河的纪录影片,影片展示了工程的开始,类似史前动物的功率强大的挖掘机,以及对能冲刷和卷走一切障碍物的强大水流的利用。影片

末尾反映了囚犯集中营、囚犯的生活和工作。影片中出现了亚戈达和高尔基。放映影片时亚戈达在场。无论是他还是高尔基,都不喜欢《土地》。我听到亚戈达在我背后说:“这不单单是糟糕,这是海淫作品。”(说的是一个处在恋爱思念中的裸体妇女。)这儿放映的影片是不删节的。

我们又谈起维克托·塞尔日。早晨我写信给亚戈达,坚决要求找到手稿并把它交给我。亚戈达已收到我的信。这一次他对我说,手稿已在莫斯科书刊检查机关找到*,但这不是长篇小说,而是对战前无政府主义的旁征博引的理论研究著作,可是扣留手稿的书刊检查机关不受他管辖。在进行这次谈话时,佩什科娃女士也在座,她对亚戈达的最新说法表示怀疑。亚戈达突然对我产生了奇怪的热烈好感。他给我带来非常漂亮的一束白色和红色的百合花,鲜花采自他自己的花园(与高尔基一样,在那个禁区,他有自己的“别墅”)。

与亚戈达和佩什科娃女士共进早餐,她坐在对面——他们是彼此微笑的敌人。

下午,在花园散步,时间不长,并与继子谢尔盖谈话。

喝茶后,来了大约 30 名格鲁吉亚音乐家,苏联重工业副人

-
- 由此看来,亚戈达的消息似乎是不灵通的,因为几天前他向我担保,手稿不在莫斯科。可是,还有一个从某一点来说给人深刻印象的例子,说明这位前国家政治保安局首脑、现任内政部长对在其负责的部门内发生的事情显得一无所知(?);阿罗谢夫告诉我,似乎麦绥莱勒在其最近一次游历苏联期间,在他和他的几个旅伴被闻了氯仿后,在汽车上被抢了个精光,这么干的是——帮预谋犯。我对亚戈达说了这件事。他完全否认。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这是谣言。回到瑞士后,我向麦绥莱勒询问这件事,他证实,与他的女翻译以及英国人旅伴一样,的确在火车包厢内被抢了个精光(可能氯仿使他昏昏欲睡)。从他身上拿走了钱、票夹和草稿本。难道亚戈达可能不知道这件事?

民委员、格鲁吉亚人埃利亚瓦^[227]把他们介绍给高尔基。他们全都是业余爱好者。工人和农民。他们身着民族服装，腰间挂着象牙柄的短剑。最富有形象的是“古里人”^[228](?)——第比利斯的装卸工人，他们戴着国王查理六世样式的帽子，穿着绣花红色西装背心和深蓝色上衣，而且，与其他所有人一样，穿着高统靴子。领唱的男高音是一个来自斯万涅季亚的70岁老农民。他们演唱按对位法作曲的奇特的三声部曲调，这些曲调看来与他们的帽子一样古老，或者，至少是弗兰西斯一世^[229]时代的，同时模仿叫喊声、嘈杂声，还严格地插入一些独立声部。“古里人”是最奇特的，他们的复调歌唱在声部的独创性方面前所未闻地大胆，这些声部包含各式各样的音调，在放低的男低音衬托下显得非常高昂。这是15世纪的农民对位旋律^[230]。山地给一些以假声表演的旋律留下特别的痕迹。几个年轻的高加索人——卡巴尔达人^[231]身穿腰部紧束的紧身外衣，腰佩马刀，脚登无跟软靴，头戴向上放阔的传统高帽，表演了令人陶醉的粗野的阿布哈兹舞蹈和传统的更轻盈的列兹金卡舞。全体在进行格鲁吉亚合唱时站成圆圈，边唱边跳舞。乡村木笛、铃鼓(小鼓)和掌声为舞蹈鼓劲。演唱会后，高尔基为祝贺客人们举行宴会。选出了“筵席主持人”，他确定举杯祝酒的次序，祝酒词都很长，词藻过于华丽，但十分明确：第一杯为高尔基，第二杯为我，接着为艺术和艺术的鼓舞者——女人，接着为组织者们，接着为斯大林等。在依次祝酒后，每一个杯子都必须喝干。每次举杯祝酒后进行表演：“筵席主持人”(埃利亚瓦)指挥合唱和独唱。牧人模仿鸟鸣，用哨子即席演奏了一台真正的森林音乐会。最后，大家一起用格鲁吉亚语唱《国际歌》(它的旋律在结束时也变成格鲁吉亚式的)。可是，我注意到，“古里人”没有唱：他们缺乏热情，他们

的嘴都闭着。宴会后重新开始唱歌跳舞。一个忧郁的青年人刚才在餐桌上一个接一个地吞下了整整一盆小馅饼,这时跳起了狂热的舞蹈,一边为使自己兴奋而拼命地喊叫。如果不是他们必须乘汽车离开,在公园再举行两场演唱会,娱乐活动会持续一整夜。

再次与亚戈达和佩什科娃女士共进晚餐。斯大林的秘书给我们送来了我与他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谈话的记录副本,斯大林已审读过这个副本,要求我也审读一下。一个颧骨高高、有一张蒙古人的翘鼻子圆脸的年轻妇女,在没有伴奏的情况下演唱了动人的布里亚特人^[232]歌曲,一些歌曲完全可能是10世纪的。她是一名来自阿尔泰的教师(在国内战争期间曾是机枪手)。

所有在坐的人都向我们表示无穷的爱:高尔基、克留奇科夫、亚戈达以及其他。他们对我们说:“别走!留下吧!……如果你们必须得走,过一个月就回来!……你们将得到房子,随你们想要什么地方的——不管是克里木还是莫斯科郊区……你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这么好地生活和工作,你们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的关心和爱……别走吧!……”

7月19日 星期五

审看交给我的与斯大林谈话的记录副本。

观看两部电影:《佩波》^[233]是高加索影片,有极美的景色和生动的情节,描写的是1870年左右的梯弗里斯;另一部是纪录影片《从莫斯科到卡拉库姆沙漠》,描写的是在比撒哈拉沙漠更广阔的沙漠里旅行。

与克留奇科夫谈论我的继子及其妻子的住房问题(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仍是折磨人地复杂)。

总的说来,在莫斯科,生活对大学生、教师和小职员来说仍是非常困难的。利季娅·帕夫洛夫娜对玛莎承认,不久前她请玛莎以及另外几个朋友吃的一顿简单而冰冷的早餐就花了她 86 卢布。一块长方形巧克力糖要花 25 至 30 卢布。因此,如果你见到高尔基那儿或者苏联对外文化协会招待会上的挥霍浪费,你就会感到某种不自在。烦恼就不由自主地积聚了起来。

有传闻说,萧斯塔科维奇拒绝来我这儿,因为我是“共产党员”。也许,这是谣言。但是,我不怀疑,大部分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对很多东西都不赞同,更不必说在作家中间司空见惯的倾轧和忌妒了。

7 月 20 日 星期六

送出了给斯大林的告别信,内容如下:“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在离开莫斯科前夕,我向您致以最衷心的问候。限于我的糟糕的健康状况,我在苏联的逗留过于短暂,在此期间,我接触了强大的人民,他们在不断克服无数障碍的同时,正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怀着英勇无畏和井然有序的激情创建新世界。我赞叹他们的强大威力,他们的快乐生活,他们的热忱,虽说有艰难困苦,它们正在被逐渐克服,而且,艰难困苦更提高了他们的伟大工作的价值。

我在离开时真正确信我在前来这儿时所预先感觉到的东西:唯一真正的世界进步是与苏联的命运不可分割的,苏联是无产阶级共产国际的火热的策源地,全人类都应该并将成为这样

的策源地,在所有国家,保卫无产阶级共产国际,反对一切威胁它的发展的敌人,这是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种责任——您是知道这一点的,亲爱的同志——我从来没有放弃过,只要活着,也永远不会放弃。

紧握您的手,而且,通过您,我紧握伟大人民的数不清的手,我觉得自己对他们有兄弟般的依恋之情。罗曼·罗兰。

这封信由克留奇科夫立即带往克里姆林宫转交斯大林。克留奇科夫请求我允许把信刊登在报纸上。信得到高尔基和克留奇科夫的热烈赞同。

亚戈达偷偷地把以前被书籍出版总局(文学检查机关)扣留的维克托·塞尔日的手稿交给我。他要求我在动身前把手稿归还给他。半夜我阅读手稿。这是1909至1914年之间西方某地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经历,特别是他叙述了博诺^[234]案件。经历十分悲惨,而且远不是颂扬无政府主义的(不过,这些新自由思想派也拼命否认自己与无政府主义者是同一类人)。最终得出结论:致命的错误是未能看到革命的临近,不愿为革命牺牲自己。没有任何理由没收这部手稿,我把这一点给亚戈达说了。

上午看了两部影片:《马克辛的少年时代》是关于20世纪最初10年一个革命者的成长的非常美好的故事,另一部是关于塔吉克活着的上帝阿迦汗的故事。

晚上重看《夏伯阳》,与其他影片相比,它的明快的、富有表达力的语言给我留下了比第一次观看时更深刻的印象。

严重神经衰弱的发作妨碍了帕斯捷尔纳克在去柏林途中顺道看望父母,他与父母已有12年没有见面,现在他锁在莫斯科近郊自己的家中,不想或者不能见任何人。他肯定地说,很想与我见面,但又说,如果见到我,则可能只会哭。在我们动身前夜,

高尔基很是忧伤。他努力想使我们留在苏联。他梦想有一天我将永远在这儿定居。

7月21日 星期日

动身的日子。天气非常好。(早就应该好了!)

亚戈达给我送来几束鲜花。

我给斯大林的告别信发表在《真理报》上。

在高尔基的工作室与他长谈。他谈到托尔斯泰,他说,在俄罗斯,托尔斯泰的影响没有通常认为的那么大。这种影响是通过托尔斯泰主义者实现的,他们与托尔斯泰的真正学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即使没有放弃他的学说,没有彻底背叛他,也是歪曲了他的学说。他简略地说了许多他所知道的团体的历史。这些团体的策划者在觉得他们已不再需要他后,最终竟然粗暴地辱骂他。实际上,托尔斯泰的宗教思想并不是他的所有物:他是从农民对上帝的信仰中领悟到这种高尔基希望描述的宗教思想的。作为作家,托尔斯泰往往是拙劣的,使用粗俗的、有时令人难堪的短语和语句(在向他指出这一点时,出于固执,或者出于希望证明自己对形式的高傲的蔑视,他仍然保留它们)。可是,作为善于塑造形象的天才,他是无与伦比和独一无二的,他的形象塑造能使人想象和感知物品和人。高尔基批评托尔斯泰的哲学,甚至批评他的一些主人公在哲学开始凌驾于幻想之上的场合的弱点,与此同时,他对托尔斯泰的钦佩超过所有其他人,他最钦佩的是托尔斯泰和普希金。他以真正的艺术家所固有的深深赞叹回忆起《哈吉-穆拉特》^[235]中对景色(峡谷)的描绘。高尔基憎恨(鄙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伪善,由于就

在不久前发现了他与波别多诺斯采夫(?)的通信^[236]，他的形象改变了。但这不妨碍高尔基承认他是伟大作家。在目前健在的作家中，高尔基特别赞赏的似乎是天才阿列克谢·托尔斯泰^[237]，不过，他过分利用了自己的天才。

看来，高尔基与自己的读者从来没有亲密的联系。毫无疑问，现在阻挡性障碍把他与他的读者隔开了，在他与读者之间竖起障碍的是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的热心，还有他自己的过于官方的地位。

我问高尔基，苏联的政治活动家们是否对文学感兴趣。他答道：是的。危险在于，太多的作家抓住他们不放，以最丑恶的方式利用他们。在读得很多的领导人中，他特别提到李可夫^[238]和斯大林。但后者在读一本书时，往往在里面寻找有争议的题目。而且，然后他在许多个小时里谈论这个题目。斯大林有惊人的记忆力。读完一页，他能几乎没有差错地将它背出来。有时他把自己的拜访预先通知高尔基，并问他：“能不能邀请某某和某某？”

在几代作家之间，脱节现象正在迅速发展。革拉特科夫一代已远远落在后面。这种情况很快也将发生在潘菲洛夫^[239]一代身上。这儿与西方不同，在西方，艺术家始终走在观众前面。这里一切正相反：观众超越艺术家并催促他。

我们在午后4点左右离开高尔基的家。高尔基激动地声称，稍后将到莫斯科，送我们去车站。我们竭尽全力不让他实现他的打算：这对他的健康来说可能是危险的。但他很坚决。当高尔基走开时，亚戈达又交给我整整一大束鲜花！——但没有我向他索取的维克托·塞尔日的手稿。

我和佩什科娃女士两人合坐一辆汽车。她苦恼地谈到高尔

基对她在政治性的“红十字会”工作的不友好态度。高尔基认为,不能干涉国家事务。确实,佩什科娃女士被捆住了双手:她几乎不再能做任何事情。与她不同的是,在佩什科娃女士或我的要求下,亚戈达*能做到减轻惩罚;但佩什科娃女士不能容忍的是,这些例外是出于帮忙,因为这么做是全人类天职所要求的。佩什科娃女士明确区分对刑事犯所做的事情与政治犯的命运之间的差别,对刑事犯进行改造,对政治犯却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于5点左右到达莫斯科的高尔基家中(我们的火车是晚上10点左右的),哈拉托夫^[240]到那儿看望我们。他是科学发现委员会的现任主席。他叙述了侵袭所有人、甚至普通工人的发明热。一项处于实验阶段的耸人听闻的新发现与恢复死人静脉中的血液循环有关。在担任这种职务之前,哈拉托夫曾是运输部门的领导人,更早时则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会成员(正是在那儿我与他认识)。管理国家全部运转系统的领导人就是这样培养的。

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罗曼语系民族部的新主任来访。

在与继子谢尔盖的私人交谈中,我知道了大学生(部分大学生)中间的痛苦和愤慨。根据他的说法,社会性学科方面的功课耗费掉每周负担已如此过重的时间表上的许多时间,这些功课的荒谬在于,指导它们的是一些平庸的人,答案的掌握是通过依样画葫芦。不容许任何讨论。这些智力有限的人们什么都不怀

-
- * 亚戈达和高尔基一样,来自下诺夫哥罗德,他们在亚戈达14岁时就认识了。他们成为朋友是十分自然的。
 - ** 在红十字会的工作方面,佩什科娃女士的最亲密助手是女老革命家薇拉·菲格纳^[241]。

疑,可他们正在培养一代反对派,不过,这些反对派暂时还不敢在彼此之间谈论这一点。事实不是新的。问题不在于共产主义。一切制度都会犯同一种错误。从而促使大学青年反对高深科学的教条主义者们的暴政(要知道,我也曾憎恶官方硬塞在考试中的鬼花招,拒绝参观师范学校的哲学分部!……命运的车轮改变了方向,但这仍是那个车轮)。谢尔盖对我解释说,为什么当我们建议他充当法国大学生与苏联大学生之间的居间者时,他表示拒绝;他不能自由行动。他也对公共工程安排的不当表示愤慨。白白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由于根据观察结果可能得出的哲学结论,甚至在科学上也不是自由的(在我们交谈时,房屋管理员毫无借口地走进房间:他把我关上的门都打开了。我又把门都关上。——参见在高尔基的树林边花园中的情景)。

我把他所说的事情都记录了下来。他的抱怨是认真的。但必须考虑到这个男孩的精神状况。从童年时起,他就在祖母家中和亲戚圈子内受教育。身为公爵夫人的祖母虽说具有兼收并蓄的观点,但仍有反革命的情绪,他的亲戚则属于虽说贫困、但仍是贵族的阶级。尽管在理智上(虽说在遵循真理的同时仍感到遗憾),他应该承认共产主义的总的路线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他的天性所固有的某些本能和偏见仍使他与共产主义青年疏远——共产主义青年的欢乐的信念和期望不能鼓舞他;从某种程度上说,为他准备的是这样一种人的徒劳无益的角色,这种人退出了总的潮流,怀着将变成不满的遗憾观看潮流如何从身旁流过,或者大发牢骚,但又被这种潮流所吸引。我为他可惜。他的角色本来可能更有吸引力和更幸福。如果我能更多地见到他,我会尝试使他产生希望,因为我爱这个男孩,而且知道他也爱我。

晚饭以后高尔基来了。对我们非常亲热。他想赠送给我自己收藏的中国象牙小雕像——一根带有雕刻的镶头的手杖,但我拒绝了。与往常一样,在临别的最后时刻,我们说着无关紧要 and 毫无趣味的事情。迄今在我的眼前仍出现与我们一起走向汽车的高尔基的脸:他的脸色是多么苍白,他的眼睛是多么忧郁和温和。当然,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和软弱的人;他正在违背自己的天性行事,为了不去谴责自己的强有力的政治朋友们的错误,他正在作很大的努力。在他的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任何人都对这种斗争一无所知。

屋里所有的人都出来送我们:奥林皮阿达、舒拉⁽²⁴²⁾和其他人。

在车站,仪仗队的士兵站成两排。起初我习惯性地问道:“他们在等谁?”我用了一些时间,才决定从队列前走过。在士兵横队后面,是手持鲜花的人群。欢呼的喊声。闪光灯的炫目闪光。我们被送进带有公共客厅的沙龙车厢,车厢内挤满了认识*和不认识的人,他们给我们带来了礼物:鲜花、鱼子酱。一个已过中年的纺织厂女工送给玛莎非常漂亮的织物样品。我对着车窗喊:“再见!”上百张响亮的嗓子随着我重复这句话。高尔基用目光从人群中注视着我。人们帮助他穿过人群,他走到车厢前。当我的手握住他的手时,列车开动了。

莱温医生、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领导人之一波希托诺夫以及

* 最后的拜访者之一是布哈林,他到过高尔基的家,接着在车站又走进我们的车厢。几天后他将启程去中亚。无所顾忌的人。人们说到他的各种各样的疯狂行为。据说,他不知怎么曾纵马在冰上疾驰。有一次,为了采摘罕见的植物,他登上令人头晕的陡坡等。不过,据说他知道死亡的可怕。我们亲切告别。使他不安的是,我的手热得像在发烧,我则请他保重自己。

克留奇科夫陪同我们到苏联边境，克留奇科夫将与我们一起，直到我们从华沙动身去维也纳。

7月22日 星期一

在明斯克，一清早，由白俄罗斯作家组织的四五位作家组成的代表团登上我们的车厢欢迎我。在苏联边境，开动了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我不得不从窗口发表告别讲话。

这一次，我看到了边境上的木头拱门，上面的题词已改变3次。最初是：“苏维埃政权（或者共产主义）没有边界！”然后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现在只是：“欢迎西方工人！”共产主义“辩证法”的很好例子。但可爱的加香却继续抹着眼泪，因为他仍然只看到不再存在的第二种题词。

我们与好心的医生莱温以及波希托诺夫告别。只有克留奇科夫与我们一起出境。就在第一个波兰车站，我便（对以前没有注意到的东西）对环境的急剧改变感到非常惊讶。坐落在鲜花丛中的设备完善的白色小型车站。雅致的衣着。感觉得到回到了资产阶级世界。在另一边，调子由工人定，工人衣着整洁，但不漂亮，衣服顺手就穿，穿得让自己觉得方便就行。

在路上，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在1930至1931年期间爆发的重大农民战争中的事件，这次战争与1919至1920年间的国内战争同样残酷。如果外部敌人善于利用这种形势，则情况可能变得极其严重。尤其在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和乌克兰。在乌克兰，农民毁灭了巨大的粮食储备，毁灭了全部收成，他们只能饿死。在高加索，到了残害自己的牲畜的地步。反抗是强烈的和狂热的。一些富裕农民听任亲属在极端贫困中死去，却把

自己的东西藏起来。在地里挖坑，把粮食藏在那里。

在这些地方，繁殖出大量老鼠。现在农民被制止住了，他们明白了自己的错误，并接受了集体农庄。可是，不能违背客观规律行事。在从高加索被驱逐到北方的流放富农家庭中，几年后重新出现了富农，因此，应该与他们协商。

辽阔的比亚韦斯托克沼地。大地似乎在水面上漂浮。

晚上9点30分到达华沙。在第一个华沙车站(位于普拉加^[243])，苏联领事波德沃利斯基、尼古拉耶夫^[244]和苏联国际旅行社的职员正等着我们。他们劝我们在这儿下车(我们照办了)，因为波兰作家和新闻界代表在主车站等候我们。我们避开了他们。

我们坐进两辆汽车，顺着两座大桥穿过维斯瓦河，接着，沿着大街行驶了五六公里，到达“欧洲人”旅馆(城郊克拉科夫大街13号)。

7月23日 星期二

与前往苏联途中一样，白天在华沙度过。上午，克留奇科夫对我们讲述高尔基的养子的故事^[245]。一个姓济诺维的下诺夫哥罗德犹太人。高尔基早在沙皇制度下时就收他为养子，以便帮助他在事业上有所发展；高尔基有这个权利，因为是他的教父(然而沙皇不同意这么做。但男孩仍得到了彼什科夫的姓氏，并保留了它)。这个养子精力超群，又非常勇敢，他受军事狂热的支配，在1914年战争期间前往法国，加入了法国军队。在凡尔登，他被炸掉一只手，几乎送了命。战争快结束时，他加入了法国反间谍机关。在国内战争期间，他与雅能将军在一起，而后者

曾与彼什科夫的弟弟斯维尔德洛夫^[246]（人民委员会第一任主席）指挥的军队作战。战后他应募去了摩洛哥。他曾获嘉奖，现在是法国将军，但仍用彼什科夫的姓氏。高尔基与他终止了一切关系。这个彼什科夫现在的年龄应该是47或48岁。高尔基的亲生儿子去年去世时是37岁。

克留奇科夫说到革命家卡莫^[247]，他的一生比著名上校劳伦斯^[248]更艰难。他完全不识字，既不会读，也不会写。曾被无法遏止的冒险渴望所控制。在一次冒险时被捕，在狱中，有很多年他装成疯子，而且始终没有被识破。他对克留奇科夫说：“我的腿很痛。彼得·彼得罗维奇，您怎么认为，如果我对它开一枪，是否会痛得好一些？”他还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是公正的人。如果他对我说，‘从5楼跳下去！’我就会跳，因为我知道，既然他这么说，就意味着这么做是必要的。”有一次，他恳求列宁允许他前去杀死彭加勒^[249]。

波德沃利斯基来访。他告诉我们有关波兰现状的许多有趣消息。共产主义“病”正沿着边界传播，在边界附近的一个村子中，不久前曾宣告成立苏维埃政权（村子立即遭到彻底破坏，被烧毁了），而现在这种“病”正处处获胜，蔓延到了国家最中心的地区。农民大骂不止：他们的全部财产尚不够支付向他们征收的税款。甚至从事艺术手工业生产（类似苏联的帕列赫）的村子也在可怕的赤贫中苟且度日。波德沃利斯基曾到过那儿，他说：“我是顿巴斯矿工的儿子、孙子和曾孙，我在赤贫中长大。但没有见过任何类似的情况。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因为一盒火柴要换一只鸡，所以全村只有一户人家有火（点着油灯芯），所有其余人家的火都取自这一家。政府年年关闭数百所学校。已敢于公开宣称：“没有教育能活，但没有军队不能活。”发生过一

件真正丢脸的事,当时华沙一个主要的科学基金会没有经费,不得不向苏联求助,指望苏联能慷慨相助。基金会领导人波托茨基革命前是俄国大地主,后来移居波兰,失去了所有的钱财和股票,它们落到了苏维埃手中。这个苏联的公开敌人不得不羞红着脸来找波德沃利斯基,恳求他要求苏联政府补偿股票的价值。在对波托茨基来说有损尊严的情况下,苏联政府同意满足他的要求。可是,波兰报刊只字不提这件事。波德沃利斯基谈到波兰作家的性格不够坚定,他们在私人交谈中所说的意见与在自己的书籍和文章中所说的截然不同。所以,他们不受尊重。在这儿,只看重将军或政府成员,作家和学者不在考虑之列。

(我注意到,当波兰作家代表团昨晚在华沙车站等候我时,他们尚不知道我写给斯大林的信。苏联报纸是夜里到的。波兰作家立即不见了踪影。第二天早上,华沙报纸只字不提我出现在波兰。)

波德沃利斯基陪同玛莎参观商店,并与我们以及克留奇科夫共进早餐。他叙述了自己在日本逗留时的情况。百万富翁野间丰开始出版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五年计划等。而且,这种书籍出售了数十万册;在一所大学,一天之内有9名政治经济学教授被捕,因为他们购买和讨论马克思的《资本论》。但没有人动野间丰,要知道他是制度的柱石之一。当波德沃利斯基问他,为什么要出版这样的图书时,野间丰十分坦率地回答:“因为这是有利可图的事情。再把苏联图书交给我,我仍将出版它们!”至于结果,野间丰对此并不感到担心。今后会清楚的!作为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波德沃利斯基有机会接近没有一个日本人敢于看上一眼的天皇。在天皇接见他的那一天,日本朋友们拉住他的手,十分赞赏地看着它:“这只手接触过天皇

的双手!”

在吃早饭时,巴比塞在小巧的女秘书和某个年轻波兰女人*的陪伴下走进餐厅。他是去莫斯科^[250]。他从巴黎出发经由维也纳来到这儿,因为经过德国的路线很危险(最近爆发出猛烈而放肆的反犹太主义情绪)。他看上去很好,我从未见过他这副样子,不再抽烟。由于7月14日在巴黎举行的强大的反法西斯示威游行,他浑身散发出喜悦的光芒。波德沃利斯基向我耳语说,有一次,他曾带着巴比塞开车兜风,但永远不会再这么做,因为巴比塞在兜风时举起握紧的拳头并高呼口号,这败坏了他的名声。

晚上,波德沃利斯基开车带我们游玩了一个半小时。我们再次参观了古老的街区、犹太人区、普拉加区——维斯瓦河对岸的工人街区。波德沃利斯基说,在波兰,犹太人投票赞成现政权,因为害怕另外的政府将更糟。但半数共产党人是犹太人。他谈到波兰的执政者,谈到虽然聪明但仿效上校习惯的贝克^[251]——除了侦探小说,什么都不读(并以此自豪)。毕苏斯基以其不可思议的粗鲁话定了调子。他不说一连串粗鲁的俏皮话和猥亵的丘八笑话,就说不成一句话。整个军官团努力仿效他;他们引为自豪的是,在自己的节日酒宴上和狂饮时,俄罗斯旧军队的传统继续存在:打碎镜子和碗碟,与吉卜赛女人一起酗酒。

与克留奇科夫共进午餐。在少许的慌乱之后,他终于决定

* 这个波兰女人,玛丽亚·沙任,按职业是钢琴家,后来写信给我,激动地回忆起这个日子。她写道,巴比塞在我们意外相遇后喜形于色,后来不断地回忆这次会见。

说说自己的生平(看外表他是一个坚强而孤僻的人,可是,正如与他交往甚密的人们所说的,非常善良、极其刚毅、认真和热忱)。他是一个在乌拉尔发现铂矿的默默无闻的工程师的儿子,最初也在那儿工作了两年。然后,他对此感到厌烦,便开始在法律系学习。他刚刚通过考试,这时尤登尼奇^[252]成了局势的主人。埃尔米塔日博物馆^[253]以及其他博物馆的保管员们前来对他声称:他们已在彼此之间分配好准备在尤登尼奇胜利后担任的职务。他撵走了他们,说:“如果我现在把你们的狂妄行为报告布尔什维克党,那会怎样?”他与共产党的关系非常密切,但我始终不明白,这是怎么发生的。

他被派往国外出差。某个时期他领导苏联在柏林的“书籍”出版社。但是,他不想成为党的成员,虽然他是比许多共产党员更优秀的共产党人。他说,一旦成为党员,他将觉得自己比他所希望的更受约束;也许,他想保持自己与高尔基的亲密关系,如果经常不得不对党报告工作,他就可能丧失这种权利。他说:“况且,如今做一个共产党员已不是什么功绩。如果明天发生战争(虽然共产党员应该站在最前列),我们都将上前线。”第一次婚姻留给他一个儿子,儿子在20岁时死去。第二次婚姻留给他一个四五岁的男孩。

他从1918年起认识高尔基。高尔基那时正患病,被所有的人扔下不管,孤立无援。克留奇科夫献身于他。可以说,他为了高尔基而牺牲了自己的一生。所有寄给高尔基的信件都得经过他的双手。可以设想,克留奇科夫阅读和挑选信件,同时感到良心的强烈谴责,但即便情况如此,完全委托克留奇科夫挑选信件,剔除那些看来没有用处或者纠缠不休的信件,这仍是危险的。他以同样的方式挑选来访者。因此,他招致许多怀疑和仇

恨。他也知道这一点。他说,在白卫军的报纸上,高尔基被描绘成老糊涂了,在某个管辖一群“匪帮式”秘书的克留奇科夫控制下,成了自己家中靠喝粥为生的囚徒,而且,这个克留奇科夫把自己不喜欢的人送到索洛夫基去。

在我客居过的那幢非常好的郊外住宅里住下之前,高尔基住在树林中一栋很小和很不方便的房子中。国家领导人(斯大林和其他人)前来看望他,对他的住所感到气愤,并希望他搬到别墅去住。高尔基很不乐意这么做。来到别墅,高尔基说:“应该把这儿变成学校或者医院。”可是,后来经常用于接待来自苏联各地的代表团,房子就显得不那么大了。克留奇科夫承担了以前由拉德日尼科夫^[254]履行的秘书责任,后者是高尔基以前的出版人,现在成了他的第二秘书。克留奇科夫从来不记录自己与高尔基的谈话:他注意到,高尔基不喜欢这么做。“但是,”他补充说(或许带有几分针对我的诡诈),“我能检查其他人的笔记。”

他没有好感地评论托尔斯泰主义者,尤其是切尔特科夫,但对不得罪人的比留科夫^[255]也持这样的看法,这使他在眼中失去了对他所说的东西的相当大一部分信任。

他对许多事情的评价比党的领导人更严厉。

7月24日 星期三

7点30分从华沙动身。克留奇科夫、波德沃利斯基和尼古拉耶夫帮助我们登上车厢。车站月台上挤满黑压压一大群身穿很长的常礼服、留着胡子的犹太人,他们不停地走动,互相推挤,绊得跌跌撞撞,像兔子一样从列车的最后几节车厢跳下,抓住车

厢台阶往上爬,被推下10次再往上爬,一溜而入,在列车的通道上和走廊里挤来挤去。他们是来与神圣的“长老”告别。在到达边境前的每一个车站,都有同样的绊得跌跌撞撞的人群。波德沃利斯基告诉我们,在离华沙几利约^[256]的地方,有“长老们”的宫殿,他们拥有真正的宫廷和数百名仆人。下一次我们去那儿看看他们。

与苏联朋友告别。现在,将有许多个星期听不到来自他们的新消息。将听不到来自苏联、来自许多苏联记者的几乎任何声音。就像在两个世界之间耸立着一堵墙。

捷克斯洛伐克,金色的平原。田野,一望无际的田野。

这就到了本次旅行的终点——维也纳是悲哀的不眠之夜。当我们在晚上9点左右到达那儿时,房屋的窗户(以及“大都会”旅馆我们的房间的窗户)都亮着灯光。明天是陶尔斐斯⁽²⁵⁷⁾首相被害一周年。

7月25日 星期四

在维也纳度过一天。休息。街上走着参加追祭亡灵仪式的行列。大部分聚集的人是小资产者,但也有很多工人(被迫或自愿前来),他们站在写有自己公司名称的标语牌周围。他们的外表是苦闷无聊的,远不是高傲的,他们都皱着眉头。女人们发出笑声。在格拉本街上方,一队飞机在空中掠过。房屋的墙上挂着黑旗。热得使人受不了。

7月26日 星期五

早晨8点动身前往苏黎世。在车站,苏联大使(就像是地方长官助理)和大使馆的几名工作人员前来告别。苏联国际旅行社通过莫斯科和华沙驻巴黎的机构办理我们的车票和行李。在蒂罗尔,下起了大雷雨。在布克,愚蠢的海关关员随手在我们从莫斯科带来的所有东西中挑出一个极不值钱的花瓶和一些照片,对它们征税。晚上10点半到达苏黎世。在终于结束了长久的旅行之后,躺在“阿比·罗亚利”旅馆舒适的床上,这是多大的享受。

7月27日 星期六

在苏黎世度过一天。休息。早晨,黑默利医生来到我这儿,弄清楚苏联同行的处方。第一个与妹妹通电话。在海关,收到了未经检查直接从莫斯科运到苏黎世的行李。

7月28日 星期日

1点30分动身去维勒讷沃。6点半左右回到自己的家。酷热。这儿已有整整一个月没有下雨。我几乎不感到疲劳。我惊奇地发现,自我感觉非常好。

向高尔基和“保姆”发了平安到达的电报。

在我们带来的文件中,有一捆从苏联各个角落寄给我并在动身前夜通过《真理报》转交的信件:这些信件是我们在莫斯科得到的接待的余音,将使我们经受的情感延续很多个星期。

附 记^[258]

8月25日,最终完成对日记的校对。

在莫斯科逗留了一个月,但这并未使我有权发表关于苏联的根据充分的见解。只能坦率地说说自己的印象,而我已在上述文中这么做了。现在尝试作一些总结——虽然印象完全是新鲜的,但已经有了距离,而这段距离对充分理解这些印象来说是必需的。

首先应该指出,与其他外国旅行者相比,我有许多优越条件。我能接近苏联的主要政治领导人和苏联新知识分子的主要代表。他们对待我就像对待朋友一样,信任地与我交谈。同时,我享有最好的翻译——我的妻子——的在场和经常帮助,多亏她,语言的障碍几乎不存在;她的灵活智慧与在苏联的长期生活经验相结合,帮助我更接近地认识人们和更迅速地了解事情的进程。当然,她是有所偏袒的,毫无例外地发表有利于革命的意见。但与此同时,她对任何不公正的表现非常敏感;我高兴地看到,她不止一次抨击制度造成的错误和痛苦,而且,在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同时,强烈希望改正这些错误。最后,我听到了(我善于从半吞半吐的话中理解)服从制度、但不同情制度的人们的公开承认,由于出身、社会环境和精神气质,他们与这种制度是格格不入的,内心是敌视它的。因此,我的观点是在十分有利的条件下形成的。

我从这次旅行中得出的主要印象与感觉到无边高涨的生命

力和青春活力的强大浪潮有关；高兴地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为成就而自豪，真诚地信任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这是成千上万、甚至千百万苏联男女所体验到的情感。证明这一点的是类似6月30日盛大庆祝游行那样的、显示人民强大和幸福的全民示威游行，是我在高尔基那儿接待的民族代表团和工人代表团所显示的齐心协力，尤其是从全国各个角落——从工厂、集体农庄、军队等地寄给我的信件。不可能相信，这种齐心协力是由上面的某种指示指使的：这种齐心协力在每封信中都是直接的和独特的，过于鲜明和纯正，往往是激动人心的。倒不如假定，所有的人都处在集体狂热的影响之下——期望、快乐和信心的狂热，狂热地确信他们在世界上为之效力的事业的正确和宏伟。在历史上，这被称为“成功时刻”——人民最充分地经受自己命运的时刻。在世界历史上，每一个新时代都是由这种时刻开创的。必需的只是最终的胜利。这将由未来决定。暂时有的是现在。一切已确立的胜利都体现在现在。

双手服从大脑——共产党及其人民委员会。这是可靠的大脑，而且，它可靠地架在肩膀之上。我与之交谈过的领导人不仅是具有坚定而灵活的头脑和刚强毅力的人，而且相信社会团结的可能性。个人情感在这儿没有任何地位，也包括合乎人情的情感——自尊心、贪权（也许，后来我将接触到这一点）。依我看，组成他们的气质和活动的本质的，是对学说的不可动摇的信仰*，这种学说大概就像《圣经》一样，包罗全部人类问题，但使知识服从于社会活动。如果这种信仰的本质不是“辩证法”，不

* 我在这儿说的是第一代苏联领导人，列宁的同时代人和战友。他们仍在掌权。

负有适应处在发展中的生活的不断变化的使命,那么,就像大多数其他宗教信仰所发生的那样,就有群众消极地附和这种信仰的危险。所以,不如说这种信仰类似高潮时期的伟大科学假设,这时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建立的体系无往不胜地符合一切实际经验资料,并开辟新的试验途径。在这种高潮时期,假设具有对自己的正确性的坚定信念,同时仍然十分灵活(就像所有不久前出现的宗教信仰,充满生气和对自己的指路星的信心,以便进行思索),十分易于变化,以便在必要时改变自己的策略。绝对的,同时又与相对性一致,伟大的相对性规律(由马克思比爱因斯坦早四分之三个世纪发现)支配着时代精神。这些观察结果可能越出了在这儿所讨论的题目的范围,我试图表达对自己与莫斯科接触的印象,所以应该揭示我所接触(或作为榜样)的人们的天性本身,揭示已形成的他们所特有的性格。我发现,作为所有主要领导人的道德感觉的基础的,是上述这种信仰,以及始终不渝地努力为这种信仰服务,同时确信,无论有还是没有他们,但这种信仰反正将获得胜利。甚至最“自私地”关心胜利的人们(那些倾向于把自己个人的事业与自己所信仰的事业混为一谈的人们),也在本质上具有炽热的无私心,与被利己主义和对罗马式荣耀的渴望所毒害的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领导人相比,这种无私心形成主要的差别和巨大的优势。例如,墨索里尼只是为了自己的纪念碑而工作和战斗。今天是权力,而死后是青铜雕像。被他送人灾难的人民的极端贫困对他来说完全是无关紧要的。甚至他的事业的未来对他来说也是无所谓的:他不力求自己有继承人,而且,他的极大的自尊心或许在这一点上找到了痛苦的满足。因此,不样的伟大和他一心想谋取的荣耀乃是他所特有的强烈的悲观主义和空虚精神的基础。斯大林及其伟大的

布尔什维克朋友们充满乐观主义——当然，没有幻想，但也没有恐惧：要知道，他们正在为全人类更美的、最好的、灿烂的未来而工作，而且，他们的马克思主义基本信条在证明人类发展规律的无可争辩性的同时，使他们相信这种未来的不可避免性，他们正在遵照这种规律行动，他们自身就是这种规律的表现。罕见的离奇现象是：他们的宇宙建立在唯物主义物力论的基础之上，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在唯物主义物力论上运动的，而唯物主义物力论的不可违背性不可避免地导致公正和泛人道主义的理想——人类一切梦想中最不切实际的梦想的实现。他们自称是现实主义者，因为打算实现这种梦想。而且不惜一切手段。可是，他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如果在他们身上没有燃烧着隐藏在盔甲下面的理想主义火焰，这种理想主义有时是乌托邦式的和感伤主义的，让·雅克·卢梭式的。我惊奇地在他们中许多人的身上发现了这种火焰，而且，尤其是在预料最不可能找到这种火焰的人们身上发现了它（富歇式的人物亚戈达及其严肃的助手们）。

这是一种促使行动的伟大力量。全部问题在于，为了马克思主义命运的胜利，去激励革命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无产阶级乃是马克思主义命运的杰出英雄。毫无疑问，这个目的是实现了——由于各种层次的孜孜不倦的教育、每天和每分钟的宣传、报纸、演讲、庆祝活动和示威游行，由于五年计划的不断推行、为劳动者和劳动集体设立的永久的竞赛和竞争，由于激发自尊和力量的极其巧妙的劳动刺激因素（奖励，悬挂肖像，英雄称号，在专用榜牌上公布最优者和最差者的姓名），最后，由于使全体人民具有信仰，并用自尊和自愿牺牲的狂热感染全体人民。

可是，成果的获得（成果是有的，这一点对千百万人来说

没有疑问的)并非没有众所周知的和严重的损失。甚至高尔基也当着我的面对正在蜕化成虚荣心的自尊感的滥用表示可惜,仅仅意识到正当地完成了职责,已足以使工人们保持这种自尊心。此外,不仅他们的个人自尊或者工作自尊,而且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过分低估其他民族的生命力。即使资本主义的政府和制度是他们的敌人,也不能低估它们的生存力。千百万正直的苏联劳动者坚信,他们拥有并且亲自创造了一切最美好的东西,而其余的世界丧失了这些美好的东西(学校、卫生设施等)。青年不可能自由地将自己的智力成就和思想与他们的西方朋友的成就相比较。真担心有朝一日突然发生这样的事,就会产生动荡。

目前是有成果的。苏联总参谋部拥有非常好的劳动大军,人数众多,强壮有力,恪守纪律,受到对自己的使命、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政府的坚定信念的鼓舞。“我们完全信任我们的青年和我们的生活,”许多寄信人对我这样写道。而且,谁也不担心,一旦第一代革命家逝世,大军会失去领导人。已能看到明天的指挥员的幼苗:我发现了其中的一些。而且,对法西斯主义的又一种重要优势也表现在这一点上,法西斯主义不关心自己的后继者:法西斯主义一下子消耗掉所有东西。苏联建设计划的巨大规模——这是运用许多代人力量的极好天地;正在拥有几乎是无限矿藏的苏联大地上诞生的富足的未来,因对这种未来的期望而产生的热忱——这一切促进了年轻领导人的热情,培养年轻领导人的是严肃的经验学校本身、建设工程和工人们。第

一流的领导人正从工人中脱颖而出,对他们来说,不仅技术,而且工人群众的精神状态都不是什么秘密。他们正在学习管理*。因此,不必担心,经过足够长的一段时间,防线可能动摇。

但这还不是全部。防线——无论它的人数多么多,作用多么大——只是人山人海,只是一支大军。还必须像克伦威尔^[259]那样,拥有“铁甲军”,以便抵挡变化不定的众多敌人,即一大批不怀好意的国家——在17年的漫长时间里,经受住社会性战争(尚未结束)和敌视苏维埃政权的政府所强加的残酷的、经常的和繁重的考验。精心选择的政党对千百万非党人士的不屈不挠的专政是需要的。非党人士或许比敌人更危险,因为不能确定他们的准确人数(关于这一点我问过布哈林,但他的回答虽然是乐观的,却是含糊的)。专政依然存在,但企图伪装起来(想方设法不让我见到它),并许诺在更自由的新宪法条件下,将变得更温和。我不能谴责专政(只能因为它努力伪装起来而谴责它),因为危险仍存在。考验时期尚未结束——考验的次数正在逐年减少,但困难仍是实质性的,干瘪的母牛仍是干瘪的;在莫斯科,物质生活(工资、食物、住房)依然非常困难;在列宁格勒和苏联其他地区,物质生活大概更折磨人。我想补充的是,令人震惊的农民战争仍记忆犹新,很难指望既定的世界能够深入人心。拉狄克认为(完全是正确的),应该经过几年时间,才能使农民彻底相信,苏联可能受到威胁,但苏联会用鲜血捍卫他们的利益。我毫不怀疑这一点;我得以完成的仓促询问使我信服,但是,另一方面,城市中被取代的阶级和破了产的资产阶级的迫不

* 使我赞叹不已的是,通常责成他们在两三年时间内在各种管理领域——政治的、经济的和技术的——见习。

得已的沉默包含着强烈的仇恨。而且,无论是已被压死的毒蛇——反对派(托洛茨基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等)的残余,还是对沙俄残余卑躬屈膝的虚假资本主义的蟒蛇,都没有放弃其由仇恨激起的反对已获胜的苏联的斗争。他们的仇恨反而变得更强烈,而且,由反对共产主义领导人的希特勒分子、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人和波兰人不断密派的凶手匪帮正从这种仇恨中吸取力量。所以,“铁甲军”一分钟都不能削弱警惕性,卸下战斗的盔甲。

这正是大量军事检阅的原因所在,领导人在检阅时大受颂扬。这也是在所有发言的开场白及其语调中对领导人大加赞扬的原因所在。这是常备不懈的警惕性的原因所在,这种警惕性有时使日常生活败兴,有时粗暴地匆匆把嫌疑者当作已经定罪的罪犯。还有其他许多不公正的表现,包括把不信任转移到儿童身上,而这种不信任或许是他们的父辈或者他们根据出身所属的阶级所应得的:不允许他们获得任何岗位,甚至是为成人活动作准备的学校中的岗位。因此,正在不人道地形成贱民阶级。必须承认这一切,只能对此感到可惜,只能纠正和根除——但无论如何不能不理解这一切。这是“战时状态”。这是“戒严状态”。虽然连布哈林都不喜欢这种说法,我仍坚持这种说法,以便证明我们的苏联共产党人朋友们的无辜,也因为这是有些人咬定不承认的实情。滥用权力是由情势(和事实)的逻辑所引起的。

但是,没有理由、也不该有理由认为,保卫国家的伟大的共产主义军队及其领导人正在冒险变成特殊阶级,而且,比什么都严重的是,变成特权阶级。组成国家精华的精英人物不应该脱离国家,因为精英人物的真正作用就在于养活国家,与国家融为

一体。精英人物不应该为自己攫取荣誉、福利和金钱的特权。从总体上说,对这一点看来是注意的,至少注意不出现金钱特权。布尔什维克党的成员所获得的最高工资,少于有功劳的非党劳动者有望获得的最高工资。可是,不必被这种分配所迷惑,因为它很容易被绕过。共产党的活跃成员利用其他特权(住房、食物、交通工具等)代替金钱,这些特权确保他们能过上舒适生活并拥有特殊地位。更不用说影响,他们利用影响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谋利益。而且,怎么能不利用影响呢?像列宁和捷尔任斯基这样的人天生具有古罗马人的性格(我觉得,斯大林似乎也能仿效他们的榜样,但实际上他没有仿效这种榜样),这些伟大的法律服务者拒绝一切会使他们凌驾于普通公民之上的物质特权(甚至最伟大的人也能与最不富裕的人保持平等)。可是,除了他们,不受任何良心谴责的人又有多少!有谁会普遍困难中的享受机会作为自己的过错?!这太“合乎人性”了!此外,这实在是俄国人的弱点!俄国人喜欢铺张浪费。只是在他一无所有时,他才安分守己。但倘若他有点什么,他就会挥霍无度。波德沃利斯基在华沙对我们承认,要是他有钱,他不可能不乱花*。像高尔基这样善良和宽厚的人,也在吃饭时(虽然自己难得碰一下吃的东西)浪费够许多家庭吃的食物,不知不觉地过着封建领主的生活方式(而且并不因此感到任何享受——对他来说,最大的快乐是伏尔加河上的搬运工工作!)。我不了解他的上层布尔什维克朋友们的生活。但我以为,他认为自己的生活

-
- * 按他的说法,早在他当司机时,他就是这样的人。现在,作为大使的顾问,他仍是这样的人。他承认,他的大使馆的接待费用大大高于其他大使馆的接待开支,但他觉得钱仍不够花。

是较好的,并将这种生活归功于他们。当然,与那些轻易地赚取和花费巨款的作家相比(就像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他百倍地应该得到这种生活,这种生活对他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当之无愧的。我选取的例子不是来自真正的共产党员、政治领导人的生活,而是来自宫廷知识分子的生活:我没有机会总结自己的观察结果。可是,了解下述这一点就已足够:宫廷中的上层达官显贵(即使应该得到这种恩赐)过着特权阶级的生活,但人民却仍然不得不为了谋取面包和空气(我想说的是住房)而进行艰苦的斗争。而且,这一切的发生是为了证明革命的胜利,可革命的首要目的却是确立劳动者的平等,形成统一的阶级。我深信,我在纸上叙述的想法早已记在那些没有特权的人们的心里。在我们的汽车驶过的城郊公路上,我从铺浇柏油的农民和工人的眼睛中看出了这种想法。

最近(1935年8月),在马努伊尔斯基^[260]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了对共产党来说的双重危险:过于独立于国家,不遵守自己的十分严格的道德纪律。斯大林立即抓住了目前需要的东西,亲自把方向盘转向所需的方向。他开始在党的面前坚持“非党布尔什维克”的功绩和权利:他由此巩固了党与人民之间的危险的紧张的关系,缓和了紧张状态。固执的马努伊尔斯基也补充说,“对共产党员,对群众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共产党员履行自己的精神的和道德的职责,从而使他们掌握的政权具有应有的力量。

* 幸运的是,说到享有特权的作家、人民群众与有学问的读者青年一样,对此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天真地景仰那些写书的人,认为他们天生享有特权,并无止境地钦佩他们。

他说：“为了在这一大批非党布尔什维克身上具有威信，共产党员应该提供更高的指标，无论是自己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指标，自己的思想政治水平指标，还是掌握所承担的工作的技术程度的指标……无产阶级民主的扩大使共产党员的脱离群众、官僚主义和高官傲气受到全力打击……”但是，共产党员不可能在群众中为克服这些残余而斗争，如果他本身不能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在自己与周围环境的所有关系中，用本人的例子证明，这些残余已被他克服，或者正在顺利克服之中。因此，我们的党对自己所有成员的坚定不移的严格要求，指的是他们内在的道德政治面貌。这不是萨伏那洛拉^[261]的毫无意义的基督教禁欲主义。这是为造就社会主义的、摆脱资本主义社会不道德遗产的人而斗争！”

从语气来说，这番话有时使人想起罗伯斯比尔^[262]的训导，而且，毫无疑问出自斯大林和党的领导人的手笔（马努伊尔斯基只是复述了一番），非常准确地确定了目前的危险，并猛烈地抨击了这种危险。可是，这番话是否足以消灭这种危险？我感到怀疑：对享有特权的政党来说，这种危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党的统治显得有保障，来自敌人方面的威胁不再那么明显，危险立即就会产生。而且，即使假定建立了党的领导人所要求的严格的道德纪律，这是否会导致党将不再有别于其余部分的居民？我推测，情况将相反，党将更加与众不同。要知道，党获得了最高权力集团的权利。而且，对党自身来说，可能不知不觉地形成由久经考验的领导人、忠于党的技术工作者、各种先进生

* 看来，党的明智的领导人以锐利的目光抓住了我也写过的那些危险：“脱离群众，帮派习气。”

产者、以及工人大军、集体农庄庄员大军和士兵大军的精英人物组成的特殊的共产主义特权阶层*。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不会大肆宣扬革命的失败。我从不认为,革命能够一下子、立即实现人类兄弟般的团结和无阶级的社会。每一次革命(而且,这应该不是最后一次,否则人类就会停止前进),每一次革命——这都是在通向伟大理想的道路上被征服的一个阶段。苏联革命可能成为人类社会在通向这个目标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大一步。对苏联革命的荣耀来说,这已足够。每一步都与军队总参谋部的改组和扩大有关。1789年,成为军队总参谋部的是第三等级^[263]。今天是第四等级:劳动人民的中枢。目前这已足够。不过,无论今后将发生什么,将始终需要管理人类巨大躯体的中枢。

所以,事情的这种转折并不过于使我感到不安,只要这种转折不拖延一代或两代人以上,万不得已时不超过三代人——在伟大的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的参加者们的英雄主义和自尊感、以及与他们不可分割的责任仍存在之前。

苏联的民族主义同样没有引起我的严重忧虑。尽管在群众中得到支持的公民自豪感的温度很高,国际主义仍是他们对生活的理解的本质^{**}:我在收到质朴的信件的同时,能够确信这一点。在这些信件中,激发苏联公民自豪感的理由多半是,苏联人

* 我不想在这儿把很大的注意力分给正在重新形成的新“贵族”阶层,例如,像我已写到的“知名的集体农庄庄员舒利金家庭”。我只是指出奖励分配的性质。但事实本身——甚至用词本身——是如此富有表现力,说明这已是象征性的。

** 斯大林的头脑比托洛茨基的头脑更能保持平衡,并且更接近人民的合理看法,所以他能使对自己国家的公正而健康的爱与国际主义结合在一起。

不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祖国的利益而劳动,而且关心全球人民的幸福,正在努力实现这种幸福。我在前面已引用过马努伊尔斯基的发言的片断,在他的发言中,对苏联人的这种职责也给以特别的注意:

“……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报刊,我们的艺术,我们的整个国家机关,都应该为人们的社会主义再教育服务,这种再教育与将国际无产阶级团结的责任灌输到我们人民的意识中去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我们的党以及苏维埃国家的劳动者们始终认为,自己对世界无产阶级的职责高于一切,而现在,当世界正在接近革命和战争的第二阶段的时候,当‘谁战胜谁’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被非常尖锐地提出的时候,他们尤其高度珍视这种职责。”

满怀这种职责的意识可能导致解放战争——争取全球被压迫兄弟独立的战争,类似于被横征暴敛的“督政府”^[264]和波拿巴主义^[265]用于自己目的的法国大革命战争。但任何活动都可能变得危险,更危险的是无所事事。显然,警惕性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将永远是必需的。但每一天都有自己的忙碌和自己的困难!现在我能证实,无论是苏联领导人,还是苏联人民,都不希望战争,相反,他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为了实施大规模的建设性工作,完成自己的使命——在全人类面前建造第一幢社会主义的宏伟大厦,和平对苏联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胜利来自榜样,而不是来自武器。至于榜样,还需要多少时间,世界才能确信苏联的胜利!正在变成巨大建筑工地的苏联还需要20至40年时间增强自己的全部力量。这是第二个美国,但比面临移民浪潮的美国更辽阔和更富裕。至少还有半个世纪,苏联领导人和群众的力量和思想无暇他顾。在没有舵也没有帆地向任何冒

险事业疾驰的疯狂世界上，专心于酿蜜的庞大的苏联蜂群呈现出令人快慰的情景。

我深信，苏联永远不会首先发动进攻。必须具有像多嘴多舌的拉狄克那样的惊慌而混乱的头脑，才会轻率地谈论掌握“军事主动权”的必要性。

至于国防，在这方面他们常备不懈！谁进攻苏联，谁就倒霉！侵略会造成必需的团结。我在高尔基那儿见到的柔弱的女跳伞员们，是多么愉快而热情地谈论像活炸弹一样从空中落到敌人身上的可能性！不必征召志愿兵。志愿兵将源源不断地蜂拥而至。而且，红军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是兵营，红军是人民之家，为人民的自决服务，把快乐和自豪送给人民，在人民中激起感谢已完成的革命的情感——革命对人民来说是第二次出生。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都不会得到更热情的保卫。

仍然存在政治活动家们结盟（故意的或者偶然的）、即发生防御战争和侵略战争的普通风险。1914年的例子证明，人民很少能分清这两种战争之间的界限。今天发动进攻的人，明天可能说是进行自卫（难道墨索里尼在猛烈攻击埃塞俄比亚后，没有这么说？）。显然，在某些情况下，审慎的政治家会把先发制人的战争冒充为防御战争。如果有证据表明，明天希特勒准备进攻苏联，谁能担保，苏联在预先知道这一点后，今天不会对他发动战争？

法国社会舆论对不久前法国与苏联人之间缔结的协定以及根据协定产生的责任感到不安，我能理解法国舆论的疑虑。可是，出于恐惧感而保持“辉煌的孤独”会更危险，即使只是像我们的某些朋友那样（例如不负责任的和平主义者米歇尔和让娜·亚历山大），对希特勒的许诺不抱毫无根据的信任。

我认为,在欧洲当代形势下,法国和苏联之间的互助协定是必要的。在法国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圈子中,正在扩散一种纷争,涉及的是斯大林的所谓的放弃(或者,更糟的是,歪曲)共产主义原则,因为他似乎赞同法国的民族主义。在与斯大林交谈以后,我承认,我难于理解这种纷争。斯大林的政策在我看来是正确的,合理的,忠于列宁的传统。这种政策是根据时机的需要有步骤地实行的。今天它致力于反对法西斯主义,因为这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明天它将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和虚假的自由主义制度。他们不隐瞒这一点。可是,苏联准备帮助法兰西共和国,如果法国受到德国侵犯;苏联也期待法国的帮助,如果自身成为攻击的牺牲品。党的表现是正直的。让法国自己决定,法国是愿意获胜还是愿意打输。我想,处于孤立地位,法国多半会打败仗,虽然如果苏联因为这个协定而获胜,资本主义民主就会丧失。我正是对此抱有希望。

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8月20日通过的最后决议中,今天共产国际对待民族主义的态度已得到确定。在决议中能明显地感觉到斯大林的影响。

在揭露“沙文主义”是“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主要的、最危险的形式”之后,大会向群众指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保护全民族利益的借口下,正在实行压迫和剥削自己人民以及掠夺和奴役其他民族的自私的阶级政策”。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不同,“工人阶级正在为反对一切奴役和民族压迫而进行斗争,是唯一真正的争取民族自由和人民独立的斗士……大会警告,反对一切对民族独立问题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民族感情的轻视态度,这种态度使法西斯主义便于开展它的沙文主义法西斯运动(萨尔^[266],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地区等)……共产党人是各种形

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毫不妥协的主要敌人,同时决不是轻蔑地对待自己人民命运的民族虚无主义的拥护者。”毫无疑问,是近几年的可悲经验促使共产党人采取这种立场。法西斯主义在近几年利用民族感情进行反对他们的斗争。但是,这种立场也符合像格鲁吉亚人斯大林那样的领导人的天性。斯大林比托洛茨基在更大程度上保持了与自己的独特民族的联系。所以,他寻找并找到了既满足民族共同体的合理需要、同时又尊重重要国际共同体的最大权利的决定。这有助于不仅保持,而且激发各加盟共和国的丰富多采的智慧力量和创造力量。任何外来政权都不可能造成这样的高潮。

我希望能原谅这些笔记的不连贯、加括号以及不流畅的和不经心的笔法。在审订它们时,我经常被打断,尤其在最后 15 至 20 页——从巴比塞去世时起^[267]。不能想象,许许多多的职责和请求是如何不停地加到我的身上的:信件、电报、来访、草拟邀请书和信件。有时我一天往往写不了五六行字,一个句子写到一半就不得不搁下。在这种情况下,又怎么能连贯地发挥思绪,注意表达的准确性?

我还想在这儿说明自己对一些最重要人物的性格的印象——画出我所认识的并有机会观察的几个人的心理肖像:斯大林,高尔基,亚戈达。当然,我不会自以为能说出他们的性格的本质——我们连自身的本质都不知道——但将努力说明我已看出的东西。

依我看,斯大林能在自己的性格中做到令人惊讶的平衡:力量和灵活,自我控制和控制形势。也许,有时强烈感情的力

量会使他失去自制力，就在不久前，在谈到基洛夫被害时，他自己承认过这一点：“放纵情感”有害于健全的政治思考力。虽然他有勇气承认这一点，代价已太大；不过，即使在这种场合，他大概也丝毫不会回避必须做的事情，不仅听从于感情，而且关注国家利益。另一个例子证明，他是多么善于控制自己。他非常爱自己的妻子，大家都这么说，他们的结合是牢固的和幸福的，出自深深的爱情。去年，他的妻子在神秘的情况下突然死去，在莫斯科，有人偷偷地对我们说过当时的情况。利季娅（共产党员）对玛莎说，斯大林的妻子对她信任的乌克兰阴谋分子被判死刑感到震惊，加之不得不参与谴责他们，故而服毒自杀了。高尔基没有推心置腹地与我谈过这个悲剧，也没有告诉我任何细节，只是说，对斯大林来说，妻子的死是意外的灾难。但在斯大林的脸上，没有任何灾难的迹象（从近几年的照片看来，只是变老了），他愉快地与人交往，与伏罗希洛夫在一起时笑得像个顽童。他把与他个人有关的事情埋藏在心底。当事情不仅涉及他个人，而且涉及国家时，他用第三人称谈论自己，就像在说某个不相干的人。当他暗示某个图书馆馆员企图杀害领导人之一时，如果其他人不对我们说这件事，我们永远也不会想到，他在说他自己。在一幅幅照片上，他的传奇式的微笑是一成不变的，但同时永远不显得是呆滞的。很难理解这种微笑：不能说它表示的是思想在不动声色地休息时的镇定心情；在他的保留地中没有任何弱点，甚至看不出接缝。这种笑容既适合于友好的或者嘲讽的交谈，也同样适合于斗争。有些人在这种微笑中看出狡诈。我看不出这一点。他的头脑在研究您的同时，始终是警惕的，甚至在他埋头于文件时；可是，他行动起来似乎是直截了当的：走自己的路，坚

定，谨慎，坦诚，有点吃力，总是径直走，不绕圈子；夸夸其谈不是他的事；他的外交手腕不懂绕道和恭维，这种外交手腕是一个人的刚强而健康的头脑的体现，这个人善于在必要时变得客气，条件是这种客气不能拖延得太久，但是，只是在他能够直截了当地作出说明时，他才会感到心情舒畅，给自己的严厉态度增添玩笑和戏言。在我看来，这个人天生具有坚强而健康的头脑、谨慎的果敢精神、毅力和冷静，我会把这种冷静称为难以忍受的。至于勇气，关于这一点连提也不必提；当说的是这样的人时，勇气是不言而喻的，是与他们不可分割的。他所说的一切在我看来都不是虚假的。我不准备怀疑他的话。他的力量在于，他不怕说出（至少对其意图已为他所知的人）所想的東西，并不试图掩饰自己的想法，或者掩盖这些想法（例如，像亚戈达那样）。此外，他不怕（而这是最困难的）说，“也许他错了”。并不刻意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美化事实。不断地观察和研究实际情况——变化中的实际情况。但最令人惊讶的是，这种不断的观察虽然包含错误和疑问的可能，却丝毫没有妨碍和削弱他的决策和行动的能力。有一次他顺便对我们说，即使情势已显得没有希望，也永远不能就此罢手。他补充说：“当莫斯科被敌军团团围困住时，敌军离我们只有几小时的路程（在斯摩棱斯克），我们仍继续进行建设未来世界的工作。在劫难逃，迟早是那么一回事。只有继续自己的工作。”他是非常走运的：他有机会经历革命的所有阶段，从世纪初残酷的（几乎是无政府主义的）恐怖行动直到目前革命专断地确立自己的秩序。最大的走运在于，他的事业的最高潮是在高度赞扬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的道德价值观念的风尚已经形成、人道社会正在得到恢复和更新、充满力量和生命力的新的阶级和种族

正在出现的时候到来的。他的聪明（以及在必要时的远见）足以把伟大变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这些变革是：要求承认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对机器和机械世界的优势地位；促进党的精神，用群众精神、真正的无产阶级民主取代关门主义精神；使苏联向共产主义博爱的方向发展。因此，他正在开创自己人民历史上和全世界历史上的、众所周知是极好的新时代，而且，这个时代毫无疑问的成就完全可能在将来为他赢得新世界的奥古斯都^[268]——象征新制度的胜利的人——的荣誉。

“奥古斯都”照例受到几乎是满怀仇恨的辩驳和冷嘲热讽，辩驳和冷嘲热讽不仅来自不赞同他的见解的党内敌人，而且来自组成“安东尼^[269]—托洛茨基”近卫军的人们和“凯撒—列宁”的战士（当然，我比较的不是性格，而是为了好玩，比较相隔遥远的形势）。这是两个时代的冲突。他们不可能明白，时代已经变化，苏联共产主义的“皇帝”年龄已经到来。在自己的军团伴随下进行创造的战无不胜的成熟年龄。

是不是罗马式的6月30日凯旋游行现在使我作出这种出乎意外的比较？斯大林对我是一个谜，暂时我还不能解开这个谜：他在所有的行为和言论中都表现出自己是一个纯朴和严肃的人，讨厌赞扬。他怎么会允许在苏联出现围绕他的那种气氛，不停地对他大加颂扬？我不知道，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时，高尔基指的也许正是这一点。他忍不住说出自己对一些作家的鄙视和愤怒，他们极其丑恶和低声下气地阿谀奉承某些政治活动家，并依仗自己的阿谀奉承利用这些政治活动家。恐怕高尔基指的正是斯大林。打开任何一张苏联报纸，并阅读任何一篇文章或者在共产国际会议（或者任何其他会议——政治

的，非政治的，科学的，专门讨论医学、或体育、或艺术的等）上的发言就已足够，你总是能在文章或发言中找到最后对斯大林的过分颂扬——“我们伟大的、我们强有力的同志，我们勇敢的领导人，我们不可战胜的英雄”等。这是每一首诗歌必不可少的段落。在大街上，在游行队伍中，当着进行检阅的斯大林的面，他的无数像房屋一般巨大的画像在人群的肩膀上缓缓移动……不过，他毕竟没有达到与在他旁边走过的偶像崇拜者一起对画像欢呼的程度。有人要我相信（而且我也有这种感觉），斯大林在这种情况下都是显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但是，由于这一切已持续足够长久，在任何场合他都已应该习以为常。他的头脑中在想些什么？如果他真的感到恼火，他的一句话就足以推翻这种可笑的崇拜，把一切化为笑谈：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他的千百万追随者就会考虑，他是怎样的人。也许，正如某些人所断言的，他认为这是保持部队道德精神的手段，同时用自己的形象吸引住他们？对真诚的共产党人来说，这是极其危险的手段，它可能社会上挑起向一个人顶礼膜拜的不祥的宗教信仰。我不理解这种做法。但是（正如我已说过的），这也可以充当任何一位新莎士比亚的非常好的、精辟的心理戏剧的素材。有关这种做法已写了多少东西！我想起了尤利乌斯·凯撒，他两三次公开拒绝从安东尼手中接受皇冠，而每一次天真的罗马平民都冒失地欢迎他的姿态，引起他的羊痫风发作。不过，现时的凯撒没有理由昏厥，因为全体人民都成了递给他皇冠的安东尼。然而，凯撒完全没有必要接受皇冠，因为他归根结底拥有皇冠所体现的全部权力。这些人常常说，他们什么也没有，他们不拥有任何东西、任何别墅等，与此同时他们是国家的统治者，他们使我叹服。

我提出一个谜。如果未来不能以任何行动解开它，我不知道，历史是否将在什么时候解开它：是否能揣摩这样一个统治者的心思，他心满意足地听着源源不断的颂扬，同时又说他不喜欢阿谀和赞扬？我猜想，这就像谈论巴黎人的马萨林⁽²⁷⁰⁾：“啊！让他们埋怨吧（他们对他发出嘘声），只要交钱！”现实主义者—格鲁吉亚人—心想：“让他们夸吧，只要他们做我希望做的事！”（可是，对赞扬会习以为常，赞扬会成为催眠曲！）

注意：我刚读完巴比塞所著关于斯大林的书。最初几章相当准确地描写了斯大林的外貌以及他在克里姆林宫的住宅。读者将发现，他在童年时又瘦又小，1900年（他21岁），当叶努基泽第一次见到他时，他有“瘦削的肩膀”。1903年，他甚至患了结核病。只是在流放中，寒冷的西伯利亚冬天才治好了他。

高尔基的形象与斯大林相比形成鲜明的反差。他们在社会生活和活动中的紧密联系又是一个我正在努力识破的谜。高尔基不顾一切地投身于俄国革命，并在经过许多突变、失望和反抗之后——这些突变、失望和反抗的余音早在12年前就通过他的信件传到了我这儿——完全献身于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事业；他把满腔的热情和乐观精神带进这种事业，他的热情已与工人们的热情、与重大的五年计划建设者们的热情融合在一起。但我觉得，这种合唱赞歌试图淹没发自他的内心深处的哀怨声⁽²⁷¹⁾。我觉得，在他身上掩藏着深深的忧伤。而且，忧伤的原因不仅仅是不久前儿子的死亡。忧伤构成他的几乎所有作品的背景。就天性来说，他是悲观主义者，他在童年过早地接受了人类的赤贫和丑陋的印象。他的身体具有惊人的

生命力，非常强壮，他选择了漂泊的道路——永远而徒然地逃避世界，逃避自身。毫无疑问，这只是加深了他的神经的特别敏感性，由于这种特别敏感性，在发生最小的动荡时，他也每次都会流泪。革命使他陷入彻底的道德慌乱。起初他不理解革命。革命的不可避免的残酷使他感到震惊。在那些年见过他的人（南森和其他人）得出一种印象：他的生活遭到了破坏，他号啕痛哭，陷于濒死状态。喜欢他的列宁亲自使他远离战场和废墟。这时他跑到那不勒斯，跑到那么美丽和那么无用的意大利，意大利成了他的麻醉剂、醉心花。为了逐步（不是一下子，而是通过几次尝试）使高尔基回到苏联，有多少人出了力？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扮演了什么角色？克留奇科夫这个孤僻的人实际上是什么人？他代表什么？他具有太大的影响，以致可以推测，高尔基似乎多亏了他。无论他起了什么作用，在列宁逝世后，高尔基（已经过去了几十年，但还需要一段时间）终于听从了他人的劝说和保证，新的俄罗斯吸引住了他——从墨索里尼统治的遥远的地中海岸看来，新的俄罗斯显得更光辉灿烂。回到俄罗斯，他发现俄罗斯已有了许多变化。这已不是国内战争时期的狂热的俄罗斯。这是元老们的俄罗斯。人民唱着歌为他们建造金字塔（也许，在遥远的过去，人民在建造金字塔时同样唱着歌？谁知道！）。特别敏感的高尔基被激情所控制。他陷入人民鼓掌欢迎的热潮和热爱祖国的浪潮，处在政界朋友和斯大林政府成员等久经考验的老战士中间，受到斯大林本人和其他杰出同志们的过分的赞扬和无微不至的关心，在有生之年成了为纪念他而改名的故乡城市的神圣保护人，没有任何附带条件就被推举担任苏联文化非常委员的角色，社会生活的演变吸引着他，使他感到陶醉：昔日的个人主义者已献身于

潮流。甚至可以说，放弃自己一生的使人痛苦的独立性，成为共同体伟大军队的士兵，他觉得轻松。一旦确信不疑，他就不再争辩；他是建筑工程的主任，他对建筑工程负责，赞许和制止工人。

可是，他欺骗不了我：他的疲倦笑容说明，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没有死亡——他仍然对自己的漂泊生活感到可惜。此外，他徒然地试图看到，在自己所参与的事业中，只有伟大、美丽和入道（虽然这确实是辉煌的事业）——**他不想看到、但他看到了**^[272]错误和痛苦，有时甚至还看到这个事业的惨无人道（这是一切革命的命定之事）。于是，他感到痛苦，回避这种情景，用惊恐的目光向那些迫使他勇敢地面对真相的人们请求宽恕。但无济于事：阴郁的幻影永远也不会离开像高尔基这样的人的意识深处。所以，他的意识深处总是充满痛苦和悲观，不过，他不流露自己的感情，就像他不流露内心深处在想些什么。他的生活是在海面上、面不是在海的深处度过的。他说话，不停地说话，开着玩笑。他写长篇小说，同时不喜欢自己的主人公。他感到孤独，往往只是在朋友和青年中间才感到幸福。有自己的孙子在场时，他神采焕发。实际上，他是一个软弱的、非常软弱的人，虽说有老熊的外表，并且会突然勃然大怒。高尔基是善良的、好留恋的和容易信任人的。如果有时他赞同由报复和仇恨的感情引起的思想和行为，或者甚至自己作出这样的行为，并容忍这样的思想，那只是由于软弱，由于不能控制住自己的过分敏感。出于对自己的小圈子的忠诚，他同意把自己锁在家中，听任过于积极热忱的秘书克留奇科夫摆布。克留奇科夫得以削弱了他的影响。要知道，虽然克留奇科夫提供了实在的帮助，我不得不遗憾地承认，他所建

立的封锁是令人难受的。克留奇科夫成了高尔基与外界的所有联系的唯一中间人：信件、来访（更确切地说，是拜访高尔基的请求）都由他一把抓，只有他能够决定，谁能见、谁不能见高尔基（此外，不识任何外国语的高尔基完全受翻译控制）。当我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克留奇科夫转交和转达我给斯大林、亚戈达和其他人的信件和话语的那种闪电般的迅速，还有他们的答复的迅速！克留奇科夫迫使我在给亚戈达的照片上题写友好和阿谀的词句（这种题词当然立即会成为舆论的财富）的不合时宜的企图！在我拒绝后和离开莫斯科后随之发生的对我的所有信件、包括对向斯大林提出的具体而紧急的请求以令人气恼的沉默作为答复！所有这些事实使我不得不认为，他与党的中央组织有秘密联系。只要不持白军报纸看待克留奇科夫的极端意见（他亲自对我们说过这种极端看法），应该承认，他是高尔基的真诚朋友，无限忠于高尔基，并根据自己的斟酌和党的领导人的方针支配高尔基。毫无疑问，党的领导人在他看来是非常可靠的。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不让高尔基有机会自己决定，他们对他来说究竟适合到什么程度。而且，这种照管更令人遗憾的是，就其自身来说，克留奇科夫是一个极其浅薄、狂热和武断的人（例如，当谈到文学和艺术时，我没有听到他对任何一个人说过任何一句表示肯定的话。在接待作家时——对接待负责的也许是高尔基和我——他吃力地履行好客的主人的角色。他总是觉得不满意：想必是因为扮演的是不体面的角色）。为了隔绝高尔基与文学界同仁、与读者的联系，克留奇科夫作了不小的努力。必须是像高尔基那样的意志薄弱者，才能听命于分分秒秒的控制和照管。这样的控制和照管使他少操了许多心，可是，是以什么样的代价？！老熊被封住了

嘴。

不幸的老熊，荣誉缠身，备受尊敬，但在内心深处，他对所有这些利益都不感兴趣，他宁愿用这些利益换取昔日无业游民的独立性，在他的心头，压着痛苦、思乡和遗憾的重负；他试图以令人陶醉的热情、以对吸引着他的周围群众的信任来减轻自己的根深蒂固的悲观主义，而正如有人所认为的，应该是他吸引群众！我非常喜欢他，而且，我为他可惜。他非常孤独，虽然几乎从来不会独自一人！我觉得，如果我和他单独在一起（并且消除了语言障碍），他会抱住我，长久地默默大哭。

（如果我错了，但愿他能宽恕我！）

（我不在这儿说众所周知的事情：关于他作为文学、科学和艺术、教育、出版的主要监督人的繁重而庄严的角色。他是整个文化的领导人和监察官。没有一个作家拥有过这样的权力，而高尔基接受了它。在举行社会性典礼时，他的位置在政府领导人旁边。他是苏维埃国家的首要人物之一。这种崇高地位以及与这种地位有关的责任决定了他的生活。社会性的人战胜了私人性的人。）

我还得勾勒第三个人的个性轮廓，此人的社会地位没有前两人那么高，但却是一个更令人感兴趣的谜：亚戈达，内务人民委员，以前是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因为他使我有机会不止一次与他会而，而且，看来甚至非常奇怪地想要赢得我的同情，我利用了这一点。

前面我已描述过他。从表面看来，他是一个敏感、随和、

极为文雅的人。在高尔基和人民委员们的圈子中，这种举止的文雅和随和令人惊讶，因为他们的总的风度和行为可以说有点粗鲁，特点是朴实。可以说，这张长方脸、长鼻子、眼神和手势包含神甫身上的某种东西，某种大可慰藉的东西。这种“某种东西”与他所选择的使命相一致。看来（并非没有根据），他以这种使命自豪，并因这种使命而感到幸福：改造受他管辖的罪犯，用纯净的水洗涤他们，进行一种在洗礼盘中的洗浴，以便使他们在回到社会时已是纯洁的、新生的人。但是，这种“某种东西”与他的政治职权的众所周知的东西要不相一致得多，与一切国家警察机构一样，他的政治职权令人恐惧。很少有人被敌手（特别是失去行动可能的人）以如此勉强克制住的仇恨和侮辱性的鄙视谈论（我好几次遇到人们这样谈论，我没有料到他们会发表如此充满愤怒的和侮辱性的冷嘲热讽，即使这只不过是几个人的几句话）。完全可能，亚戈达知道这种情况，并感到痛苦。同样可能的是，他因为自己的为社会谋利益的行为而感到痛苦，他对社会负有责任。十分明显，甚至他们之中像捷尔任斯基那样的最伟大的人物，内心也感到痛苦，但这并没有使他们在一旦需要这么做（或者他们认为需要这么做）时变得不那么坚强。可是，不能想象，他们在跟着使徒彼得重复他的有关自己老师的话“我不认识这个人！”之后，会在什么时候试图放弃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按照古罗马公民的成例，坚决地承担起百折不回的责任。亚戈达不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公民，可以说他是圣彼得的战士。他温和地与您说话，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如果你开始怀疑他的话，就用坦诚的目光惊讶地看着您（前面我已写过几次这样的场合）。这时我便吃惊地自问：“也许，我不了解什么东西？”他

的随和和异乎寻常的谦恭只是使人相信，不能对他施加哪怕是无足轻重的影响，或者使他信服任何东西。他什么都许诺，但什么都不做。佩什科娃女士说得一点都不错，她对我说：“与他争辩是无济于事的，你从他口中反正什么也打听不到。”（我觉得，斯大林的情况就不一样。斯大林不怕在争论中赞同合理的论据，即使这种论据证明他的错误。）亚戈达对我很关心。他几乎使我深信不疑：塞尔日的手稿将归还给我，而塞尔日本人将被释放。但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甚至怀疑，虽说有斩钉截铁的保证，无罪的布洛克（“时代”出版社的）将被从流放中召回*。在我动身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沉默（我于9月23日写下这段话）。不过，在所有重要问题上，莫斯科都对西方朋友广泛使用沉默策略。老实说，这令人不知所措。

以沉默回答苏联在西方的拥护者的担忧和疑惑，而在这种沉默中，感觉得到遥远而自信的局势主宰者们的无关痛痒。如何公正地、不姑息地、不天真而轻信地评判在同一个人——亚戈达身上的这种真诚和虚伪、随和和固执、温顺和残酷的结合？（我确信这两类品质的存在。）哪怕缺少两个条件中的一个，这两类品质就不可能同时存在：深思熟虑的和有意识的极端主义，或者强制自己，自我欺骗。我倾向于第二种假设：亚戈达没有伟大到（即使在善和恶的范畴之外）对自己承认这一

* 1936年5月的笔记：“应该认错，布洛克被安置到俄罗斯南方的一个大城市，在那儿他很幸福，并且很活跃。此外，维克托·塞尔日于1936年4月离开苏联，迁居比利时。由于法国拒绝接纳他，拖延了他的释放。在这两件事情上，或许也与在其他许多场合下一样，我的怀疑是不正确的。亚戈达正直地采取了行动。1935年9月，高尔基通知我，释放塞尔日已是一件决定了的事。”

点的地步；他在欺骗对之撒谎的人的同时，努力欺骗自己。他用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棉絮包裹自己的言辞和行为，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比如说，象斯大林那样的人，没有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也能非常好地应付过去：任何实际理由对他来说已完全足够）。不能说，当他撒谎时，在头脑中有另外的解释：首先他试图使他自己相信自己的谎言——相信他所做的一切好的或坏的事情。当然，无论是在他的改造刑事罪犯的活动中，还是在政治犯和政治嫌疑犯使用的惨无人道的手段中，都存在滥用现象。难道这对所有时代著名的执行者（真正的职员）来说不是典型的吗？出于对您的爱，他们在火堆上烤您。亚戈达对我表示的爱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但愿再次原谅我，如果我不公正地对待此人，他履行着如此繁重而徒劳的责任，并不得不戴上防护面罩，携带斧子！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在承担这样的重负并把它承受到底的同时，就他的天性来说，他是随和、机敏、通人情的——他不得不违背这种天性。为什么我们如此深信，天性没有在潜意识中对他进行自我报复？我们评判不了他。）

我还想特别列出另外两个我曾有机会与他们会面的人。

其中之一是布哈林，从第一天起，我与他就相互产生了好感，我还在他的所有文章中感觉到对我的特别的热情和爱^[273]。他有灵活而敏锐的头脑，乐观愉快，富有洞察力；在他身上永不熄灭地燃烧着青春和直爽的火焰——不可能不喜欢他。在所有名列前茅的政治家中，他是最充满崇高精神的，也是最理智的。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平庸的思维，任何虚荣心，他是心灵纯洁无私的人。不过，他也有许多瞎忙乱和喜怒

无常的言行。

另一个人是卡冈诺维奇，我对他的了解太少，不能评价他。（不过，谁能有把握地说了解他？在所有的人民委员中，他是最孤僻的。实际上他是什么样的人物，他在想些什么——不容易推测。）但是，他身上已为人所知的东西以及他的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一个精力旺盛、体格健壮、决心坚定的人。在新的五年计划中，他大概处在最重要的岗位上，从事铁路和整个运输业范围的改造。他鼓舞劳动群众。与此同时，他是冷漠的，从来不笑。（在高尔基的晚宴上，在大家热闹的说笑中，这一点令人惊讶）。如果他不是久经考验的老革命家，斯大林在国内战争时期的战友，我会想：“谨防未来的对手！”可是，不管怎么样，我认为，这是一个最近的将来的领导人。

我不再试图谈论其他人。他们在更小程度上吸引我的注意。也许，连这样一个事实也并不使人惊讶：从我们搬到高尔基那儿住的时候起，我们在苏联的翻译阿罗谢夫的名字就从日记中消失了。他的控制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不光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努力——人民委员们对他大概比我们更严厉。对我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做到了使阿罗谢夫远离我们，我会轻易地相信，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在7月初被打发离开了苏联：对他表示了信任，他便立即前往巴黎，就为莫斯科的马克思博物馆购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档案进行谈判。德国移民成功地把这些档案运出德国，使它们免于被希特勒焚毁。所以，我只是在高尔基接待的作家代表团的参加者中一闪而过地再次见到阿罗谢夫。不过，他从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给我写信，而且，由于自己通常不讲分寸，不善于掩饰懊丧和忿恨。他写到，在苏联，我应该注意到两代布尔什维克之间的明显差别：老一代革

命家和当前一代革命家。他希望我告诉他，在两代革命家中更器重哪一代，当然，先给我提示，我应该器重第一代，他自己也列入第一代。他不会放过利用我的答复反对属于第二代的人们的机会。我不打算回信：如果我想回信，我也不会作这样的区别，因为第二代最优秀的革命家在我看来是第一代革命家的当之无愧的后继人。如果说进化，那么，可以把更广泛的人道主义世界观看作进化的表现，而且，这种进化无论如何直接取决于社会的变化，而社会的进化与形势的变化有关。

所有这些笔记都是我在匆忙中写下的——其他事情经常使我不得不丢下它们，但我努力做到最大限度的真诚和认真。当我重读这些笔记时，我感到担心，他们可能显得过于持批判态度，并使把我当作兄弟的人们感到不愉快。我希望，将不会发生这样的事，那些将阅读我的日记的人们，能感觉到我对我所写到的人们的尊敬和依恋，我把刻画他们的个性特点作为自己的任务（况且我的分析可能是错误的）。我不希望，批评性意见以及对某些事情的某种克制态度会歪曲我的主要思想。我在作出总结时，说出了自己的有利于苏联和斯大林的政策的意见。目前这些政策包含某种消极的东西；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打算都不可能没有错误（“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274]）。可是，斯大林的政策所包含的积极的的东西远远超过所有消极的东西。我丝毫不怀疑，世界更美好的未来是与苏联的胜利连在一起的。

注 释

- [1] 德国英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大约产生于公元 1200 年,描写公元 436 年匈奴人消灭勃艮第人(尼伯龙根人)国家的历史传说以及封建时代宫廷和骑士的生活。后来 F. 赫贝尔、R. 瓦格纳、H. 易卜生等作家都采用过《尼伯龙根之歌》的题材(齐格弗里德的英雄功绩和遇害经过,以及他妻子克里姆希尔特替夫复仇等)。
- [2] 托马斯·曼(Thomas Mann, 1875~1955),德国作家。1933 年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上台执政而流亡国外,著有长篇小说《布登勃洛克一家》(1901)等,1929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3] 玛莎是罗曼·罗兰的妻子玛丽亚的小名。
- [4] 毕苏斯基(J. Pilsudski, 1867~1935),波兰社会党右翼活动家。1918~1922 年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生波兰的首任总统。1919~1920 年以武力东进,企图恢复 18 世纪被瓜分的波兰领土,与苏军作战。1926 年 5 月发动军事政变,拒任新总统职,只担任国防部长,实际上是波兰的独裁者。
- [5] 阿罗谢夫(А. Я. Арошев, 1890~1938),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作家。十月革命期间任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军区司令。1926 年起历任驻立陶宛、捷克斯洛伐克全权代表。1934 年起任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主席。

- [6] 达夫强(Я. Х. Давтян, 1888~1938), 苏联外交家。1934~1937年任苏联驻波兰全权代表(1941年前的苏联外交使节, 即大使)。
- [7] 密茨凯维奇(A. Mickiewicz, 1798~1855), 波兰诗人、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著有长诗《塔杜施先生》(1834), 诗中描绘旧波兰的习俗, 是一部用文字勾勒的风景画的杰作。另著有长诗《格拉席娜》(1823)等。1824年起侨居俄国, 结识十二月党人和普希金。1840~1844年在巴黎讲授斯拉夫文学。
- [8] 纪德(A. Gide, 1869~1951), 法国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蔑视道德的人》(1902)、《梵蒂冈的地窖》(1914)、《伪币犯》(1925)等。作品勾勒出一幅幅资产阶级社会走向没落的图画, 同时又鼓吹唯美主义和无视道德的行为。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9] 马尔罗(A. Malraux, 1901~1976), 法国作家、国务活动家。1959~1969年任文化部长。法国存在主义思想的前驱。著有长篇小说《王家大道》(1930)、《人类的命运》(1933)、《可鄙的时代》(1935)等。另有论述艺术哲学的著作。
- [10] 让-米夏尔·布洛克(Jean-Richard Block, 1884~1947), 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1921年加入法共。“光明社”成员。作品《某公司》(1917)、《巫女》(1935)等指出有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必将灭亡。
- [11] 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6月21至25日在巴黎举行的国际保护文化大会。罗曼·罗兰起初打算参加会议, 但随后认为莫斯科之行更重要。高尔基也没有赴会。

- [12] 马塞尔·加香(Macérl Cachin, 1869~1958), 法国和国际共运活动家。法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4~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1918~1958年任法国《人道报》社长。
- [13] 布琼尼(С. М. Будённый, 1883~1973), 苏联元帅。国内战争英雄。1924~1937年任工农红军骑兵总监。卫国战争中任方面军司令员。
- [14] 克留奇科夫(П. П. Крючков, 1889~1938), 高尔基的秘书。在高尔基的档案中, 保存有他与罗曼·罗兰夫妇的通信。
- [15] 莱温(Л. Г. Левин, 1870~1938), 经常给高尔基看病的医生。
- [16] 人民委员会, 1917~1946年苏联的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各部部长称人民委员。1946年3月改称部长会议。
- [17] 帕斯捷尔纳克(Б. Л. Пастернак, 1890~1960), 俄罗斯作家。著有长诗《1905年》(1925~1926)和《施密特中尉》(1926~1927)、中篇小说多部、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1957年在国外发表)等。195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但拒绝接受。
- [18] 特列季亚科夫(С. М. Третьяков, 1892~1939), 俄罗斯作家。著有以苏联和外国为题材的宣传鼓动诗、特写、剧本和电影剧本等。
- [19] 列昂诺夫(Л. М. Леонов, 1899~), 俄罗斯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72年)。著有长篇小说《贼》(1927)、《俄罗斯森林》(1953)等。他的作品涉及社会道德问题, 富于哲理, 心理描写细腻, 景物刻画生动, 是俄罗斯文学的佳

作。

- [20] 季纳莫夫(С. С. Динамов, 1901 ~ 1939), 苏联文艺学家。曾任《国际文学》杂志编辑。
- [21] 谢尔盖·库达舍夫(Сергей Кудашев, 1917 ~ 1941), 罗曼·罗兰的妻子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库达舍娃第一次结婚后生的儿子。罗曼·罗兰曾热情地关心他的成长。1941年, 库达舍夫在莫斯科城郊的战斗中牺牲。
- [22] 小剧院是莫斯科历史最悠久的俄罗斯话剧院。剧团形成于18世纪50年代, 在演出俄国和西欧古典剧作中形成了现实主义的表演艺术学派。
- [23] 阿马格洛别利(С. И. Амаглобели, 1899 ~ 1946), 格鲁吉亚戏剧学家、剧作家。1933 ~ 1936年任小剧院院长兼艺术指导。
- [24] 高尔基于1935年6月22日写给玛丽亚·帕夫洛夫娜·罗兰的这封信的内容如下:“亲爱的玛丽亚·帕夫洛夫娜:非常建议你们并热烈请求你们住在莫斯科近郊我所住的、您曾到过的那所房子里。在那儿罗兰将感到方便和安静, 可以把所有他想见的人都叫到那儿去。”
- [25] “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飞机是苏联于1934年建造的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 翼展63米, 重42吨, 能载客80名, 机组共8人。1935年5月18日与另一架飞机相撞失事。
- [26] 尼古拉·布哈林(Николай Бухарин, 1888 ~ 1938),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1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 1924年列宁逝世后成为苏共政治局委员, 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 1929年4月失去在

共产国际席位,同年11月被开除出党的政治局。1934年任《消息报》主编。1937年1月被捕并被开除出党,1938年3月被指控进行反革命活动和破坏活动,定罪处死。

- [27] 维克托·雨果(Victor Hugo, 1802~1885),法国作家。著有《巴黎圣母院》(1831)、《悲惨世界》(1862)、《笑面人》(1869)等。《九三年》(1874)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长篇小说。
- [28] 《亚洲风暴》是苏联影片《成吉思汗的后裔》(1929)在欧洲放映时使用的名称。该片导演普多夫金(В. И. Пудовкин, 1893~1953)也是电影理论家,是苏联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
- [29] 《伊利昂记》(《Illiados》),又译《伊利亚特》,是古希腊一部关于伊利昂即特洛伊的叙事长诗,世界名著,据认为是荷马所作,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公元前8世纪,依据的是有关“特洛伊战争”的传说。诗中穿插描写英勇鏖战的场面,被围困的特洛伊城中和平生活的景象等。
- [30] 大剧院于1776年创建于莫斯科,现在的建筑竣工于1825年,曾上演外国和俄国最早的歌剧,是俄罗斯和世界音乐、戏剧、文化的最著名的中心。
- [31] 阿萨菲耶夫(Б. В. Асафьев, 1884~1949),苏联音乐学家、作曲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苏联音乐学奠基人。
- [32] 乌兰诺娃(Г. С. Уланова, 1909/10~),苏联芭蕾舞女演员。1928~1944年在基洛夫歌剧舞剧院(列宁格勒)演出,1944~1960年在大剧院演出,后在该院任舞剧编

导教师。她的艺术特点在于一切舞蹈艺术表现手段的极度协和。

- [33] 安娜·巴甫洛娃(Анна Павлова, 1881~1931), 芭蕾舞女演员。1910年起率自己的剧团在世界许多国家巡回演出, 使俄罗斯舞蹈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国外产生了影响。以演出舞蹈小品《天鹅之死》享有盛名。
- [34] 涅米罗维奇-丹琴柯(В. И. Немирович-Данченко, 1858~1943), 苏联导演、剧作家。1898年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起创建莫斯科艺术剧院。
- [35]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Максим Литвинов, 1876~1951),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30~1939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他和卢那察尔斯基于1915年在瑞士与罗曼·罗兰会过面。
- [36] 蒲立德(W. C. Bullitt, 1891~1967), 美国外交官。1934~1936年担任美国首任驻苏联大使。1936~1940年担任驻法国大使。
- [37] 《伊戈尔公》, 1185年, 诺夫哥罗德-塞维尔大公伊戈尔·斯维亚托斯拉维奇(Игорь Святославич, 1150~1202)组织反对波洛伏齐人的远征失败, 此后不久, 一位佚名作者极据记忆犹新的史实写成《伊戈尔远征记》。这是一部抒情叙事作品, 证明古代罗斯已有高度的文化艺术。А. П. 波罗廷根据《伊戈尔远征记》的情节创作了歌剧《伊戈尔公》。
- [38] 佳吉列夫(С. П. Дягилев, 1872~1929), 俄罗斯戏剧和艺术活动家。创办“俄罗斯季节演出”(1907年起)。创建佳吉列夫俄罗斯芭蕾舞团(1911~1929)。长期侨居国

外。

- [39] 科西马·瓦格纳(Cosima Wagner, 1837~1930), 德国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 R. 瓦格纳的遗孀。
- [40] 瓦西里升天大堂, 又称“沟边”圣母大堂, 位于莫斯科红场上的俄罗斯古建筑, 现为历史博物馆分馆, 1555~1560年为纪念征服喀山汗国而建造, 由周围 8 个圆塔式教堂和中央一个大塔楼组成, 通过内部走廊连成一体。
- [41] 奥斯特洛夫斯基(А. Н. Островский, 1823~1886), 俄国剧作家。他的剧作兼有日常生活描写逼真和人物性格刻画细腻的特点, 对俄国现实主义戏剧的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
- [42] 邓南遮(G. D'Annunzio, 1863~1938), 意大利作家、政治活动家。最著名小说为《死的胜利》(1894)。著名剧作《约里奥的女儿》(1904年首演)是描写农民的恐惧心理和迷信思想的诗剧, 颇有感染力。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失去一目。后来成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 受到墨索里尼的奖赏。晚年写有回忆录和忏悔书。
- [43] 奥托·施米特(Отто Шмидт, 1891~1956), 苏联学者、国务活动家。北极考察活动组织者之一。苏联科学院院士(1935)。《苏联大百科全书》的首倡者之一和主编(1924~1941)。
- [44] “切柳斯金号”是 1933 年建造的苏联轮船, 是年, 该轮试图在一个通航期内从摩尔曼斯克穿过北方海路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1934 年 2 月 13 日在楚科奇海被浮冰撞碎, 船员被苏联飞行员救出。施米特任这次考察的队长。

- [45] 沃坦,日尔曼神话中的最高之神,德国著名作曲家 R. 瓦格纳的四联剧《尼伯龙根的指环》(1854~1874)中的人物。
- [46] 布勃诺夫(А. С. Бубнов, 1884~1940),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24年担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1929年起任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
- [47] 克里斯季(М. П. Кристи),20年代在教育人民委员会工作,后担任特列嘉柯夫美术馆馆长。参见注释[220]。
- [48] 卢那察尔斯基(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1875~1933),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作家、评论家。1917年起任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有关于革命思想史、哲学思想史、文化问题等方面的著作。
- [49] 斯塔索娃(Е. Д. Стасова, 1873~1966),苏联党的女活动家。1927~1937年任苏联国际支援革命战士协会中央委员会主席,1935~1943年任共产国际国际监督委员会委员。
- [50] 普罗科菲耶夫(С. С. Прокофьев, 1891~1953),苏联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家。作有歌剧《三个橙子的爱》(1919)、舞剧《罗密欧与朱丽叶》(1936)、《灰姑娘》(1944)等。1933年起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
- [51] 梅尔库罗夫(С. Д. Меркуров, 1881~1952),苏联雕塑家。作品以雄伟的概括形式体现了英雄主义形象。
- [52] 卢那察尔斯卡娅 - 罗泽涅利(Н. А. Луначарская - Розенель, 1902~1962),卢那察尔斯基的第二个妻子,电影演员。一度在小剧院工作。

- [53] 韩德尔(G. F. Handl, 1685 ~ 1759), 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家。擅长创作清唱剧, 作品多取材于圣经故事。写有 40 余部歌剧, 以及管风琴协奏曲、大协奏曲、奏鸣曲和组曲。
- [54] 基洛夫(С. М. Киров, 1886 ~ 1934),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十月革命前曾因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1921 年任阿塞拜疆党组织第一书记, 1926 年起领导列宁格勒党组织, 同年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 年当选政治局委员。1934 年 12 月 1 日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总部被一青年党员列昂尼德·尼古拉耶夫暗杀。尼古拉耶夫和 13 名嫌疑同谋者被枪决。随后, 斯大林声称发现了计划暗杀全部领导人的大阴谋, 从而发动了大清洗。
- [55]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 1890 ~ 1947), 法国作家、政论家。曾参加 H. 巴比塞领导的文学团体“光明社”。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生活在苏联。因被指控宣传托洛茨基主义, 被流放到乌拉尔河畔的州中心城市奥伦堡。后被驱逐出苏联。
- [56] 卡拉斯案件, 卡拉斯(J. Calas, 1698 ~ 1762) 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 图卢兹布商。1761 年, 他的长子马克-安托万被绞死在他的布店里。当地天主教徒立即掀起反胡格诺派的怒潮, 将卡拉斯逮捕, 指控他谋害自己的儿子, 因为他的儿子是天主教徒。地方法官认定卡拉斯有罪, 图卢兹上诉法院于 1762 年 3 月判处他死刑。次日, 卡拉斯当众被刑车裂尸而死。他的儿子则被当作天主教殉教者埋葬。哲学家伏尔泰注意到这个案件, 曾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 使广大欧洲舆论相信, 审判卡拉斯的人怀有反胡格诺派的偏见, 定罪不公。结果, 政府任命 50 位

法官组成陪审团重新审理此案。1765年3月,陪审团撤销对卡拉斯的原判,由政府付给卡拉斯家属赔偿费。卡拉斯一案说明社会舆论的介入能导致恢复公正。

- [57] 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A. Dreyfus, 1859~1935)是犹太商人之子,1882年进入军界,1889年升至上尉,1894年调国防部工作。此后不久,有人在驻巴黎的德国大使馆偶然拾到一张纸条,从而发现向德国泄露法国军事秘密的间谍活动。德雷福斯随即被指控向德国武官出卖军事情报,法庭判处他终身监禁。由于判决的证据不足,一批有势力的政治家以及以作家E. 左拉和A. 法朗士为首的学术界人士掀起一场要求释放他的运动,斗争极为激烈,并同反犹太主义、反教权主义和反共和主义等活动联系在一起。军事法庭于1899年复审德雷福斯一案,再次确定他有罪,但改判为10年监禁。共和国总统为了消除争端,对他实行赦免。1904年,再次重审德雷福斯案。两年后,最高法院为他昭雪,推翻以前全部罪名,并授予他荣誉军团勋章,晋升少校。德雷福斯事件成了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政治危机,并再次说明社会舆论在主持正义中的重要作用。罗曼·罗兰本人最初倾向于“德雷福斯派”,但到斗争愈演愈烈时,则成了超然派,认为“德雷福斯派”和“反德雷福斯派”都有好人,也都有企图浑水摸鱼的坏人。1898年,罗曼·罗兰还写了一个影射“德雷福斯事件”的历史剧《群狼》。
- [58] 巴比塞(H. Barbusse, 1873~1935),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1923年加入法共。长篇小说《炮火》(1916)和《光明》(1919)谴责第一次世界大战。组织文学团体“光明

- 社”，是1933~1935年世界反法西斯大会的组织者之一。
- [59] 罗曼·罗兰指的显然是1935年5月2日签署的苏法互助条约，以及斯大林与先后担任法国外交部长(1934~1935年)和总理(1935~1936年)的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 1883~1945)的私人联系。赖伐尔拥护对法西斯侵略的“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维希”附敌政府的头子，后以叛国罪被处死。
- [60] 季诺维也夫(Г. Е. Зиновьев, 1883~1936)，俄国革命家。他是列宁在1907~1917年侨居法国、奥地利和瑞士期间的主要合作者。1919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1921年成为彼得格勒党组织领导人和苏维埃主席、党中央政治局委员。20世纪初期与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结盟，阻止托洛茨基成为列宁的接班人。1926年被赶出政治局和共产国际，1927年被开除出党。1935年因“在道义上参与”暗杀基洛夫被判处10年徒刑。次年，在第一次大清洗中再度遭到审讯，以建立恐怖组织暗杀基洛夫和其他苏联领导人的罪名被处决。
- [61] 加米涅夫(Л. Б. Каменев, 1883~1936)，俄国革命家，老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出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委会第一任主席。1919年成为政治局委员和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6年，他与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形成反斯大林集团，此后被赶出政治局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洛夫被暗杀后，他和季诺维也夫以间接参与此案一起被判罪。1936年8月，在大清洗的第一次公开审讯中，他和季诺维也夫再次受审。他承认编造的阴谋刺杀斯大林以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罪名，后被枪决。

- [62] 叶努基泽(А. С. Енукидзе, 1877~1937),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18年起任全俄中央执委会主席团秘书, 1922~1935年任中央执委会主席团秘书。1924年起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主席团委员)。
- [63] 夏洛特·科黛(Charlotte Corday, 1768~1793), 暗杀法国革命家马拉的凶手。贵族出身, 思想倾向保王党。她在巴黎要求会见马拉, 会见时从衣服下拔出匕首, 刺穿马拉的心脏。她当场被捕, 4天后即被处决。
- [64] 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1891~1937), 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1922~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中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 侨居苏联, 与Ю. А. 舒赫特结婚。他们的儿子德利奥和朱利亚诺基本上生活在苏联, 并由姨母Т. А. 舒赫特抚养长大。葛兰西于1926年在意大利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捕, 1928年被法西斯法庭判处20年监禁, 后死于狱中。
- [65] 鉴于罗曼·罗兰与斯大林谈话的正式文本在主要内容上与日记中所记并无差别, 正式文本没有发表。
- [66] 这篇文章写于1934年9月, 题为《为那些快要在墨索里尼监狱中死去的人们——安东尼奥·葛兰西》。
- [67] 罗曼·罗兰指的是位于克鲁泡特金大街21号的西方新艺术博物馆, 建立于1923年, 藏品来自С. И. 休金和И. А. 莫罗佐夫的收藏。
- [68] 乌特里罗(M. Utrillo, 1883~1955), 法国画家。善绘城市景色(巴黎近郊, 蒙马特小街)。
- [69] 指的是1911年开放的列夫·托尔斯泰博物馆。
- [70] 涅姆琴科(Н. Немченко), 30年代在全苏无线电广播网

工作。她曾把罗曼·罗兰的中篇小说《哥拉·布勒尼翁》改变成剧本,她与罗曼·罗兰有关广播这部小说的通信自1935年7月4日起刊载在《真理报》上。

- [71] 邓尼金(А. И. Деникин, 1872~1947), 俄国将军。1917年二月革命后任参谋长, 同年7月被解职, 8月因阴谋推翻临时政府被捕, 十月革命后越狱南逃。1918年4月起, 在北高加索、顿河和乌克兰建立反革命白卫军统治, 武装力量达15万余人。至1920年3月, 白卫军占领的大部分地区已被红军解放。1920年4月移居法国, 写回忆录《俄国内乱史》。1945年移居美国。
- [72] 里亚布申斯基(П. П. Рябушинский, 1871~1924), 俄国反革命资产阶级首领。出身于企业主和银行家家庭, 与其兄弟共同经营莫斯科里亚布申斯基银行和《俄罗斯晨报》。十月革命后发动叛乱, 失败后逃亡国外。
- [73] 罗曼·罗兰和高尔基在通信中不止一次谈到失去朋友的题目。1925年11月23日, 他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说: “我的精神独立性使我付出了重大代价。我失去了青年时代的所有朋友和我成年后的几乎所有朋友。”
- [74] 这儿指的可能是高尔基在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 [75] 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 曾不止一次邀请他进行这样的旅行。罗曼·罗兰在返回瑞士后, 也希望在下次访苏时能实现与高尔基一同沿伏尔加河旅行的宿愿。但随着高尔基的去世, 他未能再次访苏。
- [76] 罗曼·罗兰说的是1927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纪念贝多芬逝世100周年的庆祝活动。

- [77] 季米特洛夫(Г. Димитров, 1882 ~ 1949), 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3年在保加利亚领导共产党起义, 失败后流亡国外。1929年起为共产国际中欧地区负责人。在1933年的德国国会纵火案中, 被希特勒政权诬陷为纵火的策划者。他在法庭上义正辞严地驳斥纳粹的指控, 获无罪释放。1934 ~ 1945年定居莫斯科, 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1945年回国, 任祖国阵线政府总理, 1946年建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 任部长会议主席。1948年起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 [78] 《无神论者》是苏联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中央和莫斯科州委员会的机关刊物, 1925 ~ 1941年在莫斯科出版。
- [79] 雅罗斯拉夫斯基(Е. М. Ярославский, 1878 ~ 1943),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在莫斯科), 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23 ~ 1934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先后任《真理报》以及《布尔什维克》、《历史学家 - 马克思主义者》、《无神论者》等杂志的编委。有革命运动史、宗教史、无神论方面的著作。
- [80] 波尔·贝尔(1833 ~ 1886), 法国生理学家、政治家、外交家。
- [81] 洛佐夫斯基(А. Лозовский, 1878 ~ 1952),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21年起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1939 ~ 1946年任苏联外交副人民委员。1939年起任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候补中央委员)。有工会运动史方面的著作。

- [82] 柏辽兹(H. Berlioz, 1803~1869), 法国作曲家、音乐评论家和指挥。西方音乐史上最伟大的作曲家之一。作品有《罗马狂欢节》等。
- [83] 尤利乌斯·凯撒(Julius Caesar, 公元前 102/100~前 44), 罗马将军, 政治家。公元前 60 年与庞培、克拉苏结成联盟, 任执政官, 后出任高卢总督; 公元前 58~前 51 年使高卢(法国)全境服从罗马; 公元前 49 年依靠军队争夺统治权, 公元前 49~前 45 年击败庞培及其追随者, 成为国家元首, 集国家许多重要职务于一身, 实际上成为君主。公元前 44 年在罗马元老院大厅遇刺身亡。著有《高卢战记》和《内战记》; 制定历法(儒略历)。
- [84] “尉官们”, 原文如此。
- [85] “杂技序幕会演”是指杂技演出开始时, 全体演员粉墨登台, 绕场作各种表演。
- [86] “狄纳莫”即全苏体育运动协会, 根据 Ф. Э. 捷尔任斯基的倡议于 1923 年成立。
- [87] 雅克-达尔克罗兹(E. Jacques - Dalcroze, 1865~1950), 瑞士作曲家、教育家。音乐节奏教学体系的创始者, 世界各国的芭蕾舞院校都推广了他的节奏教学法。
- [88] 埃德曼(Р. П. Эйдеман, 1895~1937), 苏军将领。国内战争中任南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师长、集团军司令和军队集群司令。20~30 年代任军区司令、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89] 奥林皮阿达·Д·切尔科娃(Олимпиада. Д·Черткова), 安德烈耶娃家中的女管家, 安德烈耶娃和高尔基的朋友。

安德烈耶娃(М. Ф. Андреева, 1868 ~ 1953)是俄国女演员,1894年开始舞台生涯,1931~1948年任莫斯科科学家之宫主任。

- [90] 夏里亚宾(Ф. И. Шаляпин, 1873 ~ 1939),俄罗斯男低音歌唱家。俄罗斯现实主义表演艺术的杰出代表。1922年起侨居国外。
- [91] 切尔特科夫(В. Г. Чертков, 1854 ~ 1936),俄国社会活动家、出版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朋友。1884年创办“媒介”出版社。1897~1907年侨居国外,出版《自由言论》文集。1928年起编辑托尔斯泰全集(90卷)。
- [92] 柯罗连科(В. Г. Короленко, 1853 ~ 1921),俄国作家、评论家。作品有中短篇小说《盲音乐家》(1886)、《巴甫洛夫特写》(1890)、《嬉闹的河》(1891)以及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22年逝世后出版)等。他的作品洋溢着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
- [93] 梯弗利斯是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在1845~1936年间的旧称。
- [94] 阿利斯托芬(Aristophanes, 448? ~ 385? BC),古希腊诗人、喜剧作家。有“戏剧之父”之称。
- [95] 亚戈达(Г. Г. Ягода, 1891 ~ 1938),苏联秘密警察首脑。1934年起担任新成立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1936年以渎职罪被解职。在1938年的第三次清洗审判中,以指使医生谋杀前秘密警察首脑明任斯基、作家高尔基和政治局委员古比雪夫的罪名被处决。
- [96] 阿韦尔巴赫(Л. Авербах)于1939年遭镇压。
- [97] 鲍里斯·皮利尼亚克(Борис Пильняк, 1894 ~ 1941),俄

罗斯作家。著有长篇小说《荒年》(1921)、《伏尔加河流入里海》(1930)等。由于不理解革命时代的主要倾向,对当时生活的描写带有自然主义色彩。

- [98] 卡尔杜齐(G. Carducci, 1835~1907),意大利诗人、社会活动家。长诗《撒旦颂》(1863)描写理智战胜宗教。1906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 [99] 在法语中,名词 Voleur 来自动词 Voler,前者只有窃贼的意思,而后者具有窃贼和飞行两种意思。这位总统应该用 Aviateur(飞行员)一词。
- [100] 伊斯特拉蒂(Panait Istrati, 1884~1935),罗马尼亚的法语作家。罗曼·罗兰在他的创作活动初期曾支持过他,甚至称他是“巴尔干的高尔基”,因为他的生活道路表面上与高尔基相似。1928年,伊斯特拉蒂访问苏联,会见了高尔基。离开苏联回国后,他出版了与两个著名的托洛茨基主义活动家合著的3卷集《论另一种火焰》,书中包含对苏联的激烈攻击。此后高尔基、罗曼·罗兰等与他决裂。
- [101] 明茨(И. Минц, 1896~),苏联历史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46)。有苏共党史、十月革命史和苏联内战史方面的著作。
- [102] 《哥拉·布勒尼翁》是罗曼·罗兰用10年时间写完《约翰·克利斯朵夫》后,于1913年4至9月在瑞士休养时一气呵成的小说,篇幅约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五分之一。原稿交给出版商后,立即付印,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出版商认为发行此书与形势不太协调,所以书印成后被封存了起来,直到战争结束才正式发行。

《哥拉·布勒尼翁》的主人公是法国民间手艺人，擅长雕花刻板，精工制作木器。故事发生在1617年，小说用自叙体表现主人公一生的思想和活动。哥拉51岁了，长得肥头大耳，满面油光，酒糟鼻子，整天酒杯不离手，笑谈不离口。他自己建造了一所木屋，有一个木工作坊，两个徒弟给他干活。他有四男一女，都已成家立业，生活虽说不上富裕，却也比较舒适。不料7月初瘟疫突然袭来，镇上死了不少人，死人的住所要用火烧掉。哥拉也染上了瘟疫，为了使房屋不被火烧掉，他躲进菜地草棚，狂饮葡萄酒，居然治好了病。可回家一看，房屋已被歹徒烧成灰烬，物品已被抢劫一空。年过半百的哥拉无力恢复家业，走投无路之际，他同镇上居民一起与纵火抢劫的匪徒打了一仗。得胜之后，哥拉和小镇上的居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哥拉·布勒尼翁》是一部在苏联影响很大的作品。1917年5月，罗曼·罗兰与卢那察尔斯基在日内瓦会面，十分惊讶地得知，《哥拉·布勒尼翁》的法文原版尚封存在仓库中，却已有了俄文译稿。高尔基读了俄文译稿，十分欣赏，正在设法使它尽快出版。1923年1月13日，高尔基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提到，他一边读《哥拉·布勒尼翁》，一边发笑，有时简直笑得涕泪交加。高尔基说：“我不能不认为，在当前普遍的思想混乱、仇恨和疯狂的情况下，这本书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

- [103] 拉狄克(K. Radek, 1885~1939?), 共产主义宣传家, 共产国际早期领导人。生于西班牙, 1915年结识列宁。1923年代表共产国际到德国发动革命, 1924年因对德

国革命失败负有责任而被撤销共产国际书记职务。1927年被作为托洛茨基分子开除出联共(布),流放乌拉尔山区。1929年公开宣布放弃反党观点,恢复党籍。此后宣布拥护斯大林。1931~1936年任《消息报》编委,撰写外事评论。1935年还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1936年9月,以参与托洛茨基阴谋活动的罪名被捕,被判处10年徒刑。1939年死于狱中。

- [104] 丹东(G. J. Danton, 1759~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参与准备1792年8月10日推翻君主制的起义。1793年起对吉伦特派采取调和主义立场, 他的周围集中了一批所谓的丹东派分子。1794年3月29日被捕, 4月5日被革命法庭处死。
- [105] 吉伦特派,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派别, 主要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 因该派许多活动家出身于吉伦特郡, 故名。君主制推翻后, 吉伦特派执政, 反对革命继续深入发展。1793年5月31日~6月2日, 人民起义推翻了吉伦特派政府。1793年10月, 部分吉伦特派分子被处死刑。
- [106] “疯人派”, 法国大革命中的极左派代表, 城市贫民思想家 T. 勒克莱尔、J. 瓦尔莱等人的绰号。要求日用品有最高限价, 取缔投机买卖, 实施革命恐怖。1793年秋在与雅各宾派的斗争中瓦解。
- [107] 伊格纳季耶夫(А. М. Игнатъев, 1879~1936), 第一次俄国革命的积极参加者, 在苏维埃时期是工具技术方面的著名发明家。罗曼·罗兰称他伯爵, 显然是根据他的姓氏, 认为他是伊格纳季耶夫伯爵家族的一员。

- [108] 利平一家,莫斯科的罗曼·罗兰读者之家。
- [109] 勃艮第人,日尔曼部落。5世纪中期占据罗讷河流域,建立早期封建王国,534年被法兰克人所灭。
- [110] 帕列赫,俄罗斯联邦伊万诺沃州的一个城镇,镇上有美术学校、帕列赫艺术博物馆等。1923年,在该镇的圣像手工艺基础上产生了帕列赫细密画,即用蛋彩画在马粪纸胎的漆器(小盒、烟盒等)上的一种俄国民间细密画。以日常生活、民俗、历史、文学为题材,在黑底上以鲜明的地方色彩作画,画工细腻流畅,多用金色,人物修长优美。
- [111] 《伊戈尔远征记》,参见注释[37]。
- [112] 科林(П. Д. Корин, 1892~1967),苏联画家。帕列赫镇人。1931年与高尔基认识,在意大利时,曾住在高尔基那儿。1932年,在索伦托为高尔基画过像。
- [113] 佛兰德,中世纪的公国,其领土包括今天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一部分,是中世纪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 [114] 法兰西剧院,法国的话剧院,路易十四于1680年创建于巴黎,成为当时培养演员和导演的学校。剧院忠实于古典主义传统。
- [115] 1933年12月23日,罗曼·罗兰在《世界报》上发表文章,题为《应宣告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同志们无罪:对德国人民的呼吁》。
- [116] 在德国国会纵火案中,与季米特洛夫一起受到指控的还有波波夫(Б. Попов)、塔涅夫(В. Танев)和托尔格勒(E. Torgler)。
- [117] 台尔曼(E. Talmann, 1886~1944),德国和国际共运活

动家。1925年起任德国共产党主席。1924~1943年先后任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4~1933年任德国国会议员。1933年3月被纳粹秘密警察逮捕,1944年8月死于集中营。

- [118] “阿比西尼亚”是旧时对埃塞俄比亚的非正式称呼。
- [119] 扎诺蒂-比安科(U. Zanotti-Bianco, 1889~1963),意大利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持反法西斯立场。意大利“罗曼·罗兰之友协会”主席,1913年起与高尔基通信和会晤。找不到布依·皮科普的资料。
- [120] 米尔斯基(Д. П. Мирский, 1890~1937),苏联文学研究家。曾侨居国外,后回到苏联。
- [121] 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中苏丹新娘的名字,以一夜复一夜地给苏丹讲述有趣故事而免于死。
- [122] 拉基茨基:(И. Н. Ракицкий, 1883~1942),画家。高尔基的朋友,当高尔基侨居意大利南部城市索伦托时,他住在高尔基家中。
- [123] 阿朗,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喜剧《心病者》(1673)的主角。
- [124] 指埃尔扎·加尔多赫(Эльза Гартох),罗曼·罗兰本人和他的妹妹加德莱娜·罗兰都与她有书信往来。
- [125] 奥斯卡尔·加尔多赫(Оскар Гартох),列宁格勒生物学家。长期与罗曼·罗兰通信,早在30年代初,罗曼·罗兰就为他的命运担心。例如,1930年10月22日,罗曼·罗兰从瑞士维勒讷沃写信给高尔基,信中请求高尔基询问一下加尔多赫的情况。
- [126] 布洛克(Г. П. Блок, 1888~1962),记者、翻译家。列宁

- 格勒“时代”出版社(1923~1934)主编,参与准备第一部俄文版罗曼·罗兰作品选集。
- [127] 费定(К. А. Федин, 1892~1977),苏联作家。苏联科学院院士(1958)。著有长篇小说《城与年》(1924)、《兄弟们》(1927~1928)等。1932年春天,他在瑞士维勒讷沃拜访过罗曼·罗兰。
- [128] 马尔夏克(С. Я. Маршак, 1887~1964),苏联诗人、翻译家。苏联儿童文学经典作家。著有诗歌、童话、儿童剧等。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各民族童话等。
- [129] 伊林(М. Ильин, 1895/96~1953),伊利亚·马尔夏克(Илья Маршак)的笔名。苏联作家。著有大量儿童科普读物,如《伟大计划的故事》(1930)、《山和人》(1935)、《物品的故事》(1936)等。
- [130] 普罗科菲耶夫(А. А. Прокофьев, 1900~1971),俄罗斯诗人。诗集《晌午》(1931)、《对岸》(1955)、《邀请旅行》(1960)和长诗《俄罗斯》(1944)以构思宏伟、语言清新、形式明快著称。
- [131] 特尼扬诺夫(Ю. Н. Тынянов, 1894~1943),俄罗斯作家、文艺学家。以写长篇历史传记小说著称,如《丘赫利亚》(1925)、《瓦济尔-穆赫塔尔之死》(1927~1928)、《普希金》(1935~1943,未写完)等。
- [132] 百科全书派,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他们在编纂《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词典》(35卷,1751~1780)的过程中团结在一起。
- [133] 洛可可,18世纪上半期欧洲艺术的一种风格,其特征是脱离生活,向往幻想世界,崇尚矫饰、神话题材、田园诗

意和色情情节。富于轻盈精巧的装饰节奏感。雕塑和绘画优美精雅,富有装饰性。

- [134] 斯特凡·茨韦格(Stefan Zweig, 1881~1942),奥地利作家。心理短篇小说大师(短篇小说集《马来狂人》,1922;《感觉的混乱》,1927等)。另著有传记《罗曼·罗兰传》、《巴尔扎克传》等。
- [135] 维尔哈伦(E. Verhaeren, 1855~1916),比利时法语诗人、戏剧家。著有诗集《黄昏》(1887)、《黑色火炬》(1890)、《幻想的农村》(1893)和剧本《黎明》(1898)等。
- [136] 罗曼·罗兰本人对茨韦格的评价很高。1917年,他在给茨韦格的信中说:“您属于我与之保持兄弟般情谊的少数欧洲思想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茨韦格所持立场与罗曼·罗兰相似,但不同于E.维尔哈伦的反对德国的立场。
- [137] 《保卫新世界》是罗曼·罗兰的政论文章汇编,1932年以俄文在列宁格勒出版。
- [138] 沙波林(Ю. А. Шапорин, 1887~1966),苏联作曲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40年起)。作有歌剧《十二月党人》(1953)、清唱剧《为俄罗斯国土而战的故事》等。
- [139] 涅高兹(Г. Г. Нейгауз, 1888~1964),苏联钢琴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22年起)。苏联最杰出的钢琴乐派的创始人之一。
- [140] 戈登魏泽尔(А. Б. Гольденвейзер, 1875~1961),苏联钢琴家、作曲家。苏联一个最杰出的钢琴乐派的创立人。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06年起)。
- [141] 伊凡诺夫-博列茨基(М. Т. Иванов - Борецкий, 1874

- ~1936), 苏联音乐学家、作曲家。苏联历史音乐学(国外音乐)学派奠基人之一。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22年起)。作有歌剧《阿道尔菲纳》(1908)、《女魔法师》(1913)。
- [142] 扎塔耶维奇(А. В. Затаевич, 1869~1946), 苏联民族学学者、作曲家。哈萨克和吉尔吉斯民间音乐创作(记录2300余首)的采集者和研究者。
- [143] 卡巴列夫斯基(Д. Б. Кабалевский, 1904~), 苏联作曲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39年起)。作有歌剧《哥拉·布勒尼翁》(1938)、轻歌剧《春之歌》(1957)等。
- [144] 法因贝格(С. Е. Фейнберг, 1890~1962), 苏联钢琴家、作曲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22年起)。
- [145] 别雷(В. А. Белый, 1904~1983), 苏联作曲家。
- [146] 韦普里克(А. М. Веприк, 1899~1958), 苏联作曲家。
- [147] 汉斯·艾斯勒(Hanns Eisler, 1898~1962), 德国作曲家。20年代无产阶级音乐运动的参加者。作有前民主德国国歌、政治歌曲《共产国际》、《统一战线之歌》, 为B. 布莱希特剧作配乐, 另作有交响曲、室内乐和电影音乐等。
- [148] 萨博(F. Szabo, 1902~1969), 匈牙利作曲家。1932~1945年生活在苏联。
- [149] 舍赫特(Б. С. Шехтер, 1900~1961), 苏联作曲家。
- [150] 谢巴林(В. Я. Шебалин, 1902~1963), 苏联作曲家。1935年起任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 1942~1948年任该院院长。作有歌剧《驯悍记》(1955)及交响曲等。
- [151] 瓦季姆·柯切托夫(Вадим Кочетов, 1898~1951), 苏联作曲家。

- [152] 奥戈列韦茨(А. С. Оголевец, 1894 ~ 1967), 苏联作曲家。
- [153] 哈恰图良(А. И. Хачатурян, 1903 ~ 1978), 苏联作曲家。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1952年起)。所作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协奏曲、舞剧《加雅涅》(1942)和《斯巴达克》(1954)等获得世界性声誉。
- [154] 克尼佩尔(Л. К. Книппер, 1898 ~ 1974), 苏联作曲家。作有歌剧《贝加尔湖上》(1948)、舞剧《幸福之源》(1949)、20部交响曲等。
- [155] 斯塔罗卡多姆斯基(М. Л. Старокадомский, 1901 ~ 1954), 苏联作曲家。
- [156] 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韦斯宁(Вик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еснин, 1882 ~ 1950), 苏联著名建筑师三兄弟之老二, 苏联科学院院士(1943)。与哥哥列昂尼德(Леонид, 1880 ~ 1933)、弟弟亚历山大(Александр, 1883 ~ 1959)同为建筑学中“构成主义”派的代表人物。在集体设计时注重建筑物的实用效果, 在建筑中采用新式的结构和材料。
- [157] 所说的劳动宫建造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 [158] 科罗廖夫(Б. Д. Королёв, 1884/85 ~ 1963), 苏联雕塑家。作品有列宁雕像(1926)和一些纪念像, 性格刻划鲜明, 造型清晰。
- [159] 尼古拉·梅特纳(Николай Метнер, 1879/80 ~ 1951), 俄罗斯作曲家、钢琴家。1921年起侨居国外(1936年起在英国)。钢琴“幻想曲”体裁的创始人。作为演奏家, 他也是古典音乐的深刻解释者。

- [160] 科托夫斯基(Г. И. Котовский, 1881 ~ 1925), 国内战争英雄。在摩尔达维亚参加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中历任骑兵旅长、师长和军长。
- [161] 杰米扬·别德内(Демьян Бедный, 1883 ~ 1945), 俄罗斯作家。他的讽刺诗、抒情诗、杂文、寓言诗和歌词在国内战争时期广为流传。还著有长诗《关于土地、自由和工人的命运》(1917)、《大街》(1922)等。
- [162] 伊利亚·谢尔文斯基(Илья Сельвинский, 1899 ~ 1968), 俄罗斯作家。作品有长诗《乌利亚拉耶夫性格》(1927)、诗体长篇小说《皮毛货栈》(1928)等。
- [163] 泽林斯基(К. Л. Зелинский, 1896 ~ 1970), 苏联艺术家、评论家。写有苏联多民族文学和外国文学方面的著作。
- [164] 玛丽埃塔·沙吉尼扬(Мариэтта Шагинян, 1888 ~ 1982), 俄罗斯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中央水电站》(1930~1931)、描写列宁的四部曲《乌里扬诺夫一家》(1938)等。
- [165] 利季娅·谢芙琳娜(Лидия Сейфуллина, 1889 ~ 1954), 俄罗斯女作家。著有描写流浪儿童的中篇小说《违法者》(1922)、描写十月革命后农村习俗巨变的中篇小说《维里尼亚》(1924)等。
- [166] 卡西尔(Л. А. Кассиль, 1905 ~ 1970), 俄罗斯作家。苏联儿童文学创始人之一。著有中篇小说《违纪学生记过簿》(1930)、《什瓦姆勃拉尼娅》(1933)等。
- [167] 阿尼西莫夫(И. И. Анисимов, 1899 ~ 1966), 苏联文艺学家。1952年任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写有大量有关罗曼·罗兰的文章。一度计划撰写罗曼·罗

- 兰的传记,但最终没有完成。另有关于古典和现代外国文学的著作。
- [168] 巴甫连科(П. А. Павленко, 1899 ~ 1951), 俄罗斯作家。作品有描写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复兴的长篇小说《幸福》(1947)、中篇小说《草原的太阳》(1949)等。
- [169] 别济缅斯基(А. И. Безыменский, 1898 ~ 1973), 俄罗斯诗人。被誉为“共青团诗人”。著有长诗《共青团们》(1924)、讽刺诗剧《射击》(1929)等。
- [170] 尼库林(Л. В. Никулин, 1891 ~ 1967), 俄罗斯作家。著有历史长篇小说《俄罗斯的忠诚儿子》(1950)等。另有评论艺术家的著作和回忆录等。
- [171] 利金(В. Г. Лидин, 1894 ~ 1979), 俄罗斯作家。著有抒情短篇小说集《北方》(1925)、长篇小说《两种生活》(1950)等。
- [172] 安托科尔斯基(П. Г. Антокольский, 1896 ~ 1978), 俄罗斯诗人。著有长诗《七一年前的公社》(1933)、《儿子》(1943)。另有专著《论普希金》(1960)等。
- [173] 或许是指乌克兰作家和诗人先琴科(И. Е. Сенченко, 1901 ~ 1975)。作品有小说集《橡树林》(1929)等, 心理刻画细腻。
- [174] 诺维科夫-普里波伊(А. С. Новиков - Прибой, 1877 ~ 1944), 俄罗斯作家。中短篇小说集《坎坷》(1927)描写十月革命前以及十月革命过程中的水兵生活。
- [175] 恰连茨(Е. Чаренц, 1897 ~ 1937), 亚美尼亚诗人。作品有组诗《牺牲的火焰》(1918 ~ 1920)、诗集《史诗的黎明》(1930)、《道路之书》(1933)等。长篇小说《纳伊里之国》

- (1922)讽刺革命的敌人。
- [176] 皮斯卡托尔(E. Piscator, 1893~1966), 德国导演。柏林皮斯卡托尔剧院的组织者和领导人(1927~1932)。1933年起侨居苏联、法国、美国。1947年后在曼海姆慕尼黑等地工作。
- [177] 斯特凡·申科(1898~1967), 曾参加1919年匈牙利革命的匈牙利作家。1935~1937年生活在苏联。
- [178] 杰尔马内托(G. Germanetto, 1885~1959), 意大利作家。1921年加入意大利共产党, 并被选人中央委员会。1930~1946年旅居苏联。
- [179] 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 1904~1967), 法国电影史学家、评论家。法共党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加过抵抗运动。有电影艺术史方面的著作。
- [180] 基布里克(Е. А. Кибрик, 1906~1978), 苏联画家。曾为罗曼·罗兰的《哥拉·布勒尼翁》、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绘制插图。由他绘制插图的《哥拉·布勒尼翁》于1935年出版。另绘有革命历史题材组画《列宁在1917年》等。作品形象具有历史真实性, 心理刻画深刻动人。
- [181] 纳科里亚科夫(Н. Н. Накоряков, 1881~1970), 1903~1914年为布尔什维克, 1919~1920年在白卫军中服役。在列宁的批评教育和苏联现实的影响下改正了错误。1922年起在国家出版社工作。
- [182] 以总书记科萨列夫(А. В. Косарев, 1903~1939)为首的共青团中央的一些书记出席了这次会见。科萨列夫从1927年起任苏联共青团中央书记, 1929~1938年任总

书记。

- [183] 弗谢沃洛德·伊凡诺夫(Всеволод Иванов, 1895 ~ 1963), 俄罗斯作家。作品有中篇小说《游击队员们》(1921)、《铁甲列车 14 - 69》(1922)、《有色的风》(1922)等。另写有政论、日记、回忆录等。
- [184] 比罗比詹, 俄罗斯联邦犹太自治州中心, 位于比拉河畔, 1937年设市, 有农业机器厂、变压器厂、食品工业和木材加工业。
- [185] 雅克·梅尼尔(Jacques Mesnil, 1866 ~ ?), 法国文学评论家。罗曼·罗兰的朋友。
- [186] 马德伦·马克斯, 1919年由H.巴比塞建立的文学团体“光明社”的成员, 属于亲托洛茨基主义的反巴比塞派。
- [187] 莫鲁瓦(A. Maurois, 1885 ~ 1967), 原名埃米尔·埃尔佐(Emile Herzog), 法国作家。擅长罗马化传记体裁。著有雪莱、拜伦、屠格涅夫、雨果等的评传。
- [188] 富歇(J. Fouche, 1759 ~ 1820), 曾多次担任法国警务大臣, 建立警察侦讯调查和谍报的分支网。
- [189] 布洛涅林苑, 巴黎西郊的一所公园, 以大片森林为基础建成(1815 ~ 1854)。巴黎人的传统休息地。
- [190] 高尔基的住宅是根据俄罗斯著名建筑师、“现代派”代表人物Ф.О.舍赫捷利(1859 ~ 1926)的设计于1900至1902年建造的, 在专门文献中被认为是“现代派”风格的典范。
- [191] 心理技术实验室在苏联儿童教育中一度很盛行, 但由于在科学上站不住脚, 联共(布)中央于1936年7月4日专门作出决议予以谴责。

- [192] 影片《关于列宁的三支歌》的导演是 Д. 韦尔托夫(1895/96~1954),他是苏联和世界纪录电影的创始者和理论家。
- [193] 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 1878~1968),美国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屠场》(1905)、《煤炭大王》(1917)等。1906年,高尔基在美国结识辛克莱。1912年,辛克莱发起成立“国际联盟”,其任务是鼓动反对当代社会制度的罪恶,反对私有制和社会不平等。高尔基认为知识分子的国际团结具有重要意义,宣布愿意加入“国际联盟”并参与它的工作。这个想法没有实现。20年代,由于辛克莱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出版,他与高尔基的关系才得以恢复。
- [194] 德布兹(E. V. Debs, 1855~1926),美国社会党组织者之一,也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组织者。
- [195] 霭覃(F. van Eeden, 1860~1932),荷兰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小约翰》(3卷,1887~1906)等。
- [196] 马萨里克(T. Masaryk, 1850~1937),捷克政治活动家、哲学家和文学理论家。1918至1935年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924年夏,罗曼·罗兰曾应马萨里克之邀访问布拉格。1913年8月,马萨里克曾到住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高尔基那儿作客。马萨里克的哲学观点以及对宗教问题的兴趣与高尔基和罗曼·罗兰格格不入。
- [197] 南森(F. Nansen, 1861~1930),挪威北极考察家。1920~1921年任国际联盟主管战俘事务的最高委员。1922年获诺贝尔和平奖。1920年2月来到苏维埃俄罗斯,在彼得堡与高尔基会见并交谈。

- [198] 皇村, 普希金市 1918 年前的名称。1808 年起为历代俄国沙皇离宫。有 18~19 世纪宫廷花园建筑群。有巴罗克式宫殿, 内有“玛瑙房间”、“冷水浴室”、“卡梅朗回廊”。
- [199] R. 德弗莱尔(1872~1927), 法国喜剧作家。
- [200] “分寸第一”, 原文为拉丁文“ne quid nimis”。
- [201] 龙勃罗梭(C. Lombroso, 1835~1909), 意大利精神病学家、犯罪学家。犯罪学和刑法学中人类学派的创始人, 认为有的人天生具有犯罪倾向。
- [202] 菲林(С. П. Фирин), 国家政治保安局的负责干部。
- [203] 指的是白海—波罗的海运河, 连接白海和奥涅加湖, 长 227 公里, 平均深度 5 米, 1933 年开航。
- [204] 莫斯科—伏尔加运河, 1947 年后称莫斯科运河, 连接莫斯科河和伏尔加河, 长 128 公里, 有 8 座水电站。
- [205] 伊尔玛·亚温泽姆(Ирма Яунзем, 1897~1975), 苏联室内乐女中音歌唱家。采集和演唱苏联各民族歌曲。
- [206] 《雷诺国王》, 法国古代民间抒情叙事诗。
- [207] 彼什科夫(Пешков)是高尔基原来的姓。高尔基的儿子于 1934 年 5 月 11 日去世。1935 年 5 至 7 月, 高尔基的妻子和儿媳在欧洲旅行。
- [208] 提香(Tiziano Vecellio, 约 1476/1477 或 1489/1490~1576), 意大利画家。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画派的首要人物。
- [209] “年轻人”, 原文为意大利文“giovinezza”。
- [210] L. 弗拉皮耶(1863~1949), 法国作家。《幼儿园》是他的一部较为著名的长篇小说。

- [211] 萨满是萨满教的巫师,萨满教为宗教的早期形式,其基本观念是相信巫师(萨满)在行巫术时能与鬼神交往。萨满教的基本职能是“治”病。
- [212] 梅恩·里德(Mayne Reid, 1818~1883),英国作家。著有惊险小说,其中也贯穿着描写美国被压迫人民的斗争和苦难的主题,如《白人领袖》(1855)、《混血姑娘》(1856)等。里德的作品充满人道主义,情节曲折动人。
- [213] 《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即《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3月3日,苏维埃俄国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现名布列斯特)签订的条约。条约保证了俄国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1918年11月13日,俄国政府宣布废除条约。
- [214] “笨蛋”,原文为俄文“Дурак”。
- [215] 全苏实验医学研究所于1932年在列宁格勒成立,从1934年起迁至莫斯科。这个研究所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高尔基的建立“人体研究所”的想法。1932年11月27日,高尔基写信给罗曼·罗兰,详细地叙述了这件事。
- [216] 指的是1922~1939年存在的“援助政治犯协会”。
- [217] J.J.恩纳(1825~1905),法国画家。他的许多作品的色彩特点是暗淡的珠母色调与深棕色底色结合在一起。
- [218] 费奥多尔·革拉特科夫(Фёдор Гладков, 1883~1958),俄罗斯作家。他的长篇小说《水泥》(1925)描述国内战争之后工业恢复的情况,为苏维埃文学的经典作品。另著有长篇小说《原动力》(1932~1938)等。
- [219] 所说的显然是“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文化宫”,1930~1939年根据韦斯宁兄弟(参见注释[156])的设

计建造,最初设想是作为“无产者区文化宫”。

- [220] 特列嘉柯夫是俄国商人家族,从18世纪起闻名,拥有纺织企业。巴维尔·特列嘉柯夫(1832~1898)从1856年起收藏俄国现实主义艺术作品,并建立特列嘉柯夫美术馆。他的弟弟谢尔盖·特列嘉柯夫(1834~1892)收藏西欧绘画,曾任莫斯科市市长。1892年,两人将全部私人藏品捐赠给莫斯科市。1917年后,一系列博物馆以及私人的藏品并入特列嘉柯夫美术馆。该馆藏有极为丰富的11至17世纪古罗斯圣像画、18至20世纪初的俄国绘画、雕塑、版画以及苏联著名艺术家的作品。美术馆设于特列嘉柯夫家族的故居。
- [221] 麦绥莱勒(F. Masereel; 1889~1972),比利时画家。比共党员。所作木刻组画运用近似表现主义的艺术手法,还绘有插图组画、反战素描、肖像画、风景画、风俗画。1934年11月17日,罗曼·罗兰写信给高尔基,信中称麦绥莱勒是“当代最伟大的素描画家和版画家”,并坚决要求高尔基邀请麦绥莱勒访问苏联。
- [222] 诺夫哥罗德派,12世纪30年代至16世纪初古罗斯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该派建筑古迹造型宏伟而质朴,建筑体积密集紧凑。该派艺术有独具一格的民主精神,它反映在一些教堂的壁画上,同时也体现在该派色彩明快、造型简练的圣像画上。
- [223] 弗拉基米尔派,12至13世纪古罗斯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其建筑(如12世纪的弗拉基米尔大教堂)讲究匀称,饰有白石雕刻(浮雕和连拱带);其绘画形象丰满,画面宏伟(如1197年左右弗拉基米尔城德米特里耶夫大

教堂的壁画)。

- [224] 鲁布廖夫(А. Рублёв, 约 1360/70 ~ 约 1430), 俄国画家。莫斯科画派著名大师, 作品的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人性和高尚精神, 构思匀称协调, 艺术形式完美(圣像画《三圣像》)。参加教堂壁画和圣像画的创作。
- [225] 扬·凡·爱克(Jan van Eyck, 约 1390 ~ 1441), 尼德兰画家。他的作品建立在宇宙是统一和谐的认识的基础上。以革新的方法运用油画艺术, 成功地表现了充满光的空间和实物世界。完成由其兄胡伯特(Hubert van Eyck, 约 1370 ~ 1426)开始画的著名的《根特祭坛画》(1432年完成)。
- [226] 昆廷·马西斯(Quentin Massys; 约 1465/1466 ~ 1530), 佛兰芒画家。安特卫普画派的第一个重要画家。最著名作品是两件大型三联祭坛画:《圣安娜祭坛画》(现存布鲁塞尔)和《基督入殓》(现存安特卫普皇家美术馆), 都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感情和准确的细节。
- [227] 埃利亚瓦(Ш. З. Элиава, 1883 ~ 1937),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曾参加北方、中亚和格鲁吉亚等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1927年起为联共(布)候补中央委员。
- [228] 古里人, 格鲁吉亚民族之一, 格鲁吉亚西部地区古利亚的居民, 14 ~ 19 世纪初该地区为独立的古利亚公国。
- [229] 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 1494 ~ 1547), 法国国王, 1515 ~ 1547 年在位。实行了变法国为专制主义君主国的政策。
- [230] 对位旋律是复调音乐作品中与主题同时出现的旋律。复调音乐是以各声部具有同等价值为基础的一种多声

部音乐,分为3种:衬腔式复调音乐、模仿式复调音乐和对比主题式复调音乐。

- [231] 卡巴尔达人,自称阿迪格人,北高加索的一个民族,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
- [232] 布里亚特人,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联邦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的一个民族。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北部和中国东北也有部分布里亚特人。
- [233] 《佩波》(1935),亚美尼亚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导演 A. И. 别克-纳扎罗夫(1892~1965)。
- [234] 博诺(J. Bonnot, 1876~1912),法国无政府主义者,以他的姓氏命名的匪帮的首领,该匪帮以抢劫银行著名。在博诺被杀后,他的同伙被送上了法庭。
- [235] 《哈吉-穆拉特》,列夫·托尔斯泰所著中篇小说。其主人公哈吉-穆拉特(Хаджи - Мұрад, 1790年代末~1852)是高加索山民解放斗争的参加者、阿瓦尔汗国的统治者之一(1834~1836)、沙米尔的助手。多次打败俄国军队。1851年投向俄国人,在企图脱离俄国人逃往山里时被击毙。
- [236] 波别多诺斯采夫(К. П. 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1827~1907),俄国国务活动家、法律家。1880~1905年任正教院总监。反动势力鼓吹者。有法律史方面的著作。他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首次刊登在1934年出版的《文学遗产》第15卷中。
- [237]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Алексей Толстой, 1883~1945),俄罗斯作家。十月革命后,因在内战中支持白党而流亡西欧(1919~1923)。1923年,因思念故土而返回祖国。

- 苏联科学院院士(1939)。著有三部曲《苦难的历程》(1922~1941)等。
- [238] 李可夫(А. И. Рыков, 1881~1937),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18~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 列宁逝世后任主席。1922年后任党的政治局委员。20年代末期为反对斯大林的主要人物之一, 1929年11月被迫公开放弃自己的观点, 并被免除最重要职务。1936年后被卷入莫须有的叛国阴谋案。1937年初被捕, 被开除出党。1938年3月受审, 后以叛国罪被处决。
- [239] 潘菲洛夫(Ф. И. Панфёров, 1896~1960), 俄罗斯作家。《十月》杂志主编(1931~1960)。著有长篇小说《磨刀石农庄》(1~4卷, 1928~1937)等。
- [240] 哈拉托夫(А. Б. Халатов, 1896~1938),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在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1927~1932年任国家出版社理事会主席。
- [241] 薇拉·菲格纳(Вера Фигнер, 1852~1942), 俄国革命运动女活动家, “民意党”执委会委员。参与策划暗杀亚历山大二世。1884年被判处终身苦役, 1906~1915年流亡国外。著有回忆录《永不忘怀的劳动》(1964)。
- [242] 舒拉, 显然是高尔基家中的女佣。
- [243] 普拉加, 波兰首都华沙的一个地区。
- [244] 尼古拉耶夫(М. К. Николаев, 1882~1947), “国际图书”协会图书部主任, 高尔基家的朋友。
- [245] З. А. 彼什科夫(1884~1966), 高尔基的养子。1928年, 高尔基在回答向他提出的有关З. А. 彼什科夫的问题时

写道：“为进入高等学校而信奉东正教。在洗礼时给了他彼什科夫的姓氏，因为他的教父是高尔基。”彼什科夫是高尔基本来的姓。

- [246] 斯维尔德洛夫(Я. М. Свердлов, 1885 ~ 1919), 苏联党和国家活动家。1917年11月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兼任党中央书记。高尔基的养子是他的亲生哥哥。
- [247] 卡莫(С. А. Камо, 1882 ~ 1922), 又姓捷尔 - 彼得罗相(Тер - Петросян), 俄国职业革命家。在组织地下印刷所、运输武器和革命书籍以及没收沙皇政府货币等方面, 表现出特殊的创造性。1917 ~ 1920年为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游击队和地下党的组织者。
- [248] 劳伦斯(T. E. Lawrence, 1888 ~ 1935), 英国侦察员(1916年起在阿拉伯各国, 1925 ~ 1929年在卡拉奇、白沙瓦和阿富汗边界一带)。所著《七根智慧之柱》总结他在阿拉伯人中进行策反的经验教训。死于摩托车事故。
- [249] 彭加勒(R. Poincare, 1860 ~ 1934), 1913 ~ 1920年任法国总统, 后多次任总理和部长, 奉行军国主义政策, 因此得“彭加勒即战争”的绰号。在苏维埃俄国国内战争时期, 他是反苏武装干涉的组织者之一。
- [250] 巴比塞是前往参加1935年7月26日在莫斯科开幕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
- [251] 贝克(J. Beck, 1894 ~ 1944), 波兰毕苏斯基派领导人之一, 1932 ~ 1939年任外交部长。
- [252] 尤登尼奇(Н. Н. Юденич, 1862 ~ 1933), 沙俄将军, 国

- 内战争中反革命主要首领之一。1919年任白卫军西北集团军总司令。1920年起流亡国外。
- [253] 埃尔米塔日博物馆,列宁格勒的美术、文化历史博物馆,是世界最大博物馆之一。1764年建立,为叶卡捷琳娜二世的个人收藏品,1852年对公众开放,建筑物包括冬宫等。
- [254] 拉德日尼科夫(И. П. Ладыжников, 1874~1945),俄罗斯革命运动活动家。从1904年起与高尔基有联系。1905年,受党中央委托,先后在日内瓦和柏林建立出版马克思主义文献的图书出版社。1921年起在柏林的“书籍”出版贸易公司工作。
- [255] 比留科夫(П. И. Бирюков, 1860~1930),俄国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写有巨著《列夫·托尔斯泰传》(1~4卷,1922~1923)。
- [256] 利约,法国旧时的长度单位,约等于四、五公里。
- [257] 陶尔斐斯(E. Dollfuss, 1892~1934),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领导人之一,1932年起任奥地利联邦首相兼外交大臣。1934年3月签署所谓的罗马条约,使奥地利在政治上依靠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同年6月,被主张“德奥合并”的奥地利纳粹分子刺死。
- [258] 以下文字是罗曼·罗兰在返回瑞士后于1935年8至9月间写的,后来他又加了若干注释。
- [259] 克伦威尔(O. Cromwell, 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由于反对国王、捍卫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而成为清教革命领袖。1644年,他招募的骑兵在马斯顿荒原一役战胜保王党鲁珀特王子的部队,此后

被人称为“铁甲军”。1650年起任全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653年建立军事独裁专制制度——保护国制度。马克思曾说,克伦威尔在英国革命中“集罗伯斯比尔和拿破仑于一身”。

- [260] 马努伊尔斯基(Д. 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 1883~1959), 俄国和国际革命运动活动家。十月革命参加者。1928~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1923~1952年为苏共中央委员。有国际工人运动方面的著作。
- [261] 萨伏那洛拉(G. Savonarola, 1452~1498), 意大利基督教宣传士。佛罗伦萨多明我会隐修院院长。号召教会实行苦行主义, 谴责人文主义文化。曾运用权力发动“焚烧虚妄”运动, 手饰、淫画、纸牌、赌台一律投之于火。1497年被革除教籍, 并被隐修院院方判处死刑。
- [262] 罗伯斯比尔(M. Robespierre, 1758~1794), 法国大革命活动家, 雅各宾派领导人之一。1793年为革命政府的实际领导人。由于打击左派社会势力, 削弱了雅各宾派专政的社会基础。被热月政变派分子处死。
- [263] 第三等级为法国15~18世纪的纳税居民阶层, 包括商人、手工业者和农民。16世纪起资产阶级和工人亦包括在内(前两个等级为僧侣和贵族; 与第三等级的区别在于不纳税)。1789年5月, 国王路易十六召开三级会议, 第三等级的代表们于6月17日宣布自己组成国民会议, 7月9日改名为制宪会议。当局要求解散这个会议的企图引发了人民起义。起义人民于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狱, 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开端。
- [264] 督政府, 根据法国共和3年宪法而建立的法国革命政

- 体,前后持续4年(1795年11月~1799年11月)。督政府有一个两院制立法机构:立法院(即下议院)由30岁或30岁以上议员500人组成,元老院由40岁或40岁以上议员250人组成。元老院从立法院提出的名单中遴选5名督政官,督政官任命政府部长、陆军统帅、税吏和其他官员。督政府是法国前所未有最腐败的政权。
- [265] 波拿巴主义,大资产阶级依靠军阀和农民中的反动阶层,在阶级力量不平衡的条件下,在进行斗争的各阶级中看风使舵的一种反革命专政的统治形式。
- [266] 萨尔,德国的一个州,1919年交国际联盟委员会管理(煤矿为法国所有),1935年通过全民投票归属德国。
- [267] H.巴比塞于1935年8月30日在莫斯科去世。
- [268] 奥古斯都(Augustus,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公元前27年起为罗马皇帝。凯撒之甥孙及养子。公元前31年打败罗马统帅M.安东尼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从而结束凯撒死后古罗马的内战局面(公元前43年~前31年)。他虽保留了传统的共和制国家机构,但权力集于己身,在历史文献中称之谓“元首政体”。
- [269] 安东尼(M. Antonius,公元前约83~前30),罗马统帅。凯撒的部将,公元前42年出治罗马东部行省。与埃及女皇克娄巴特拉结婚。后自杀。
- [270] 马萨林(J. Mazarin, 1602~1661),意大利人,红衣主教,1640年离开教廷,进入法国官场。1643年起任法国首相,在国内拥有无限权力,使法国成为欧洲的政治盟主。
- [271] “哀怨声”,原文为意大利文“Lamento”。
- [272] “他不想看到、但他看到了”,原文为黑体。

- [273] 罗曼·罗兰在离开莫斯科后,与布哈林之间是否有书信往返,这不得而知。1936年9月10日,《消息报》刊登苏联检察机关通告,宣布中止布哈林案件,此后罗曼·罗兰向布哈林发了祝贺电报。此前不久,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在布哈林担任主编的《消息报》上,刊登了有关被告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赖因霍尔德关于托姆斯基、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参与反革命活动的证词的声明,这是1936年8月22日。1937年春天,布哈林被捕。这促使罗曼·罗兰写信给斯大林本人。他在日记中写道:

即使我没有任何个人理由对正在莫斯科进行的审讯中作出的判决感兴趣,像拉狄克那样的人物也使我本人感到不安,还有布哈林,同样的危险正威胁着他。

在莫斯科以及在高尔基那儿,我经常与布哈林见面。我对他很有好感,而且,我认为他的感情是真诚的。

虽然我不很清楚他的非常完整的和学究式的思想体系,在我看来,他是头脑灵活的人,机敏而率直。

尽管在莫斯科报刊上展开了反对他的运动,我不能相信他有罪;有太多的理由担心,将会对他作出什么样的判决。

我于3月18日(1937年)写信给斯大林。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利用两年前我与您交谈时您给我的信任,我再次向您求助。

在审讯布哈林的时候,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对他提

出的公诉，故尔诉诸于您的崇高的人道精神和您对苏联最高利益的理解。布哈林式的智慧——这对他的国家来说是财富，为了苏联科学的利益和理论思想的发展，他能够并且应该得到保护。

如果敌对的思想体系使他产生了某些错误，那么，应该给他克服错误的机会，而不是因为这些错误而起诉这么有头脑的一个人。他自己就能抛弃这些错误，这么做有利于撕下这些错误的假面具，坚决地与这些错误作斗争。

在天才化学家拉瓦锡被斩首的事情上，我们全都负有责任，我们是最勇敢的革命者，忠实于对罗伯斯比尔和伟大的公安委员会的回忆，我们深深地感到悲痛和遗憾。

在我们共同的朋友马克西姆·高尔基那儿，我经常见到布哈林，最亲密的友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

如果这些回忆能够拯救布哈林，那么，为了高尔基，我请求您发一下慈悲心，即使他可能在什么事情上有罪，他也应该被另眼相看，因为他能够成为苏联科学的骄傲。

(我把此信亲手交给苏联驻巴黎大使波特金，请他读完信后尽速把信转递给斯大林。)

信中提到的拉瓦锡(A. L. Lavoisier, 1743—1794)是法国化学家，现代化学之父。在化学研究方面系统运用数量方法，阐明氧在燃烧、金属煅烧和生物呼吸过程中

的作用,据以驳斥支配化学发展长达百年之久的燃素学说。拉瓦锡从 1768 年起在政府征税机构中任职,在法国大革命中,极左派因此对他提出莫须有的指控。1792 年 11 月,国民公会下令逮捕前征税机构成员。1794 年 5 月开庭审判,不到一天的审理就判处拉瓦锡等 27 人死刑,5 月 8 日被送上断头台。

“公安委员会”(1793~1795)是法国国民公会下属的一个委员会,在雅各宾派专政期间(1793 年 6 月 2 日~1794 年 7 月 27/28 日)它实际上担负政府的职能,该委员会领导人是 M. 罗伯斯比尔。

- [274] “犯错误是人所固有的”,原文为拉丁文“Errare humanum est”。

罗曼·罗兰小传

夏伯铭

孤独的童年

在法国中部盛产葡萄名酒的勃艮第地区，在位于巴黎东南大约 150 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克拉姆西的小镇。小镇所在的尼韦奈山区景色如画，那起伏的绿色丘陵、美丽的葡萄园、罗马式的教堂和遗址是当地人世代赖以骄傲的资本。1866 年 1 月 29 日，罗曼·罗兰就出生在克拉姆西镇上的一个旧式庭院内。

罗曼·罗兰的祖上连续几代都是公证人。公证人是政府任命的一种公职，可以传代，也可以将执照作价转让，传到父亲埃米尔·罗兰已是第五代。公证人替人订立契约、保管财产、执行遗嘱等，凡属契据，必须有公证人签字，否则在法律上无效。公证人象律师一样，是一种自由职业，但与律师不同的是不替人打官司。罗曼·罗兰的母亲玛利·古洛是公证人的女儿，笃信宗教，喜爱音乐，感情细腻，与性情开朗、乐观知足、喜爱户外运动的埃米尔·罗兰结婚可谓门当户对，但双方的性格不太一致，所以婚

后的感情并不融洽。罗兰一家作为恪守传统的公证人家庭,在镇上颇受人敬重,但由于生意清淡,虽然说不上生活贫困,家境毕竟显得拮据。

罗曼·罗兰的乡间的、中下层阶级的出身影响了他毕生的生活态度。他始终保持终于家庭和好友的传统价值观念。他不追求时尚,生活简单朴素,认为奢侈浪费、寻欢作乐、物质享受、夸耀财富和社会地位是多余的。他的衣着始终是保守的,一成不变的白色高领、黑领带和黑西装使他看上去像是一个忧郁的牧师。他的家中除了书籍以及朋友们送的或者用不多的钱买的几件艺术品,没有什么精美的陈设。早年的外省乡间生活使他形成了对都市生活敬而远之的复杂情感,他宁愿孤独地生活和工作,远离城市。从1914到1939年,他基本上生活在瑞士山区。他回避日常社交和各种无所用心的陈腐娱乐,厌恶咖啡馆社交界和沙龙。

罗曼·罗兰自幼体弱多病,在他不满周岁的时候,一个粗心的年轻保姆使他几乎在寒风中冻死,结果他患了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症,时常发作,使他受了一辈子的罪。

也许是由于身体虚弱的缘故,罗曼·罗兰从小就受到母亲的宠爱。在他5岁时,他的3岁小妹妹马德莱娜因患白喉病突然死去,此后母亲对他更是关怀备至。这种状况在他的仍取名为马德莱娜的新妹妹出世后也没有改变。这个妹妹终身未婚,始终是他的忠实知己和助手,在他去世后,又收集整理他的文稿,帮助建立纪念他的团体。

1873至1880年,罗曼·罗兰在克拉姆西学校就学,学业成绩平平。这个瘦弱的、面色苍白的男孩不善交际,为了消除孤独,就埋头读书,沉湎于幻想。他特别醉心于法国科幻小说家凡

尔纳、浪漫主义小说家夏多布里昂和古典主义戏剧大师高乃依的作品。母亲手把手地教他弹钢琴,这使他的幼小心田受到音乐的滋润,贝多芬和莫札特的乐曲是他童年时的一大精神支柱。

两次落榜

罗曼·罗兰的母亲深信儿子的天赋,认为他必定会有远大前程,决心不让他再当公证人。她要让儿子在最良好的条件下和她的亲自监督下接受更高的教育。在她的鼓动下,全家于1880年10月迁居巴黎,住在塞纳河左岸地区的一套公寓里。埃米尔·罗兰费了很大的劲才在一家银行谋得一个小职员的位置,全家的生活比以前更显拮据。

到巴黎后,罗曼·罗兰进了著名的圣路易中学。法国中学高级班分文、理两科,文科称为“哲学班”,理科称为“数学班”。罗兰上的是数学班,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兴趣确实不在数理方面,学习数理课程有困难。1883年,他转学到路易大帝中学,改上哲学班,目标是报考巴黎高等师范学校。

但是,罗曼·罗兰更感兴趣的不是学校的课程和高师入学考试的科目,而是莎士比亚的戏剧、维克托·雨果的小说和瓦格纳的歌剧。因此,他没有通过巴黎高等师范学校1884和1885年的两次入学考试。这时,他似乎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必须考上高师,才能保证一生温饱。考取之后,就能得到3年食宿费用——我急于使父母卸下养育我的沉重负担——而且毕业之后,就能在教育界获得一个职位。我已两次投考失败,只剩下最后一次投考机会了……所以我把一切欲望、一切梦想都加以控制。”

1886年,罗曼·罗兰终于如愿以偿,进入了名牌学府巴黎高等师范学校。高师的教授都是知名学者。学生3年毕业以后,在学术界、教育界或文学界历来受到尊重。当时高师文科分哲学、史学和文学3个系,罗兰选修史学,主要是为了熟悉历史,积累材料,准备今后写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在高师3年的学习生活中,罗兰阅读了大量文史哲名人的名著,特别崇拜斯宾诺莎和笛卡儿的哲学。他还先后给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写了7封信,探讨人生意义和艺术目的等问题,并收到托尔斯泰一封长达28页的法文复信。

高师的学生生活很快结束了,罗曼·罗兰顺利通过了历史学考试,获得了在法国中学和大学执教的资格,可终身不愁衣食无着。可惜的是,他并不喜欢教书匠的职业。在他的大学生时代和他的一生中,他都厌恶法国的大学制度。有一次他曾说,教授们什么都知道,但什么都不明白。他在通过高师毕业考试后说:“啊,我是多么鄙视所有这些考试!”从他跨入高师大门的20岁时起,他就立志终身从事文学创作。

正当罗曼·罗兰面临不得不走上讲坛的尴尬时刻,一个偶然的机会有救了他。设在罗马的法国考古学院有一名研究生空额,由高师校长推荐,罗曼·罗兰补了这个缺。

此前不久,经他的老师、历史学教授加布里埃尔·莫诺介绍,他在巴黎认识了70多岁的德国老夫人玛尔维达·冯·迈森堡。在罗马的两年时间里,他几乎每天晚餐后都去拜访正在罗马休养的玛尔维达,在这个修养颇深的贵族老夫人和这个天赋极高的青年学者之间,形成了十分真诚的友谊。在以后十余年不间断的书信往返中,他们展开推心置腹的精神交流,长者以宁静的智慧鼓励罗曼·罗兰,年轻的学者则以天真的热忱安慰玛尔维达

孤寂的暮年。罗曼·罗兰在回忆录中深情地把 1903 年去世的玛尔维达·冯·迈森堡称为“第二母亲”。

初恋和婚姻

正是在玛尔维达家中，罗曼·罗兰经历了初恋的激情和失恋的痛苦。他在那儿认识了两个年轻美丽的意大利姑娘，她们是姊妹俩，一个黑头发，另一个却是金黄头发。他爱上了其中一个名叫索菲娅的，爱得如痴如醉。《约翰·克利斯朵夫》中的人物葛拉齐亚即以她为原型。他说：“我从她那黑暗的楼梯中走下来时窥见了一张年轻的臉，使我的心人迷了……你在我血液中燃起的火是普罗米修斯的火。我从那时起的一切创作都是你激发的。只有当你被体现在葛拉齐亚的形象中时，这火焰才熄灭……”索菲娅虽然与罗曼·罗兰关系密切，但对他的爱却没有作出回应。她后来与他人结婚，但婚后仍与罗曼·罗兰不断通信达 30 年之久。

从罗马返回巴黎之后，罗曼·罗兰又一次面临不得不教书的难题。他想尽办法拖延，甚至申请充当图书馆或博物馆的管理人员以代替教书，但没有成功。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回到母校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讲授艺术史直到 1901 年，此后在巴黎大学讲授艺术史直到 1912 年。

不过，这时他的爱情之花却迅速结出了硕果。1892 年 4 月 11 日，他初遇克洛蒂尔德·布雷亚尔小姐，两人一见钟情，到 10 月底就结了婚。克洛蒂尔德是犹太人，父亲米歇尔·布雷亚尔是法国最高学术机关“法兰西学院”的著名语言学教授，是巴黎所谓“上流社会”的一员，平时来往的不是名流学者，就是犹太富

翁。阔小姐克洛蒂尔德看上穷书生罗曼·罗兰,这自然是因为后者的学识和才华,她相信有朝一日罗曼·罗兰定会飞黄腾达。布雷亚尔教授给女儿的婚事附加了一个条件:罗曼·罗兰必须写出博士论文。罗曼·罗兰接受了这个条件。

丈人给女婿定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现代歌剧的起源》。罗曼·罗兰夫妇婚后不久前往意大利,用了4个多月时间为博士论文收集材料。返回法国后,又用大约半年时间写成了博士论文,同时写成了副论文《16世纪意大利绘画衰落之原因》。按照法国大学的规定,考国家博士必须写出正、副论文各一篇,副论文还必须用拉丁文书写。罗兰的两篇博士论文很容易地获得通过,并在学术界获得好评,但他难以割舍的倒是那些写了出来却没有地方发表或排演的剧本。这些最初创作的剧本十之八九取材于历史,结果连手稿都没有保留下来。

在从1893年起的10年里,罗兰共写了12个剧本,当时都没有发表,只有个别剧本在小剧院上演过,但它们都失败了。胡风先生在1945年7月写的《罗曼·罗兰断片》一文中,对当时罗曼·罗兰的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努力一个个失败了,幻想一个个破灭了,10年,15年,他工作在寂寞和痛苦里面而得不到回声。当时的法国艺术界里的卑劣面怯懦的腐败势力,却是一个九头的怪物,操纵着书店,占据着期刊,垄断着剧场,包围着报纸,把一切和读者交通的道路都统治在自己手里,毒害着读者底心灵,使他们跟随着自己的庸俗思想走,罗兰的作品只偶尔一两次在报纸批评栏里受到过两三行污蔑的评语。他们大概经常‘还要发出一种满意的笑声’的罢。”

罗曼·罗兰的婚后生活优裕了许多,这显然是靠了妻子的陪嫁资产。但是,夫妻之间的矛盾不久就暴露了出来。妻子热衷

于出入“上流社会”的社交沙龙,但罗曼·罗兰对那儿的腐朽庸俗的气息感到恶心。此外,由于丈夫迟迟不能发迹,克洛蒂尔德也未免感到失望。情趣和追求的不同终于导致这对夫妻于1901年5月离异。罗兰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如今相爱的两人分离,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为其他东西而牺牲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也因为我们生活的目标是对立的。”不过,两人可以说是友好分手。罗兰在给玛尔维达的信中说:“与其苟延早就舍弃的感情,不如直接承受痛苦,诚意地离婚较好,我们两人都喜欢如此。”两人离婚后长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迟至1935年7月,罗曼·罗兰在访问莫斯科时,还给前妻写信。克洛蒂尔德后来嫁给一个音乐家,但过了一个时期又离婚了。

名扬四海

离婚后,罗曼·罗兰租了巴黎左岸地区蒙帕尔纳斯大街162号的一套较为简陋的公寓,一个人住在里边,深居简出,埋头写作。从1903至1912年,他用了10年时间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全书法文版长达1600页,共分10卷,每年一卷,陆续问世。此书可以说是罗曼·罗兰艺术史研究工作的副产品,因为这部小说有许多地方取材于几个德国音乐家的生平,其中最重要的是贝多芬。小说中关于克利斯朵夫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开头几卷就是以贝多芬的真入真事为蓝本的,为此他数次到莱茵河畔的贝多芬故乡参观访问。

《约翰·克利斯朵夫》虽说用10年时间写成,但他必须到巴黎大学授课,每天的写作时间不过个把小时,甚至更少。只是在每年7至10月学校放暑假时,他才有时间全力以赴地写作。

在构思和写作《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同时，罗曼·罗兰还进行其他形式的创作。鉴于以前剧本创作的失败，他开始写《名人传》。罗兰写《名人传》的计划很庞大，但后来只完成3种，即《贝多芬传》、《米凯朗琪罗传》和《托尔斯泰传》。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命运与罗曼·罗兰以前创作的剧本不同，能够顺利问世，这得力于他的朋友夏尔·贝玑及其《半月丛刊》。贝玑也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念过书，但比罗曼·罗兰晚几年。本世纪初，贝玑孤注一掷地用自己有限的积蓄和妻子的全部陪嫁创办《半月丛刊》，专门发表他认为有价值但遭巴黎文坛抵制的一些青年作家的作品。1903年，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也是在《半月丛刊》上首次发表，结果出乎意料地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从而给罗曼·罗兰带来最初的名誉。

不过，在《半月丛刊》上发表作品没有分文稿费，而且贝玑还颇不讲理地不准这些作品再在别的地方出版。罗兰能容忍没有稿费，却绝对不能同意后一条规定，结果两人弄得不欢而散，但罗兰始终对贝玑怀有感激之情。

随着《约翰·克利斯朵夫》的逐年问世并越来越受欢迎，罗曼·罗兰的名声也越来越大。早在小说写完之前，小说的英文版、西班牙文和德文版就已在许多国家接二连三地出版。这部小说成了许多国家读者的崇拜物，由人物、故事、富有创见和感情洋溢的理想主义所激起的热情使千百万读者激动不已，他们把《约翰·克利斯朵夫》看作可信赖的伙伴和精神养料的来源。

罗曼·罗兰及其作品也成了法国文学界讨论和争议的中心。1913年6月9日，他获得了法国科学院的文学大奖。但罗兰似乎并不喜欢这种文学奖，他说：“让这些奖见鬼去吧！”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广泛流行不仅使罗曼·罗兰声誉鹊

起,同时也给他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决定性地改变了他的生活。作为他的时代公认的经典著作的作者,他现在能写任何想写的东西,几乎能在他愿意的任何地方出版作品。他已不必勉为其难地依靠教书维持生计。1912年7月,他正式辞去了巴黎大学的教职,从此不再登上讲台。

虽然他教了近20年的书,却从未养成对公开演讲的兴趣。即使在他的事业的高峰时期,他也很少公开露面,并一概谢绝在集会上或重大游行时发言。

所谓乐极生悲吧,1910年10月28日,罗曼·罗兰在巴黎著名的香榭里舍大道上被一辆疾驶的汽车撞倒,因手腕和左脚重伤卧床3个月。1913年2月,这次车祸的诉讼胜诉,罗兰获得2万5千法郎赔偿金。

获诺贝尔奖

1914年6月,罗曼·罗兰前往瑞士旅行。7月31日,在日内瓦莱芒湖畔维卫镇火车站的布告栏上,他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消息。由于身体虚弱且过了兵役年龄,他没有回法国。9月15日,他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政论《超乎混战之上》,明确表示了反对这场屠杀性战争的态度,呼吁德、法两国在战争中尊重真理和人性。他认为,欧洲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都是伟大的民族,应该亲如兄弟,团结前进。但是,在法国,因为他反对并讥讽保卫法兰西民族的生存和光荣历史的“神圣战争”,人们纷纷骂他是“卖国贼”。

此后不久,罗曼·罗兰志愿参加国际红十字会新成立的“战俘通讯处”的工作,将战俘的信件转给各自的亲属,同时设法把

亲属的来信交到战俘手中。罗曼·罗兰在“战俘通讯处”义务工作9个月,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离开“战俘通讯处”后,他定居在日内瓦附近维勒讷沃镇的拜仑旅馆,直到战争结束。

1915年秋,罗曼·罗兰得到消息,瑞典文学院打算把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他。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是中立国,主张和平,反对战争,这种立场与罗曼·罗兰在《超乎混战之上》一文中表达的观点是一致的,所以,把诺贝尔奖颁发给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法国政府明确表示,反对把诺贝尔奖颁发给被他们视为“卖国贼”的罗曼·罗兰。如果瑞典向罗曼·罗兰授奖,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参加颁奖仪式。

法国政府的讹诈似乎起了一点作用。迟至次年11月15日,瑞典文学院和瑞典外交部才给罗曼·罗兰发来电报,正式宣布他是1915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半年多以后,1917年6月初,审慎的瑞典政府才把获奖证书和奖金寄给住在维勒讷沃的罗曼·罗兰。他立刻把全部奖金分赠给了法国的若干难民救济组织和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

1919年5月2日,罗曼·罗兰在维勒讷沃接到“母病危”的电报,便即刻动身回法国。5月19日,母亲病逝,而罗曼·罗兰也病倒在巴黎。罗曼·罗兰的父亲于1931年6月16日去世,活到94岁高龄。

1922年4月30日,罗曼·罗兰告别巴黎,再次来到瑞士。他决心在瑞士常住,所以不再像以前那样住旅馆,而是在俯瞰莱芒湖的山区小镇维勒讷沃租了一幢小楼。也是在这一年,罗兰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欣悦的灵魂》(又译《母与子》)开始分7卷出版,1933年全书出齐,篇幅之大与《约翰·克利斯朵夫》不相

上下。但是,写作这部小说并没有用10年时间,因为从1928至1931年,他沉缅于印度宗教思想和甘地的研究,写小说的工作几乎完全中断。

在莱芒湖畔隐居的十几年中,除了本行的文学创作,罗曼·罗兰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活动:从1922年起几乎用了10年时间研究印度思想,与现代印度的代表人物甘地、泰戈尔、尼赫鲁等都有交往;从20年代末起积极从事反法西斯斗争,一直继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夜;支持和拥护苏联。

拒绝歌德奖

1926年4月,罗曼·罗兰发表谴责意大利法西斯的文章:“建立在意大利法西斯原则上的任何制度,对人类的良心而言,都是一种堕落。它藐视最神圣的自由权,强迫人们接受谎言,制造恐怖,靠这一切来实行统治。”也是在这一年,罗曼·罗兰与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密切合作,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于1927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

1932年8月,声势浩大的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大会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多达2200名。罗曼·罗兰被推举为大会主席,他在发言中号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见的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无派人士团结起来,反对法西斯,反对战争。

早在1933年1月10日,罗曼·罗兰就获悉,德国政府打算授予他歌德奖——德国授予艺术和科学领域作家的最著名奖项。4月19日,德国总统兴登堡通过德国驻日内瓦领事授予他此奖。尽管此奖属于1932年度,是纳粹上台执政之前的事,尽管他深深感激德国文化对他的熏陶,但他断然拒绝接受歌德奖。

他怀疑德国人企图收买他对法西斯主义的反对,同化他对反法西斯事业的同情。他答复德国领事说:“今天在德国发生的一切,如自由的被弃置,反对党的受迫害,犹太人成为粗暴和卑鄙的压迫对象,凡此种种,都引起全世界的公愤,也激起我个人的义愤。这样的政策是对人类犯罪。”事实证明,罗曼·罗兰的担心是完全有道理的。到今年9月,罗兰就获悉,纳粹德国查禁了他的全部著作。

从伟大的十月革命爆发时起,罗曼·罗兰就一贯对俄国和苏联的事业持坚决支持的态度。他说:“我认为,1917年11月7日是自由法国大革命的光荣时期以来,世界社会史上最伟大的日子;而且,这个人类向前迈出的新脚步,比从旧政体跳向法国大革命的飞跃,还要来得更高更远。”

1924年列宁逝世,罗曼·罗兰发了唁电,重申他坚决支持俄国革命的立场。1927年5月,他在答复无政府主义者在法国出版的刊物《自由人》时说:“无论对苏联领导人有什么不满,我必须对全欧洲自由的人们大声疾呼:今天的苏联处于危险的境地,万一俄国被摧毁,那么不仅全世界无产阶级将被奴役,一切社会自由和个人自由必将同归于尽……世界将倒退几个阶段。”同年9月,他在给苏联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中说:“我从不讳言我与俄国革命之间的一切距离……然而,我曾是最早承认俄国革命的伟大及其历史必然性的人之一。我始终这样承认,而且相信俄国革命是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先锋。”1932年,他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世界反战反法西斯大会上发言时说:“苏联存在的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的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来说,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1933年4月,他在答复一个西方学者的公开信中说:“我自己……毫不犹豫地站在

苏联一边,她是代表着新的劳动世界的唯一堡垒……即使苏联不代表我们的共同理想,她的死敌却是我们的公敌。”

重 结 良 缘

从20年代起,罗曼·罗兰的作品开始在苏联广泛流行,与此同时,大量苏联读者的来信源源不断地来到罗兰手中。1924年12月24日,罗曼·罗兰在写信给朋友、意大利妇女贝尔托利尼时说:“最近几个月,我收到许多来自俄罗斯的消息,什么消息都有,既有好的,也有坏的,但都是事实。”

在给罗曼·罗兰写信的苏联读者中,有一个叫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库达舍娃。读者与作家之间的书信往返最终导致相识和结婚。玛丽亚出生在俄国,父亲是俄罗斯人,母亲是法国人。1929年,玛丽亚在高尔基的帮助下从苏联来到瑞士,担任罗曼·罗兰的秘书,成了他在文学创作方面不可替代的助手。她还给罗曼·罗兰讲述苏联报刊上的消息和苏联的各种事情,对他了解苏联起了极大的作用。罗曼·罗兰在1931年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说:“玛丽亚·帕夫洛夫娜为了使我更好地理解 and 爱上新俄罗斯,做了很多事情。”

1934年,离婚已33年的罗曼·罗兰与再婚的玛丽亚·帕夫洛夫娜喜结良缘。美国研究者戴维·詹姆斯·费希尔认为,在罗曼·罗兰暮年,“妻子的不倦帮助和温柔体贴无疑延长了他的生命,她悉心照顾他,将来访者拒之门外,为他提供宝贵的行政和秘书的服务。”这种宝贵的服务在罗曼·罗兰去世后仍在继续。罗曼·罗兰夫人整理和出版他的译稿,恰当处置他的丰富文学遗产,直到她本人于1985年逝世。

1936年，在罗曼·罗兰访问莫斯科的次年，斯大林发起了迫害反对派的大清洗运动。罗曼·罗兰虽然反对这种做法，但他不认为自己有权公开说出自己的愤慨。他不得不把对在苏联发生的事件的看法埋在心中，为的是“在法国和全世界存在的疯狂的敌人”不能把他的话作为“用于其自私目的的恶毒武器”。

可是，罗曼·罗兰的一些朋友却不能或者不想理解他的这番苦心。1936年，罗曼·罗兰的老朋友亨利·吉尔博在一封信中企图迫使他公开反对莫斯科的清洗审判，但没有成功。可吉尔博并不死心。1937年，他写了一本题为《苏联人的末日》的书，其中一章的标题竟是《罗曼·罗兰的国家婚姻，克里姆林宫的囚犯》。吉尔博在书中说，斯大林官僚政权的“大人物”指派玛丽亚·帕夫洛夫娜执行“特殊使命”，努力使罗曼·罗兰脱离他的妹妹马德莱娜的和平主义的和自由主义的影响。总之，罗曼·罗兰娶了一个苏联间谍，证据是他尽管知道斯大林的暴政，却仍不加批判地支持苏联。自从玛丽亚成为罗曼·罗兰的秘书后，尤其是在这种苏联的“国家婚姻”缔结后，他们简直形影不离。她据说“过滤”了他可能有的对国际共产主义的一切批判性观点。吉尔博最后说，罗曼·罗兰如此可耻地被共产党领导人利用，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

罗曼·罗兰读了吉尔博的书后极为气愤，认为这种指控纯粹是污蔑，私下里断绝了与吉尔博的关系。攻击罗曼·罗兰的意识形态立场是一回事，污蔑他的婚姻却是地地道道的背叛。罗曼·罗兰还断绝了与另一个赞同吉尔博的指控的朋友的关系，他解释说，污蔑我的私生活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事情。

叶落归根

1937年,罗曼·罗兰结束在瑞士的长期自我流放,回到法国。但他没有回巴黎,而是在家乡附近的乡间小镇韦兹莱买了一所“小而舒适”的房子。他并不打算从此无所作为,安度残年。相反,他仍一如既往,笔耕不止,除了写信,写日记,写回忆录,他还继续进行贝多芬研究,写了剧本《罗伯斯比尔》、传记《贝玑》。他甚至还有写第三部长篇小说的计划。

1939年9月3日,当英、法两国对德国宣战时,罗曼·罗兰已73岁。他仍住在韦兹莱,偶尔到位于巴黎左岸地区蒙帕尔纳斯大街82号的公寓处理文学创作上的事务,顺便请医生治病。他的心、肺、肠和眼睛都患有慢性病,行走和呼吸感到困难。由于战争的缘故,食品缺乏,作品销售困难,没有可交流思想的朋友,罗曼·罗兰的生活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不顺畅。一些好心的熟人劝他离开法国,去美国寻找避难所。罗兰觉得年龄太老,文化上又离美国太远。

罗曼·罗兰因年迈和体弱,不能参与积极的反对纳粹占领军和维希傀儡政府的活动,但他的心是与法国抵抗运动连在一起的。鉴于他在30年代的公开的亲苏亲共的政治信念,维希政府认为他是危险人物,把他列为反法西斯分子。警察监视他的住所,拆开他的信件,传播他的流言蜚语,不时地骚扰他。《约翰·克利斯朵夫》被当局列为禁书,据说此书会腐蚀法国青少年。一小队德国兵就驻扎在他对面的房子里。罗曼·罗兰夫人一度担心,丈夫随时有可能被捕或被暗杀。

1944年8月24日,巴黎解放。11月7日,罗曼·罗兰不顾病弱

的身体,让人搀扶着乘车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祝贺十月革命节,祝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韦兹莱家中安然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被安葬在家乡克拉姆西他父母的坟墓旁。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安息吧,我的头脑!安息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即使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这是罗曼·罗兰本人对他不断寻求真理、向往光明和进步的一生所作的恰当总结。

的身体,让人搀扶着乘车来到苏联驻巴黎大使馆,祝贺十月革命节,祝贺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1944年12月30日,罗曼·罗兰在韦兹莱家中安然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被安葬在家乡克拉姆西他父母的坟墓旁。

“当我走到生命的尽头时,我将要说:祝福吧,安静地休息!安息吧,我的头脑!安息吧,我的双脚!你们都辛苦了。走过的道路是艰苦的,坎坷不平的。可是,无论如何,那是一条美好的道路。在那条路上,即使一步一个血迹,也是值得的。”——这是罗曼·罗兰本人对他不断寻求真理、向往光明和进步的一生所作的恰当总结。